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会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12
ISBN 7-5366-8388-X

I.邓... II.①中... ②中... III.邓小平(1904~1997)—文集 IV.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8157 号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

DENG XIAOPING XINAN GONGZUO WENJI

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发行
重 庆 出 版 社

(100017 北京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400016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35.5 字数:413 千字

印数:1-4 500 册

ISBN 7-5366-8388-X 定价:58.00 元(平装本)

出版说明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会合作编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邓小平担任第二野战军前委书记、政治委员，参与指挥进军大西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这部文集收入邓小平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二年八月关于西南地区工作的文章、报告、讲话、电报、指示、书信、题词等文稿一百四十篇，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文集较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恢复、社会改造、民主改革、党的建设、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文化建设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对于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他的业绩、思想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价值。

编入的文稿，在每篇文末均注明刊印根据。已收入《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的都按两书所载刊印。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凡有手稿的按手稿刊用，报

告、讲话记录稿作了必要的文字整理和校订。为便于读者阅读，一部分原没有题目的报告、电报、书信、批示等文稿，拟了题目；有的报告、讲话、电报的节录，也拟了题目；对文稿涉及的重要事件、人物、文献、地名等，作了简要的注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会

二〇〇六年十月

目 录

进军西南的思想准备工作	(1)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	
克服西南工作困难要掌握好三个法宝	(4)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关于进军西南军事部署的十五份电报	(11)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工作重心转移的三个步骤	(27)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	(31)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	(35)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教育干部学习党的各项政策	(38)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二野战军感谢电	(40)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	
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	(44)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	
在重庆市军管会第一次接管干部 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48)
(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	
对进军西藏的意见	(57)

-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
- 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克服一切享乐腐蚀思想 …… (60)
-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
- 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以担负艰巨的任务 …… (63)
-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
- 今后斗争要比普通军事斗争复杂艰苦得多 …… (65)
-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
- 关于进军西南情况的报告 …… (68)
-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
- 关于进军西藏的部署和成立西藏工委的考虑 …… (73)
-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
- 团结起来 战胜困难 …… (75)
-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 克服享乐思想 反对铺张浪费 …… (87)
-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日)
-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报告提纲 …… (89)
-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
- 在《解放西藏进军纪念》册上的题词 …… (98)
-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
- 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 …… (99)
-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日)
- 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 (104)
-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 凡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地方都易于克服困难 …… (109)
-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 学会管理城市 加强农村工作 …… (110)
- (一九五〇年三月六日)

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题词	(122)
(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	
西南工作情况	(123)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一日)	
关于保障云南对外贸易任务的意见	(129)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	
现阶段西南党组织的三项工作	(130)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	
关于部队缩编的两个问题	(137)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	
关于西南春耕和干部整风的报告	(141)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	
关于做好彝民工作的意见	(144)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关于剿匪和征粮情况的报告	(146)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51)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六日)	
要注意保护重要民主人士	(157)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为六一儿童节题词	(158)
(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	
以十条条件作为和平进军西藏的谈判基础	(159)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日)	
为《西南公安通讯》题词	(162)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日)	
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	(163)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对调整工商业问题的意见	(173)
(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	
征粮中应合理确定地主负担额	(174)
(一九五〇年六月八日)	
对康东政权组织形式的意见	(176)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	
关于征粮、剿匪、整风等几项工作的指示	(178)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七日)	
应限期收兑藏洋	(181)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	
金融税收政策是关系团结藏族人民的政治问题	(183)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题词	(185)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	
团结和依靠群众建设新西南	(186)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	
今天保护机密比过去更重要	(190)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四日)	
在减租中退押租的办法	(191)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五日)	
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纪念册题词	(193)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194)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	(206)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	(213)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当前西南工作的五个问题	(216)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对成立东藏自治区域人民政府的指示	(225)
(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	
务必注意各地农协的组织和领导问题	(227)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民族杂居地区不要急于搞减租退押运动	(228)
(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	
为西南军区第一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题词	(230)
(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	
发扬积极因素 战胜消极因素	(231)
(一九五〇年九月七日)	
关键是把党的组织整理好	(239)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	
吸收藏族优秀青年参加人民解放军	(242)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	
关于农业税率问题	(244)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	
为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学员题词	(246)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关于西南党的组织发展和巩固	(247)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开国一年在西南	(253)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	(257)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八日)	
在欢迎英模晚会上的致词	(259)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昌都战役后的工作要点	(261)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妥善解决西藏纸币问题	(264)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关于西康藏区工作的请示	(266)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	
文件太多的问题应加注意	(268)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日)	
谨慎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减租退押和土改	(269)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七日)	
少数民族地区的减租土改要具备条件才能进行	(272)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各民族共同努力把西南建设好	(274)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为《重庆工商》创刊题词	(285)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为新华书店西南区分支店会议题词	(286)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287)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的讲话	(299)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新年题词	(308)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	
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	(309)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	
为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一周年题词	(313)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	

关于减租退押工作情况的报告	(314)
(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	
对西康省一九五一年工作任务的两点意见	(317)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	
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宣传工作	(318)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八日)	
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务	(327)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对党外人士应该多做工作	(338)
(一九五一年二月六日)	
一九五〇年主要工作情况	(340)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	
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	(348)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为重庆市总工会成立题词	(354)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的经验 必须加以重视	(355)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在重庆市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56)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减租退押运动中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365)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	
为重庆市第一届文学艺术代表大会题词	(369)
(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	
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	(370)
(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	
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	(374)

-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 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指示 (375)
-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四日)
- 各种会议都出专刊往往过于形式主义 (377)
-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 为西南民族学院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题词 (378)
-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
- 在西南各界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
协议签字大会上的讲话 (379)
- (一九五一年六月八日)
-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
报告要点 (382)
-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
- 关于西南公教人员工资标准的意见 (388)
-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
- 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 (389)
-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 关于西南局工作情况的报告 (407)
-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 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 (412)
-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 灾区工作应以战胜灾荒为中心 (418)
- (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
- 土改、镇反工作必须做得更加仔细一些 (419)
-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
- 土改斗争要有方法有策略 (422)
-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七日)
- 为西南区工业展览会题词 (425)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	
新形势下的军队干部工作	（426）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	
反霸必须贯穿于整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432）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八日）	
西南区清理积案和第二期土改情况	（433）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	
精简军队 增产节约	（436）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	
抗美援朝已取得胜利	（439）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爱国增产 厉行节约	（442）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对西藏军区人选及机构的意见	（445）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九五二年的工作任务	（447）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	
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各项主要工作	（452）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关于三个会议情况的报告	（463）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坚决进行“三反”斗争	（466）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城市的民主改革和增产节约	（471）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扩建机场万勿浪费民田	（478）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藏军区成立大会应以庄严朴素为主	（479）

-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
- 各级领导在“三反”中要带头反省 (481)
-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
- 在三反运动中掌握领导完全必要 (484)
-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
- 小城市也要进行五反运动 (486)
-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 三反运动的有关政策性解释 (488)
-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
- 关于处理“三反”、“五反”新问题的请示 (490)
-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 加强民族团结 改善人民生活 (494)
- (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 宣传《婚姻法》 反对封建思想 (502)
- (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
- 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
- 第八次会议情况的报告 (504)
-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
- 积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512)
-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
- 为西南区首届体育运动大会题词 (513)
- (一九五二年五月四日)
- 三反五反运动应防止“左”的偏向 (514)
-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一日)
- 试行在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 (518)
-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
- 土产业输出问题值得严重注意 (519)
-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对昆明市“五反”退赃计划的意见	(520)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西南是交通第一	(522)
(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	
当前的经济工作和三反五反运动后的建设工作	(524)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二日)	
三反五反运动的总结	(530)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为《重庆日报》创刊题词	(541)
(一九五二年八月五日)	
加紧搞好西南工作 迎接全国计划经济建设	(542)
(一九五二年八月八日)	



在西南局工作时期的邓小平



邓小平在工作中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



邓小平和贺龙在一起(一九五〇年)





邓小平在重庆欢迎赴京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一九五一年)



邓小平和西南军区高级干部合影(一九五二年)

对康东政权组织形式的意见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

西康^[1]区党委：

已从电^[2]悉。

甲、关于康东^[3]政权组织形式，原则上同意你们意见，但请注意下列各点：

(一) 命名问题须与藏民代表人物交换意见，他们很重视博巴^[4]二字，但西康名为康巴，故在西康省康东之后自治区之前应加藏族二字或康巴、博巴二字，为照顾全国习惯，似以藏族二字为当，此点须呈请中央政府才能确定，你们应向各方面多交换意见。

(二) 原属康定专署之汉人县区可考虑划入雅安或其他行政区使政令易于施行。

(三) 凡属汉藏群居区可属于自治区人民政府管辖。

(四) 同意照原划县区确定行政区划，只作个别调整。

(五) 对原国民党各县政府的处置同意你们所提方案，暂不撤换，而以军事代表名义领导。但这个过程不宜太长，原有人员除个别有用者外，原则上都应调离，由省政府另行安置。

(六) 其余均同意你们意见。

乙、关于西昌区及省政府少数民族机构，同意你们处置。彝民问题亦极复杂，请你们继续加以研究，特别注意彝民的要

求随时告诉我们。

西南局
六月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2〕已从电 指 1950 年 6 月 15 日中共西康区委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电报。电报中报告，根据中央关于西康少数民族杂居和聚居地区政权组织形式的指示，决定在康定成立西康省康东自治区人民政府，现在开始计划筹组委员会；按照藏族、彝族人数的多少，决定各县政权的名称和干部组成。

〔3〕康东 指旧西康省东部地区。

〔4〕博巴 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

关于征粮、剿匪、整风等 几项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七日）

川南区党委并各地报中央：

删电悉。你们已有十三个县和自贡市完成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公粮任务，即将有四个县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即是说你们在长江北岸的各富庶县份除合江一县外都已获得较好成绩，同时，在这些江北岸的基本地区中股匪已被肃清。川南的公债^[1]任务业已超额完成。川南的税收情况虽相差尚远，但较其他区域情况略好，已完成全年任务百分之二十强，五月份则完成了应完成数百分之七十八。这些说明川南这一时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已经开始摆脱被动的状态，在这样的基础上，你们提出在上述业已完成公粮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十八个县市，转移工作重点，是完全必要的。你们所提的下半年（七月到十二月）工作计划是对的，我们完全同意，同时提出下列各点请予注意：

（一）全西南公粮四十亿斤，现仅收到十七八亿斤，完全收齐是有困难的，而尤其云南贵州为严重，但全区至少完成百分之七十五即三十亿斤才能勉强渡过财政难关。如要在全区完成百分之七十五，就必须在四川各区完成二十三亿斤即百分之七十七到八十才行。所以征粮工作仍不可丝毫忽略，即使在已

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县份，也应以足够力量抓紧清理尾欠和调整负担，凡属贫苦农民无力缴纳者应予减免；凡属地富因负担过重而无力缴纳者应予酌情减少；凡属地富并未超过应负担量而确系一时难于缴纳者，应准其打借条，允许在秋收时补缴；凡属本应缴纳而又有能力缴纳者，应坚决继续催收；凡属坚决拒抗的恶霸地主，应由法庭依法惩办。在策略上，我们对于地主也要做得入情入理，但对于地主按政务院规定的负担内必须缴纳的，不能让步，以击破地主的抵赖风气，而利今后各项政令之推行。对于干部的乱打乱捕行为，则应严加禁止。请你们根据应完成公粮百分之七十七到八十（川东已规定必须完成百分之八十）的任务，又根据上述的调整步骤，确定注意事项指示下级执行。

（二）肃清土匪^[2]仍然是川南的中心任务之一，在股匪业已消灭的江北地区，亦不能丝毫忽视，防止麻痹，因为土匪再起是可能的，其关键在于发动群众的程度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好坏。你们将发动群众和清查散匪结合起来的方针是正确的，应特别重视组织群众防匪自卫和在农协的基础上有步骤有方法地实行“枪换肩”的工作。在南岸匪情是严重的，川南军区及十五军应统一步骤并按西南军区规定执行。

（三）七八两月的整风^[3]是为九十月间减租^[4]的直接准备。在减租阶段的口号上应加清匪（或剿匪）两字，即清匪反霸^[5]减租，因为任何时候都要把肃清匪特的任务提得非常明确。反霸口号在前一时期我们不提是完全正确的，减租以前仍然不宜提出，但在减租阶段则必须提出。反霸问题很复杂，往往容易犯打击面过大树敌过多的错误，所以在整训干部时必须把反霸内容、对象和方法弄得清清楚楚，避免紊乱。这个问题请各区加以研究在七月上旬以前提出意见，以便由中央局发

出统一的指示。

（四）调整工商业在重庆已获成绩，在近日重庆第二次各界代表会议〔6〕上所反映的主要是税收问题，而税收问题则是调整工商业的主要内容之一，据说内江糖业问题很多，又听说糖业问题主要出在借糖缴公粮上面，这件事请予检查处理。各地对于调整工商业问题必须认真进行，在进行中有何困难和意见，望多多提出。

（五）整编复员工作务必抓紧，以军区为中心进行，为使军队集中力量剿匪和进行复员，军委总政已规定军队整风一律在秋收进行。

西南局

六月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公债 即国家举借的债务。这里指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迅速恢复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而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即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

〔2〕肃清土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3〕整风 见本书第143页注〔5〕。

〔4〕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5〕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6〕重庆第二次各界代表会议 指1950年6月12日至17日举行的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公私关系、解决劳资关系、整顿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和整训干部等问题。

应限期收兑藏洋^{*}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

张谭昌陈^[1]并西康^[2]区党委财委：

铨辰两电^[3]均悉。对藏洋^[4]不兑的政策是脱离群众的，应采取限期一月或两月兑完的办法，这样办一则不致引起群众反感，二则限制一两个月就可避免流入太多，三则藏洋交十八军有用处，四则可以帮助发行一部分人民币。望西康财委即准此执行。对于银元兑人民币比价应完全与成都或雅安一致，不可比成雅降低。对于藏洋与银洋兑换的比价，可按照历来习惯不宜变更。总之，西康财委必须切实注意康定藏区之财经领导，因为这是争取藏民团结的基本工作之一，千万不可忽略。据说康定商店倒闭很多，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应予克服。再者，西康对西藏的贸易，关系十八军进军甚大，请十八军即派负责人到雅安与区党委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如西康财委无力量，可考虑由十八军负责，或省财委与十八军共同负责经营。

西南局及财委

巧

^{*} 这是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电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张 指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第十八军军长。谭 指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第十八军政治委员。昌 指昌炳桂，当时任第十八军副军长。陈 指陈明义，当时任第十八军参谋长。

〔2〕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3〕铤辰两电 指 1950 年 6 月 16 日张国华、谭冠三、昌炳桂、陈明义给西南军区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两份电报。电报中报告，康定人民银行 6 月 16 日开始营业，由于西康财委不收兑藏洋的决定严重影响康藏人民的生活，因此与康定地委商定，仍照以往方法收兑藏洋，所兑藏洋交给十八军进藏使用。

〔4〕藏洋 又称四川藏洋，二十世纪初清朝政府铸造发行、在川滇边藏区通用的法定银币。新中国建立后，停止使用。

金融税收政策是关系团结 藏族人民的政治问题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西康^[1]区党委并十八军报中央：

张谭已铣电^[2]照转你们，从这个报告看出在康定的金融税收政策是有问题的，你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派负责人去康定检查和纠正，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团结藏民的政治问题。对于康定区的财经工作应本下列原则进行：

（一）不要希望在那里有多少财政收入，不要给该区以过多的财政任务。该区的收入，也应完全用之于本地与藏民有利的事情上去，而以极少数的一部分作为行政费用，军费全部乃至行政费之一部应由外面贴补。

（二）所有其他区域的税收金融等项办法，绝不能搬到少数民族区域去用，而应另订适合于该区的办法，以不致引起藏民绝大多数人的反感为原则。对于金融问题前已电告你们照市价限期收兑藏洋^[3]，银元比值应与成都雅安一致，务必坚决执行。康定税收应立即调整，西南财委^[4]业已电示你们：对于外国货物也只能照普通税率征收不宜增加，但应另订关税办法并禁止某些外货入口。

（三）应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与帮助藏民的土货出口及必需的入口，你们要派政治上较强的干部去主持该区的贸易工

作，在少数民族区域的贸易工作乃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绝对不要以赚钱为目的，只能是以为藏民服务为目的。

（四）对于少数民族区域的各项改革事宜，应迅速而坚决地废除由于过去大汉族主义统治而形成的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如乌拉^{〔5〕}制度），但对于牵涉到少数民族内部阶级关系的改革事宜，一律暂不进行，也不要宣传。

（五）中央对少数民族工作中的纪律性，已有专门指示，务必在一切干部中深入传达和讨论。

（六）藏区贸易与十八军进军关系极为密切，前已电十八军派负责同志到西康区党委商议共同进行办法，请将你们商议的结果告诉我们。

西南局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 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2〕 张谭已铣电 见本书第 182 页注〔3〕。

〔3〕 藏洋 又称四川藏洋，二十世纪初清朝政府铸造发行、在川滇边藏区通用的法定银币。新中国建立后，停止使用。

〔4〕 西南财委 即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 年 8 月正式成立。邓小平兼任主任。

〔5〕 乌拉 指旧时藏族地区农奴向农奴主支应的各种差役，包括人役和畜役，是农奴的一项繁重负担。民主改革后彻底废除。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题词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

共产党员应该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紧紧地联系群众，才能完成任务并使自己勇敢地前进。

邓小平

于党的二十九周年纪念日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7月1日发表的手迹刊印

团结和依靠群众建设新西南^{*}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

同志们：

西南解放半年了。在这半年中，我们二十余万党员，六十万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所有革命干部，同人民在一起，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和紧张的工作。在短短的时间内，无论在剿匪方面，财政经济工作方面，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群众工作方面，无论在城市和乡村，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奋不顾身、日以继夜地工作，他们一心一意地为着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不避艰险，任劳任怨，并且有几千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光荣牺牲。他们诚心诚意地为人民办好事而不计较个人的享受；他们在工作中难免发生错误，但是他们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勇敢地改正错误；他们对于中央和上级的指示采取精心学习的态度，以便于正确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们无愧于人民。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用特种材料构成的新型的人物”^{〔1〕}，我们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是符合这种新型人物的称号的。没有他们，党的任何正确领导都会归于无用，任何工作计划都会变成一纸空文，人民翻身就会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庆祝建党二十九周年的时候，

^{*}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应该向他们祝贺,应该感谢他们的努力!

但是,我们党内也有另外一种党员,他们入党的动机是不纯的。他们入党,不是来革命,不是来为人民服务,而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国家政权的党,想利用共产党员的地位,来达到他们贪污腐化、升官发财、营私舞弊,甚至保护封建势力、压迫人民、破坏革命的目的。这种人在我们党内虽然不多,可是他们的行为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有不少的损害,我们应该有所警惕。对于那些由于胜利冲昏头脑,以致迷失方向,产生蜕化思想的同志,应该热忱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把他们从泥沼中挽救出来;但对于那些暗藏在党内的阶级敌对分子,对于那些屡经教育不知改悔的贪污腐化分子,就必须在精细审查之后清洗出去,以保持党的纯洁性。

除了这些少数品质恶劣的分子之外,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都是一些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人人都有缺点,只是大小不同。在当前带有普遍性的缺点,就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在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我们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即使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正因为它是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就必然要使我们的事业受到损失,并使下面工作的同志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许多同志所犯的命令主义错误,有的是产生于执行繁重任务的急躁性;有的是不懂得进行工作的方法;有的是由于反动分子的破坏和地主恶霸的抵赖所刺激;有的是历来工作作风就有毛病,只相信自己的狭隘经验,不学习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只相信个人的本事,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有的甚至还有封建思想的遗毒;也有个别的人品质不好,好以胜利者统治者自居,喜欢坐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管根源如何,其结果总是一样的,就是必然大大地脱离群众,损害党的信誉,违反党

的政策和人民政府的法令，完成不了工作任务。我们有些同志的关门主义倾向，是不懂得统一战线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败的基本环节之一。他们不懂得唯有团结四个朋友^{〔2〕}才能战胜三个敌人^{〔3〕}、才能建设新中国的道理；他们不懂得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这样多的事情，不是五百多万共产党员单独包办得了的；他们往往把党理解为一个狭小的宗派团体，而不是一个领导中国革命的群众性的政党；他们往往夸大党外人士的缺点，不善于或不愿意与党外人士共事，不善于在工作中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党外人士进步，而对于自己的狭隘作风和违反党的统一战线这样重大的原则性的错误，却漠然无知或采取自我原谅的态度；他们往往在工作中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尚以为自己总是对的、人家总是不对的；他们对于人民政协共同纲领^{〔4〕}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往往不及党外人士熟悉，学习精神往往不及党外人士好，可是还要骄傲自满，有时甚至不讲道理。所有这些都必然要损害人民的团结，损害我们共同的事业，损害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政治影响。

我们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如果不加以克服，将不但脱离群众，损害革命工作，完成不了任务，而且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的敌人并不愚蠢，国民党、土匪、特务在人民中早已威信扫地，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寄托于我们共产党员多犯一些错误，以便于他们抓住这些错误，鼓励一部分落后群众反对我们，并破坏中国人民大团结的统一战线，阻碍人民事业的前进。西南的封建势力也利用我们这些弱点大喊大叫，企图用以抵制人民政府的法令，更多更久地保持他们的封建特权和在乡村中的统治基础。他们对于我们有这些错误是很欢迎很高兴的。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朋友却为我们同志的这些毛病而感到忧虑，他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我

们应该感谢他们的友谊和帮助，我们应该勇敢地纠正自己的缺点。我们正在进行的全党整风运动^{〔5〕}，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且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同志们，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可是我们之所以既有缺点而又能称为布尔什维克，其道理就在于我们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并有决心去改正自己的缺点。

同志们，西南土匪特务还未完全肃清，封建势力原封未动，人民生活还未改善，各种困难还多，我们面前的斗争是艰苦而复杂的，我们绝不能松懈我们的斗志。我们要紧紧地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发扬优点，改正缺点。我们要紧紧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和其他爱国分子，紧紧地团结群众和依靠群众，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稳步地建设新西南！

同志们！努力学习马恩列斯的学说，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照耀下，引导群众胜利地前进！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共产党员是用特种材料构成的新型人物” 见斯大林《悼列宁》。新的译文是：“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2〕四个朋友 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3〕三个敌人 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4〕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5〕整风运动 见本书第143页注〔5〕。

今天保护机密比过去更重要^{*}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四日)

今天的环境比过去更为复杂，保护我们的机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重要。革命的胜利，很容易产生麻痹和疏忽，这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故应引起一切负责同志和机要干部的警惕。

邓小平
七月十四日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 这是邓小平为西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编印的《机要工作》创刊号的题词。

在减租中退押租的办法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五日）

川北区党委：

午元电^[1]悉。预收租谷似乎类似押租（金），请再调查两者关系。这个问题你们可研究具体办法，提到中央局^[2]会议讨论决定，不必在你们的代表会议中决定。因为西南今冬的减租^[3]，其性质等于淮海战役。而明冬的土改^[4]则是渡江作战。故我们已决定在减租中要退押租（金）^[5]，但为照顾实际情况，拟照少奇同志在政协会上的结论^[6]，采取：（一）退得起者全退；（二）或者分期退；（三）不能全退者退一部分；（四）退不起者不退等四个办法加以解决。遇有争议，由人民法庭判决。似乎预收租谷问题也可适用这个办法，请你们加以研究。

西南局

七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 午元电 指 1950 年 7 月 13 日中共川北区委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电报。电

报提出，根据参加党代会的党代表及农民代表反映，不少地方已经预收地租，这已成为今年冬天减租征粮的焦点问题。因此建议解放前已预收 1950 年租谷者不减退；对 1951 年租谷则不作公开规定，但原则上不允许预收。具体办法还需要讨论，并在这次党代会上作出决定。

〔2〕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 年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 月 23 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3〕减租 见本书第 56 页注〔8〕。

〔4〕土改 见本书第 10 页注〔3〕。

〔5〕退押租（金） 即退还押租。押租是旧时在土地、房屋或其他财物租佃时租用者所支付的一种保证金。按租佃惯例，押租在解除租佃关系时应归还给租用者，但是地主阶级依仗权势，往往以种种借口不肯退还押租。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中，农民纷纷要求地主退还押租。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规定地主应将过去所收押租退还给农民，但又指出在实行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退、分期退、缓退、少退或者不退等办法。

〔6〕少奇同志在政协会上的结论 指 1950 年 6 月 22 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会议讨论土地改革问题的结论》。

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纪念册题词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让我们各兄弟民族，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共同纲领^{〔1〕}的基础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邓小平敬题

根据重庆市博物馆保存的手迹照片刊印

注 释

〔1〕 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我要多，又是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我今天主要是把西南的情况，同少数民族的问题联系起来讲一讲。

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1]。贵州的苗族，据说有一百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可能弄清楚。

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

^{*} 这是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2]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我想讲点西康^[3]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提出十项条件^[4]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情况怎样呢？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5]，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

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6]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

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我们进军西南以来，有这么一个概括的认识：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强调解除各民族对人民解放军的顾虑，解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在实际行动中严格执行纪律，不侵犯

他们一丝一毫的利益，包括征集公粮也要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首先保证决不能超过历史上的负担，只能少于历史上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如果我们患急性病，像在汉族区域一样，总想很快地拿到粮食，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使工作见效，那就非出乱子不可。过去其他地区出了些乱子，其中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这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工作，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我们有些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患急性病，因此领导上要经常防止急性病。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一百个干部有九十九个做得好，有一个干部出乱子，也可以把事情搞坏。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必须保证这一点。这个时期西南在民族问题上还没有出什么乱子，原因就

是工作稳当，这就叫成绩。

那么，到现在工作做得够不够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否则就要出乱子。举例来说，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纲领宣布了，少数民族很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就要问什么时候实行，如何实行。他们要求兑现。如果半年不兑现，一年还不兑现，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在内蒙古，这方面是有经验的^{〔7〕}，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面，也有些经验^{〔8〕}。而在广大的新区，还没有经验，对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个新问题。但是现在必须开步走，因为少数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在西康，有的代表人士甚至还想在实行区域自治时用“波巴政府”^{〔9〕}这个名字。现在这件事还没有谈好，不过一定要有一个他们满意的名字才行。西康有许多地名是汉人取的，我们叫惯了，不等于他们习惯。这还是一个名称问题，其他问题就更复杂了。比如康东过去划有县，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10〕}，现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保存不保存县呢？从发展前途看，保存县有好处，而且已经是习惯了的，但是他们赞成不赞成呢？有一个原则，他们不赞成就得取消，另外划。还有，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少数民族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有的过去打冤家，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主要是过去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挑起来的，是大民族主义统治弱小民族的手段，但是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利害关系。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使他们团结起来，不要再打冤家。又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派不派干部？派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少而精，要派真正能帮助他们的干部，至于用什么名义，这要跟他们商量。我们的同志去工作，是一件苦差事，思想要搞

通，要有一些愿意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去那里工作。这一系列问题，牵涉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11]，有一百多人。有这些条件，就能马上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其他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2]。比如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还可以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如一个民族聚居乡。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

从经济上看，现在不开步走也不行了。比如西康，这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现在我们只进去三四千人，一下就借了七十万斤粮。一些进步的上层人士帮忙很大，不但把粮食借给我们，而且价钱公道。但是老是这样不行，少数民族群众负担不起。再如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这

两条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适用的。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而把人家的粮食吃光，这是不行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比如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解决吃盐的问题，那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又如西康现在还不通汽车，怎样在经济上同内地沟通，从内地进什么货，他们的东西怎么运出来，价格如何，怎样使他们有利可得，这些都要妥善处置。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目前的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

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现在最好先办一些训练班，着重宣传民族政策。办学校最困难的是没有教员。我们不是没有经费，不是其他问题，就是没有人教课。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同文化教育相联系的还有卫生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那里迫切需要医药。在当前来说，文化工作首先

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生工作作用很大。

所有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现在都要开始去做。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为什么？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进步力量在那里很少，影响很小。将来这个力量发展起来，会起很大的影响，现在不起决定影响。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搞得更好。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坏，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为阻力大。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进步了，同我们的合作搞好了，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有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以为这样做会丧失阶级立场，不懂得在那里阶级立场表现得不同。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

附带说一说，有一些特殊问题，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比如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不搞减租^[13]，不搞土改^[14]，但是贵州苗族人要求减租，要求土改，而且比汉人还迫切。究其原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贵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们绝大部分种汉人的地，而且是山坡地。他们的要求很合理。如果不

允许他们实行减租、土改，那就是大汉族主义，就是不直接照顾他们的利益。但是这样的要求，可能苗族上层少数地主分子不赞成。所以我们特别作了规定，凡是种的土地是汉人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土改，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这就是说，减租、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完全不提，有些地区还应该进行，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有这个要求，而且不是少数人要求，而是大多数人要求，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又如，在少数民族地区，怎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怎样成立联合政府，要考虑方式方法问题。可以采用召开各类代表会议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内地收效很大。通过代表会议征求意见，商量研究，可以避免主观地决定问题。有时我们是一番好意，就是做出的决定不正确。但即使决定正确，如果没有通过他们，也会遭到反对。只要通过他们，即使有的决定还有缺点，他们也是会拥护的。

最后谈谈工作态度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就是刚才谈的，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说清楚，正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中央民族访问团^[15]这次到西南来，必定对我们帮助很大。你们在少数民族方面研究、了解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特别是你们下去以后，亲身接触具体情况，会发现许多问题。我

们很希望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多提意见，哪怕是一个片面的意见，也比没有意见好。现在我们就是苦于没有意见。同志们在这方面不要客气，有什么感觉就跟当地同志说。下面有些同志可能主观性强些，你们可能碰一鼻子灰，或者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不重视，或者对问题见解不同，而且很可能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遇到这样的事，你们不要生气，可以给我们写信，或者给省里的同志写信，总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假如你们有些意见不对，我们也告诉你们。这样，依靠同志们的工作，我相信可以解决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至少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云南的各少数民族大都分为若干支系，各支系又都有自己的称谓。这里的数字包括了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目前云南省内经过识别归系后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共有二十五个。

〔2〕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3〕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4〕1950年5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项政策。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布告中公布。十项条件是：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

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5〕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6〕长征 这里指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及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南部瑞金等地出发的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翻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行程两万余里，1935年10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7〕指1947年5月1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

〔8〕1942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定边县的四、五两区和城关镇的两个自然村曾建立回民自治区。同年9月在曲子县三岔镇曾建立过回民自治区。这里是指这些地方的经验。

〔9〕“波巴”，又译为“博巴”，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波巴政府”即藏族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西康时，当地藏族人民曾建立“波巴政府”。

〔10〕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后，废土司制，设县治理。辛亥革命后，康东地区部分土司复辟，虽保留县制，但形同虚设。1939年正式建立西康省，实行设县治理。

〔11〕东藏民主青年同盟 是中国共产党康藏边工委（“巴塘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建立于1949年1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地区的过程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50年4月，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盟员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团员。

〔12〕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在地方政权中的平等权利，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在一些民族杂居地区曾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5年12月29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关于改变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县和乡改建为自治县、民族乡或一般的县和乡；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专区和区改建为自治州和自治县，或将专区和区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改为专员公署和区公所。

〔13〕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14〕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15〕中央民族访问团 这里指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

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 开始摆脱被动状态^{*}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半年的工作我们是有成绩的，这些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的状态。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被动，而应再以半年的努力争取工作上的主动。现在几个主要的工作情况是：剿匪^{〔1〕}已获显著成绩，消灭土匪约计三十四万人，现有土匪不到十五万人。所有较富庶的腹心地区业已净化，土匪或被肃清，或已转入潜伏。这种地区的任务，在于充分组织和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枪换肩”，以根绝匪患，并防止土匪再起。在土匪仍然活跃的地区的任务，是求得在今后半年内达到消灭股匪的目的，并使剿匪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务使剿灭一区土匪，就能从发动群众中巩固一区。

九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改编工作，除云南两个军外已告基本结束。起义部队都是采取的彻底混编方式。除在前一阶段叛变了三四万人及乡保武装叛变很多外，在改编过程中，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这个工作做得比较好，是由于我们坚决地依靠了士兵群众，同时又对军官做了比较充分的争取工作，在改编

^{*}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7月2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印发西南各省区党委。

中又对他们做了适当安置的结果。今后的问题是在部队中、学校中，继续贯彻对一切留用或学习的军官加强团结和改造工作，帮助他们过好土改^[2]这一关，防止产生一脚踢开的狭隘倾向。

整编军队至一百一十八万人、整编地方人员至三十万人的工作六月份即已完成。军队复员工作正在积极进行。由于部队采取了公开动员的方式，效果良好。如果今后各种处理办得周到，问题不大。要努力争取九十两月基本结束这一工作。接受他区复员军人的工作，尤应妥善布置。

财政收入在五月份后有进步。四川各区公粮难关大体已过。照原派任务，川东已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川西可达百分之八十，川南已达百分之七十二，川北已达百分之六十，大部分县公粮工作告一段落，转入清理阶段，工作重点有可能转移。云南解放更迟，只征起三分之一。贵州则因土匪猖獗，现在完全控制的地区只有全省的五分之二，公粮也只完成四分之一。五月西南局会议确定坚持征收，以打击地主的抵赖风气，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由于坚持征收，我们不但获得了财政工作上的胜利，而且获得了初步打击地主阶级和初步发动群众的政治上的胜利，并使四川大部分县在工作上开始转入了主动的地位。现在，我们已获得中央财委^[3]批准，减征公粮百分之二十五，即减至三十亿斤。如此，只要川东、川西完成百分之八十，川南完成百分之七十五，川北、云南完成百分之七十，贵州完成百分之六十，即可全部结束。

税收截至六月底止，只完成上半年应征数的百分之五十八和全年应征数的百分之十八，成绩是不好的。现在中财委已允减征百分之三十，即由二十五亿斤减至十七亿五千万斤，必须努力完成。今年下半年财政工作亦应转至以税收为重点。

调整工商业工作从五月开始，在主要城市已获显著成绩，工商界已经不大叫了，顾虑也减少了，市场较前活跃了。但在其他城市这项工作才开始，问题还很多。

整风运动^{〔4〕}各地均已先后开始，整出不少问题，证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是严重的。如果不整风，将使今冬开始的减租反霸^{〔5〕}运动无法掌握，致使我党陷于非常不利的被动孤立的地步。在整风中，必须注意保护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并在这样的基础上使干部在思想上、政策上、作风上提高一步，为尖锐的减租斗争做好准备。

政府摊子最近即可搭好。各地对召开各界代表会议^{〔6〕}的方法已引起重视，并且有了一些经验。各党派的党员已安好位置。今后是如何教育党员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的问题，而从同志们的思想情况来看，这还是一件费力的工作。

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救济业已开始。工会工作、青年妇女工作、文教工作等，均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工会、农会已普遍建立，但在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尚须继续克服。

最近出现了严重的夏荒，已经开始饿死人。我们过去对此犯了麻痹的错误，现已采取迅速有效的步骤，进行生产救灾工作。各地必须重视这个问题，保证不再饿死一个人，否则我们就没有对人民负起责任，将使我们丧失人心和社会的支持。目前灾情的特点主要是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大量遭受破坏，致使约占百分之十的从业人口丧失了原有的生活道路，故必须有计划地挽救农村副业和手工业。要认识到为这百分之十的人找寻生活出路，不是几个月就能办到的事情，必须作为各地政府特别是财经部门今后长期关注的事情。

少数民族工作，这一时期没有出什么较大的乱子，这是我们采取谨慎方针的结果。这个工作应在党中央明确的方针下加

强起来。区域自治应迅速实行，以贸易部门为中心的扶助少数民族的经济工作，和以卫生部门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应迅速进行，少数民族学校应迅速筹办。

以上就是我们半年来的工作概况。这一阶段的工作极端紧张而艰难，我们的部队和我们的干部都尽到了责任。由于上述各项工作成绩，我们初步地但是重重地打击了封建阶级的威风，初步地发动组织并依靠群众，因而使我们在西南的斗争中，初步取得了阵地。这是我们辛勤努力的结果，必须使同志们明白这一点。全体同志的努力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我们还应在今后半年内做好上述尚未完成的工作，即完成公粮、税收工作和复员工作，在半年内消灭一切股匪，在九月以前完成整风和训练干部，继续调整工商业和救济失业工人与知识分子，做好救灾工作，使我们完全转到主动地位，以迎接今冬明春开始的清匪、反霸、减租，直到土地改革的伟大而尖锐的群众运动。

减租、反霸运动是西南的“淮海战役”，斗争内容包括清匪、反霸、减租、征粮和退押^[7]，斗争目的是要改变封建势力仍占优势的阶级力量对比，获取农民的优势和革命的巩固阵地。而这个斗争又是在我们主观力量尚嫌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是非常艰苦复杂而剧烈的，我们过去对此是认识不足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封建阶级的抵抗，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他们将采取各种非法的（包括武装的）和合法的形式来同我们斗争，我们务必兢兢业业地在七八九三个月中做好战役的准备工作。第一，完成整风，并将参加减租运动的干部轮训一次，以土地法^[8]、减租条例^[9]、农协章程、阶级分析方法为主要课程，学懂政策，掌握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孤立敌人、分化敌人的工作方法。第二，整理和建立农民协会，特

别注意审查农协的领导成分。普遍召集农会代表会议，讨论减租清匪反霸工作，这种会议要当作训练班来开办；建立各级农协委员会或筹委会，作为运动的合法的执行机关。第三，各县组织好巡回人民法庭，禁止乱打乱捉乱杀。第四，每个省、行署选择几个点进行典型试验。第五，立即接通电话网，以便及时掌握和领导运动。

运动的口号是清匪、反霸、减租。清匪的口号不能抛弃，在这个口号下才会避免麻痹，防匪再起。同时，在减租之后，农民很自然地要求武装起来，我们应抓住这个要求，组织农民自卫队，归农协领导，并在基础好的地区试行组织民兵。不反霸就不能达到减租的目的，过去不提反霸口号是正确的，现在不提就是错误的。但是反霸容易犯打击面太宽的错误，此点必须预防。我们收集了一些地区的好经验，印发出来，作为各地训练的材料。

在减租运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提出退押问题，这个问题对地主阶级打得最痛，他们也一定叫得最凶，必须按照少奇同志在政协会上提出的四个办法加以处理^{〔10〕}。在退押问题上应主动、适当地照顾富农、起义军人、民主人士、小土地出租者和确实困难的中小地主，以利于分化敌人，集中打击主要敌人，且利于解决问题。对于这些人要多用“缓”、“少”、“不”^{〔11〕}三个办法。同时，对于那些大中地主也应分别情况采用“急”、“缓”、“少”三个办法。减息问题也要碰到，这个问题不宜与减租退押并列地强调起来。如果农民尚不积极提出，我们更不宜强调。因为减息包含着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过于强调容易出现混乱，而且我们不应该把一切问题都放在一个运动来解决，以免模糊了运动的主要方向和打击的主要对象。我们拟了减息几条原则，不必对外公布，只作为内部同志

解决问题的方针。

为使运动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避免可能出现的混乱，各地党委应根据本区情况，规定运动的范围，约束运动的内容，颁发运动的实施细则。在运动过程中，如果发现哪一个地区发生了严重偏向，则应坚决加以停止，重新检讨和训练干部，然后再继续进行下去。不可听之任之，以致走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任何时候都要充分运用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方法。有关清匪反霸减租的方针及实施细则，应交到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使更多的人站在我们这方面来，这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
刊物《西南工作》第17期刊印

注 释

〔1〕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3〕中央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4〕整风运动 见本书第143页注〔5〕。

〔5〕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6〕各界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7〕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8〕土地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

〔9〕减租条例 指《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1950年3月1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施行。

〔10〕指1950年6月22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会议讨论土地改革问题的结论》中提出的退还押租的四个办法，即：一、退得起者全退；二、分期退；三、不能全退者退一部分；四、退不起者不退。

〔11〕“缓”、“少”、“不”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中，农民纷纷要求地主退还押租，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规定地主应将过去所收押租退还给农民，但又指出在实行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退、分期退、缓退、少退或者不退等办法。

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西南鸦片烟种植面积之广，吸毒人数之多，为全国冠；其流毒之大，非言语所能形容。兹为坚决执行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起见，拟定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如下：

(一) 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严禁种植鸦片。凡已种植之烟苗，一律全部铲除，改种农作物。违者从严惩处。

(二) 严禁运销和贩卖鸦片、白面、金丹、唆唆及其他类似毒品。原有运销、贩卖毒品之商贩，限于本办法在当地公布之十日内，向当地人民政府或公安机关全部缴呈其存货；倘有继续运贩烟毒或抗缴存货者，一经查觉，定予严厉处办。

(三) 严禁开设鸦片烟馆。凡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二月二十四日通令公布后，继续营业之鸦片烟馆，限于本办法在当地公布之十日内，向当地人民政府或公安机关全部缴呈其烟具存货；并得视烟馆大小没收烟馆主人本人所有的属于烟馆部分之房屋和家具，及科烟馆主人以适当罚金，其罚金数目由人民法庭判定之。倘有继续开设烟馆或采取其他分散隐蔽方式，供给吸毒人以毒品者，或抗不缴呈烟具存货者，一经查觉，定予

^{*} 这是邓小平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起草的文件。7月31日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讨论通过。

严厉处办。

（四）严禁制造白面、金丹及其他类似毒品。原有制造人如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自首，全部缴呈制造工具及存货者，得科以适当罚金，并从宽处理。倘敢继续制造或抗不自首，一经查觉，定予严办。

（五）严禁各药商出卖制造白面、金丹及其他类似毒品的原料，其现有存货应即缴呈公安机关焚毁，违者惩处。

（六）各级政府机关不得收购鸦片，亦不得允许用鸦片抵缴税款。在种烟过多而致形成灾荒地区，为照顾灾民生活起见，得呈准中央财委发出一部粮食酌予救济；但因限于国家财力，救济数目不能太多，且须由被灾害户交出相当数量的烟土，当众焚毁。

（七）所有缴呈或没收之烟土，一律由各县、市人民政府协同禁烟委员会及人民代表会议机关点清数目，当众全部焚毁（最好用流水中冲洗办法），不准丝毫保存，不准转卖或作为财政收入，违者严惩。

（八）吸食烟毒之人民，应定期登记（城市向公安局，乡村向人民政府登记），由当地人民政府定出分期戒绝办法。

（九）遇有持武装保护运贩烟毒或借土匪武装护运烟毒者，一经捕获，加重治罪。

（十）各轮船公司、汽车公司、木船公司及其他运输公司之业主及员工，有协助政府查禁烟毒、检举毒犯之责任。倘有业主或员工利用其职业便利，进行或帮助别人进行秘密贩运烟毒者，一经查获，定予从严治罪。

（十一）各级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应配制戒烟药品及宣传戒烟戒毒药方，应以县为单位设置一处或多处戒烟所。

（十二）各级人民政府应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该会由民

政、公安部门及各人民团体派员组成，民政部门负组织之责；亦得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组成之。

（十三）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进行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一切科学文化教育机关，亦应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以使人民充分切实了解，而达到彻底禁绝烟毒之目的。各县、市人民代表会议应作专题讨论，作出切合于当地之决议，交由禁烟禁毒委员会施行。

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办的内部
刊物《西南政报》第1期刊印

当前西南工作的五个问题^{*}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要讲的有五个问题。

一、团结自己与战胜敌人问题。

我认为刘主席的报告^[1]和其他四个报告^[2]都贯串着两个基本精神，一是团结自己，二是战胜敌人。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有朋友，有敌人。朋友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对于人民的朋友，我们的任务就是必须坚决地团结。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对于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就应该加以反对，加以纠正；对于人民的困难就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办法，有步骤、有方法地加以解决。刘主席报告中对于解放西藏、解除西藏人民的痛苦和巩固国防，对于实行反霸^[3]、减租^[4]、退押^[5]以解除农民的痛苦，对于争取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和整编复员的工作，对于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工作，对于团结和帮助少数民族并解除他们的困苦，都提出了妥善而切合实际的政策和办法，这些政策和办法都是我们必须贯彻实行的。惟有实行这些政策和办法，才能把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团结起来，战胜敌人，建设我们的国家。当然，进行这许多有利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有许多困难的。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国家财政经济开始好转的基础上，是可以逐渐解决和克服的。以上是说我们对于朋友的团结必须是坚定的。

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敌人的态度也是坚定的。对于侵略西藏、台湾的美国英国帝国主义势力要坚决地赶走；对于土匪特务，要坚决肃清；对于封建制度要坚决消灭；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从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要清除烟毒，镇压那些贩烟的人。我们对于敌人之所以要态度坚决，是由于我们清楚地知道敌人是不会自行灭亡的，他们要用各种方式、各种手段来进行抵抗和破坏。我们有信心战胜这些敌人，只要我们运用正确政策，发动和依靠人民，特别是发动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们就一定能够迅速地战胜敌人。

作为一个人民的革命战士，作为一个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们必须首先分清敌我，才能懂得坚决地去团结我们的朋友，才能懂得坚决地去战胜敌人。

二、减租、反霸、退押问题。

减租、反霸、退押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也是大家慎重讨论的一个主题。首先我只就退押问题谈几句。农民交的是押，历史上地主往往用各种欺诈方法，甚至利用权势压迫，利用剥夺佃权等方法，以达到实际上完全不退或退得很少的目的。有的现在不反对退押，不等于真正赞成退押。譬如有人企图把地主形容得非常可爱，说四川的地主对佃户太好了，把佃户叫做佃客，由此来证明地主对于佃户是何等的客气，何等的宽大。实际上叫佃客虽然好听，但如果我们到农村去访问一下，就可以看到佃户并不是什么“客”，而是奴隶。又有人说，地主养活了农民，所以地主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这种说法，不是蒙蔽事实，就是太无常识了。事实是农民养活了地

主，劳动者养活了寄生者，不是寄生者养活劳动者。如果我们到农村去倾听农民诉苦，就知道像《白毛女》《血泪仇》那样的事情是很普遍的。我建议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有必要参加几个诉苦大会。听了以后，这些道理就清楚了，就会懂得地主阶级的许多土地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欺压农民，从农民手上夺来的；就会懂得地主是采取什么方法榨取农民身上的血汗，地主的奢侈淫靡生活是用农民的血汗换来的；就会懂得地主集中土地的过程，就是农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丧失土地变为一个失业者的过程。农民对地主有极深的仇恨，他们不是觉得地主可爱而是觉得可恨。一个有良心的人，是应该同情农民的痛苦和帮助他们。

在没有办法证明地主可爱之后，有人又把地主形容得很可怜，由此证明地主虽然应该退还押金，但是退不起押金。他们似乎觉得可怜地主比解放农民更为重要，觉得农民再不应该向“可怜”的地主要回押金，虽然押金是农民的血汗累积成的。就全国来说，四川地主的奢侈是最突出的。在成都周围，有一些乡长有专用包车，这些汽车是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地主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而农民却在痛苦地呻吟。甚至地主的拳头可以打死农民，农民不敢说话，泪水只能往肚里吞。今天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农民有权利要回自己的押金。毫无疑问，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人民政府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人民政府离开了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革命胜利就好像建立在沙滩上，是会垮台的。所以人民政府应该从减租、反霸、退押一直到土改^{〔6〕}，坚决地支持农民的合理要求。我们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和犹豫。因为这是我们的依靠问题，基础问题，能不能存在的问题。

其次，谈谈退不退得起的问题。事实证明是退得起的。退

不起的地主占的比例极少，譬如破了产的和鳏寡孤独等，对于这些是应当照顾的，在办法上也照顾到了。但实际上，大部分地主是能够退得起的，不能以任何借口允许他们不退，不退就不合理。其实只要他们少浪费一些，把奢侈的生活节俭一点，把自己手上的金子银子拿一些出来，也就退了。西南金子的数量我们没有材料统计，但银元估计在一亿以上。我们禁用银元时许多人大喊大叫，说出现土匪的主要原因一是征公粮，二是禁用银元。于是我们研究决定在公粮上照顾地主的困难，并发了通令允许他们用银元折交公粮。从发通令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据财经委员会的报告，只折收了六十万银元，贵州只收了三块银元，结果地主交的还是粮食，而不是银元。这个情况证明，大量的银元还没拿出来，在谁的手上呢？工商界没有，农民也只是一两块，还是都在地主身上。如果地主拿出一部分银元来退押，也就解决问题了，由此说明是退得起的。

有人根据征粮中遇到过混乱，因而担心在退押中会更混乱，这是应该注意的。我们要尽量避免混乱，想出妥善的办法去执行。我们在征粮中确实有过一点乱，主要是情况不熟悉，办法不好，干部不够，有些干部在作风上也有毛病，刘主席报告中已经作了审慎的检讨。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地主的抵抗。有人说地主的抵抗是因为负担太重，这种现象确实有，但只能是个别的，绝不会是普遍的，这可以拿四川、云南、贵州、西康^[7]的材料来说明。西南区的耕田是二亿亩。地主占有土地百分之七十左右，这是合乎实际的。如果我们只按地主占有一半土地，土地平均以百分之五十的租额来计算，即是说地主占有一亿亩土地的租额等于五千万亩田的全部收入。又按西南全区常年土地产量每亩为二百二十三斤黄谷，折成米是一百六十七斤，地主的收入应有八十三亿五千万斤米。

地主负担公粮，如以平均百分之四十计算，地主应该拿三十三亿四千万斤，如果算百分之三十，也应该拿二十五亿斤。现在西南区只收到二十四亿斤米，实际上所收的公粮有相当大的数量是农民交的。这证明地主负担并不重，问题是他们不愿意缴纳。正由于他们的抵抗，产生了农民的不满和干部的急躁，混乱也由此而产生。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当农民觉悟组织起来，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时，如果地主再采取抵抗的方法，恐怕是要吃苦头的。这一点我们经验很多，克服这种困难，需要从干部把握政策，说服农民，教育地主这几方面去做。

很多委员提出加强宣传可以减少混乱，这是很对的。混乱对于革命不利，对农民自己也不利，所以农民并不赞成混乱。只要办法妥善，干部又经过了整风，是可以避免混乱的。我们才到重庆的时候，尽量说服工人减低工资。有一家私营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工会负责人亲自去与工人谈话，要工人不要有过高要求，工人不听，当面指责他是替厂方说话，我们的同志还是很耐心地讲，终于说服了工人。农民是分散的，需要我们的干部掌握政策，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如果农民没有领导地行动是有可能乱的。与农民搞好关系，让农民依据法理进行斗争，还要组织人民法庭，这是避免混乱的方法，对地主来说也是有利的。我们一方面要更好地去组织领导农民，尽可能地避免混乱，但另一方面也要使地主懂得不抵抗就没有混乱，少抵抗就少混乱。还有人说，你要退押他要当土匪怎么办？我们应该劝他们不要当土匪，但是，我们也不要怕他们当土匪，也不怕他们打游击战争。我们的军队、干部和人民，应该估计到有些人要打游击战争，切不可丧失这种警惕，一经发现迅速扑灭，这就是对付那些拿起枪来反对革命、反对人民的反动派的办法。

上面是对减租、反霸、退押形势的分析。我们领导和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运动约束在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范围内去进行。所以，规定妥善办法是必要的，由各省和行署制定实施细则也是很有必要的。刘主席报告提出“急”、“缓”、“少”、“不”四个办法^[8]入情人理。本来押应该全部退，提出这四个办法，对地主照顾得很够了，农民要吃些亏，可是它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问题，能够减少许多混乱。实际上，这对农民来说是很有好处的。所以，要说服农民实行这四个办法。此外，我们还预见到地主会曲解这四个办法，作为抵抗的口实，能全退者要求少退，能少退者要求不退，这种情形尤其应该预防。

退押的具体问题很多，应该由各省、行署加以研究，订出细则。但是，必须了解任何一个细则都不可能解决一切具体问题，具体问题只有在运动中由政府、农民协会去解决，农民协会解决不了的，由人民法庭解决。因此，农协的组织必须纯洁，人民法庭处理案件必须根据四个办法和实施细则。在减租、反霸、退押运动中，我们应该紧紧依靠农民，同时也必须团结农村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参加这个运动，这是很有好处的。成立减租反霸退押委员会，我认为可以考虑，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9]里面有一个协商委员会可以起这种作用。在减租运动中，应该充分地运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协商委员会，使各种情况更容易了解，各种意见更容易集中，这是少出乱子的一个重要方法。

三、干部问题。

这次会议对干部的作用作了正确估价。老干部有三万多是由北方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坚持地下斗争的。一方面，他们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不怕牺牲，任劳任怨，对于人民的事业无限

忠诚。他们对自己的缺点，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加以纠正。他们在解放西南的工作中是有成绩的，没有他们，西南的敌人不能打倒，人民不能翻身，所以人民欢迎他们，敌人痛恨他们，国民党匪特更明白地提出了“不打本地人，专打北方人”的口号。另一方面，干部也要检讨自己的缺点，这些干部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这些缺点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定可以克服的。我们不原谅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只有这样，人民的事业才能得到胜利。所以，整风是必要的。相信我们的干部对于朋友善意的批评，一定会诚恳地接受。同时，还必须说明一点，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我们领导上也有责任。

区别干部缺点的性质是重要的，革命干部的缺点，往往属于工作方法问题。区别一个工作人员是否有错误，主要看他在工作时是否联系了群众，是否依靠了群众。我们责备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因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脱离群众，不是依靠广大群众去进行工作。我们批评干部乱打乱捕，也是因为这种做法脱离群众，丧失社会同情，而不是批评他们与反革命进行斗争。简单命令方式会给敌人破坏革命工作以可乘之机，会在客观上给敌人以口实去煽惑落后群众，会使自己孤立起来，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果是站在人民方面忠诚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遇到他们有错误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他们改正错误，使工作做得更好。

干部学习工作艺术很重要。什么是工作艺术？工作艺术就是要善于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善于同敌人作斗争，特别要善于对付那些狡猾的敌人；善于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我们之所以

教育干部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就是因为有些干部不懂得这样做工作。

四、少数民族问题。

团结少数民族的关键是抛弃大汉族主义。我们抛弃了大汉族主义，才能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有人拿凉山彝民抓汉人当奴隶这件事，来证明少数民族如何可恶，但是要知道，就是这样的行为，也是由于大汉族主义的结果。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纲领是正确的，但是少数民族重视的是事实，如果只讲不做，他们就会怀疑和反对我们。所以，对于少数民族工作的各项决议，我们的责任是坚决实行。

五、反官僚主义问题。

这次会议有许多决议。斯大林认为，决议的通过仅仅是事情的开始，正确的决议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在于决议的执行。一件事情，毛主席说有三个关键：打主意，派干部，做检查。我们主意打了，干部派了，所以今后各级政府的责任，是检查这些决议的执行情况。这次会议的主要决议是反霸、减租、退押，就要检查政府的一切人员是否执行了这个决议，如何执行这个决议，是否依靠农民来实行这个决议；要检查我们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是否执行了这个决议；要检查人民法院的干部和其他干部有无贪污腐化、受地主收买贿赂等事情；要检查工作中有无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只有经常地检查工作，才能发现问题，普及经验，才能把事情办好。对于其他各项任务，都应该这样加强检查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决议，也才不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

注 释

〔1〕刘主席的报告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所作的《西南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

〔2〕四个报告 指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张际春所作的《关于西南区减租问题的报告》，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岱峰所作的《关于西南财经工作的报告》，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所作的《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部部长楚图南所作的《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

〔3〕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4〕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5〕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6〕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7〕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8〕四个办法 参见本书第212页注〔10〕。

〔9〕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对成立东藏自治区域 人民政府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

西康^[1]区党委：

未江转来康定地委电悉。在藏东早日成立自治区域人民政府是完全必要的，但因为少数民族问题极端复杂，我们经验很少，故对每一个细节问题都必须在反复商讨之后特别是与少数民族代表人物交换意见之后才能实行，否则容易陷于被动，且有出乱子的可能。康定地委对于建立筹备委员会这样重大性质的问题，没有事先向区党委请示，是不慎重的、错误的，应在今后工作中引以为戒。地委所定筹备委员会的人选，对于东藏本身的领导人物如格达^[2]、夏克刀登^[3]等照顾不够，将会引起他们（特别是夏）的怀疑，这是很不利的。要肯定在东藏应以团结格、夏等人为主，不是以团结阿旺^[4]为主，阿旺如确实很好，可考虑在西藏解放后参加西藏领导机关，也可考虑任西南军政委员会^[5]委员，你们可向阿旺说明他的工作是在西藏，以免引起他的不安。对于筹委会的名单，如已公布可不必改变，但应将它变成一个纯粹筹备召集民族协商会议的技术机关，我们对夏克刀登也是这样解释的。对东藏自治区域人民

政府的人选问题已与廖志高^{〔6〕}同志议定，一切由他传达不赘。

西南局

八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2〕格达 即格达·呼图克图，藏族，西康省甘孜县（今属四川）白利寺活佛，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3〕夏克刀登 即夏格刀登，藏族，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 年 11 月任西康省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4〕阿旺 指阿旺嘉措，藏族，曾任西藏拉萨色拉寺堪布。1950 年 11 月任西康省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5〕西南军政委员会 1950 年 7 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6〕廖志高 当时任中共西康区委第一书记、西康省主席、西康军区政治委员。

务必注意各地农协的 组织和领导问题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各地并中央：

兹将贵州八月十九日的通报^{〔1〕}转发你们参考。各地农协的组织和领导问题，务必引起严重的注意和警惕，各方面的材料证明，现在已经建立的农协，问题是不少的，必须加以适当的整理，才能担负起减租反霸^{〔2〕}的任务，而整理的关键则在于首先把领导成分弄清楚。至于民兵在目前是不应该建立的，望各地注意。

西南局
八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指 1950 年 8 月 19 日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匪特的破坏办法及我之对策通报》。

〔2〕减租 见本书第 56 页注〔8〕。反霸 见本书第 30 页注〔3〕。

民族杂居地区不要 急于搞减租退押运动

（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

西康^[1]区党委：

申冬电^[2]已复。经我们再加考虑，有重复说明必要。我们认为，为了不致影响到少数民族，在民族杂居地区不要急于去搞减租退押^[3]运动是正确的。同意你们用当地专署或县政府（不必用省政府）名义发布一个文告，最好还同时专门召集彝民代表会议加以说明更为有效。在公布时，一般只说明在少数民族中不实行减租反霸^[4]退押，因为少数民族的改革，只能由少数民族自己去决定，同时也应说明在民族杂居地区，只在汉人部分实行，凡涉及少数民族人民的部分则一般不应实行，只有在少数民族人民要求实行时（这往往是对少数民族有利的），才可以在经过专署以上政府批准的条件下酌量情形加以实行。如果在这种地区实行时，有某一家少数民族人民不愿实行时也可不予实行。我们不应一般地宣布杂居区域不实行，因为在杂居区域的汉人部分迟早要实行的，我们暂时不在那里实行是对的，但这只是步骤上的问题。

西南局

九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2〕申冬电 指 1950 年 9 月 2 日中共西康区委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请示电报。电报提出，在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现在不宜急于进行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由于有人借机挑拨民族关系，建议用政府名义发布文告，予以说明。

〔3〕减租 见本书第 56 页注〔8〕。退押 见本书第 192 页注〔5〕。

〔4〕反霸 见本书第 30 页注〔3〕。

为西南军区第一届英雄 模范代表会议题词

（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

不骄傲，不疲倦，加倍的努力工作和学习，密切的联系群众，永远的保持你们的模范和光荣。

邓小平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迹刊印

发扬积极因素 战胜消极因素^{*}

（一九五〇年九月七日）

我首先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向西南军区第一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致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这种会议在我们人民解放军里面开过很多次，每一次这样的会议都要把我们的军队推向前进一步，把我们的革命推向前进一步，所以这个会议是重要的。我们的革命队伍在二十三年的斗争历史中，是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我们二十三年的斗争取得了今天全国的胜利，经过了无数的艰难过程。这个斗争是艰苦的，是复杂的，这个斗争的主力就是我们这支军队。二十三年的历史证明了我们是真实可靠的人民的强大力量。我们没有辜负人民对我们的希望。我们之所以能够满足人民的要求和希望，完成我们过去这一段的光荣任务，乃是我们不断地反对内外敌人和战胜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取得的。

二十三年的历史，在我们党一手培植一手领导的人民军队里面，始终贯穿着两种因素的斗争。一种是积极的因素，就是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因素。在我们革命队伍里面，这是主导因素，这就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正气。但是在我们革命队伍里面，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消极的因素，就是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区第一届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级的错误倾向与思想意识。这些倾向与思想意识都是阻碍革命前进的，也就是存在于革命队伍中的一种邪气。在每一个革命的阶段，我们总是发扬了革命的积极因素，发扬了正气，克服了革命队伍里面的消极因素，克服了邪气，我们的革命才能够继续前进，我们的革命才能够取得胜利。我们的革命队伍里面的积极因素，是毛主席领导的党所领导所依靠的因素，没有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这种革命的积极因素是不能够得到发扬的。我们革命队伍里面阻碍革命前进的消极因素，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队伍所反对所斗争的因素。没有党，这种消极因素也是不能够克服的。这两种因素的斗争表现在各方面，甚至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上面。特别在革命的关节上，这两种因素的斗争特别明显，特别尖锐。

我们的革命过了很多关，有困难的关，有胜利的关，有大关，有小关。这些关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我们是过得很好的。大家回想一下，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我们过了很多大关，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创造了红军，保存了革命力量，给中国人民以希望，我们的革命才一步步地向前发展。当时革命队伍里先后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1]的分裂主义，使革命受到了损失。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战胜了把我们革命队伍引到失败的那些邪气。抗日战争中，在毛主席领导下形成了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们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在我们队伍里面，曾出现过企图把我们的队伍变成国民党的附属品的右倾投降主义，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过了这个关。在自卫战争中，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向我们袭击，我们被迫拿起枪来自卫，我们的队伍当时由分散的游击战争转到大规模的正规战争，这一关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又过来了。解放战争的第一年中，我们始

终是处在防御阶段，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却，结果我们消灭了敌人，可是也丢掉了大块的土地，也有些人因此而悲观失望。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战胜了消极因素，我们终于转入了进攻，一直到全国解放。这些关叫大关，二十三年斗争中，我们几乎过了二十一年的困难关。

我们有没有胜利关呢？我想到的有两个，第一个是日本投降的时候，我们大家当然应该高兴，当时我们队伍里面有些人觉得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可以享福，可以休息了，对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其支持下的国民党看不见了。我们的党反对了这些错误的倾向，这个胜利关过来了。第二个就是现在，全国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只剩下台湾、西藏没有解放，少数匪特没有肃清，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又有些人看不见敌人了，以为我们的事办完了，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营垒看不见了，国民党的残余看不见了，地主阶级也看不见了，他们认为战争打了这么许多年，应该休息了。甚至有些革命多年的干部，也产生了腐朽蜕化的思想，做出了一些不利于革命的事情。他们居功自大，骄傲横蛮，脱离群众，只图享乐，尽兴地发展个人主义，漠视革命队伍的严肃性和纪律性，闹男女关系，少做工作，甚至不做工作。他们用这些思想和行为来腐蚀我们的革命队伍。这是我们要过的胜利关。这个胜利关我们一定要过好，因为有毛主席领导的党来领导我们。

每一个革命阶段里面，总有一种积极因素、一种消极因素在斗争。在我们革命队伍里面，总有动机不纯品质恶劣的人，这种人往往在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能施展本领，因为在革命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革命队伍里面的斗志最坚强，我们革命同志的警觉性也最高，我们的斗争像烈火一样，凛然不可侵犯。他们不敢来侵犯。但这种人一遇到我们革命胜利的

时候，就有机会了。我们革命队伍里，由于有些人的警觉性不高或一时的不警惕，他们就找到这些人作对象，来破坏我们的团结，来腐蚀我们的力量，来松懈我们的斗志。历史证明，敌人从外部来进攻是不可怕的，敌人如果转到我们内部来瓦解我们，那是最可怕的。这种动机不纯品质恶劣的人，虽不一定是反革命，但是，他们的思想是反革命的，他们的行动是破坏我们团结、瓦解我们斗志的。他们还有一点市场，就是那些思想不健全的人，有的跟着走，有的客观上帮助其发展。对这种人，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称之为自由主义者。我们今天必须克服这些错误倾向，暴露那些品质很坏的人，纠正那些抱着自由主义倾向的人，才能整齐我们的队伍，完成巩固胜利、加强国防力量和建设我们国家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过去的关，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过得好，我们相信，我们以后的关也能过得好。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毛泽东式的党，是依靠了绝大多数的坚贞不屈的革命分子、革命战士、革命党员，基础是建立在千千万万坚决的、觉悟程度很高的人们的上面。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革命队伍里面所出现的千千万万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座的一百三十七位同志，就是千千万万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中的一部分，是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一部分。这些千千万万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战胜内外敌人的斗争中都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不仅在口头上，主要是在实际行动上同那些消极因素对立起来，拿行动证明它们是错误的，是对革命有害的。我们大家一起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它们。

千千万万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之所以是宝贵的，就是因为他们有着高贵的革命品质。

第一，他们的高贵品质，表现在始终如一地忠实于人民事

业，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他们既然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就必然一切以革命利益为前提，也就没有什么个人打算。拿个人利益来说，最高的大概可以说是生命了，他们连生命都不顾，同那些所谓没有功劳有苦劳和天天为个人打算的人对比起来，他们相信人民的事业一定胜利。

第二，他们的高贵品质，表现在始终如一地相信毛主席领导的党一定能够引导人民走向胜利。他们有时候也会迷失方向，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相信毛主席的话是对的，拥护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下面去努力。他们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去发挥他们的高贵品质，同那些对革命有怀疑的和对毛主席对党的话有怀疑的人完全区别开来。

第三，他们的高贵品质，表现在任何时候都使自己并影响着别人保持坚贞的革命精神。在困难的时候，不悲观，不急躁；在胜利的时候，不麻痹，不松懈；时时刻刻警惕着敌人，就像苏联小说所写的“不屈的人”一样，他们是真正不屈的人们。

第四，他们的高贵品质，还表现在与群众在一块，不是脱离群众，而是联系群众。在座的同志们体验是很多的，无论哪一个战斗都是不能依靠一个人取得胜利的。任何事情也都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做好的。我们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都是很朴素的人，都是大公无私连自己生命都不要的人，总是联系群众，而且总是向群众学习的人，始终如一地前进的人。他们区别于另外一种人，就是那种自高自大，脱离群众，不愿意向群众学习的人。那种人要获得光荣的模范的地位是不可能的。在革命队伍里面也曾经有那么一种人，在某一次战斗或某一件事情中造成了惊人的事迹，但是他们的功绩仅仅是昙花一现，就

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做到始终如一地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始终如一地前进。

我们的队伍里面千千万万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代表革命的正气，是人民最好的榜样、最可靠的基础。依靠这些人，我们才能战胜那些消极因素和邪气，所以我们必须向这些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学习。一切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事迹，必须加以表扬，并发扬这些战斗英雄的高贵品质。没有他们的这些高贵品质就不能够为人民办更多的好事。

我们今天虽然胜利了，但事情还是很多的。我们要巩固胜利，我们的革命队伍不但不能削弱，相反还要继续加强，好建设我们的国家。

同志们，我们的敌人还很多，还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它们正在进攻朝鲜、侵占台湾，他们甚至敢于向我们的东北挑衅。我们的国家才开始步入建设的初期，我们所做的事情，正像毛主席告诉我们的，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军队的责任并没有减轻。我们要巩固胜利，战胜敌人，要帮助人民彻底翻身，巩固我们的国防。如果敌人敢于侵犯我们，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把他们加以消灭。我们还要参加各种建设。革命工作是做不完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革命战士，他的工作是一辈子也做不完的。

同志们，我们不要只看到外部的敌人，还要看到内部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封建的思想、资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其表现形式是缺乏无产阶级的坚定性，散布各种各色的谬论和毒素，以瓦解我们的斗志，削弱我们革命队伍的政治严肃性和纪律性。我们不仅对明显的敌人不要丧失警惕，而且对腐蚀我们思想的敌人，对那种隐藏在我们部队中品

质恶劣的阶级异己分子，也不要丧失警惕。自由主义是有害的。

同志们，我们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是做得好的。现在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进军西藏中，在剿匪斗争中，还是在其他一切工作中都是英勇顽强，积极努力，具有人民革命战士的高尚品质。我们千千万万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就是这些人的代表。正是在这样的時候，千万不要丧失了我们对于敌人、对一切坏倾向的警觉。我们今后更要注意发扬正气，克服邪气，发扬建设性的东西，克服破坏性的东西；发扬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也就是发扬革命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的因素。千千万万革命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在二十三年来的革命过程中克服了困难，战胜了敌人。我们相信，今后也还是能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

我们要感谢千千万万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感谢他们对革命对党的伟大贡献。在今后的建设任务中，我们还需要出现更多的新的千千万万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我们的党就是要依靠出现比今天更多的新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来战胜内外敌人。有了他们，我们就可以告诉一切敢于侵犯和破坏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事业、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张国焘 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期间，曾开展错误的“大肃反”，杀害了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

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背叛共产党，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

关键是把党的组织整理好^{*}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

七八两月，地方工作有两件大事，一是准备召开西南军政委员会^[1]及各省、区、市政府委员会的成立会议，二是进行整风^[2]。军队则集中于进军西藏、剿匪^[3]和准备复员三件大事。有一部分未参加剿匪的部队和直属机关也进行了整风。军队的整风运动要在今年冬季才能普遍进行。

西南各地的整风情形已有专门报告。县级以上干部的整风，八月份已先后结束。区以下干部的整风，大约在九月中旬均可完成。根据各地反映，这次整风无例外地收到良好成绩，既能整出问题，在若干问题上打通思想，又能做到不伤害干部的积极性。开始动员整风的时候，不少干部存有戒惧和不安的心理。但整风之后都感到愉快，认为解决了问题。只嫌时间过短，有些思想和工作问题尚未获得解答，感到不够过瘾。这次整风，县以上大约是二十天左右，区以下半个月左右。因为时间短，只能集中解决几个思想和作风上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又是解决任务和政策的统一性和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些最中心的问题，而对于其他问题则有意识地加以放松。经验证明，凡能集中解决主要问题的成绩都好；凡属没有中心，什么问题都企图解决的成绩都差。

* 这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节录。

这次整风获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先从领导上进行自我批评和从批评领导做起，故能解除干部的顾虑，敢于进行自我批评，打通思想。这次暴露的问题也不少，在整风中未能完全解决。例如，有少部分县团以上的干部利用婚姻法闹离婚；一些高级干部出现男女关系问题，使领导机关丧失了威信，大大地妨害了工作，影响亦极坏；有些干部存在着功臣思想，对现有工作感到不满，对业务又不努力学习，总觉得党对他们照顾不够，对起用青年干部和安置党外人士心怀不满；党内还有另外一种品质恶劣的人，这种人有的跟着党走了十多年，可是思想作风却很少有党员的味道；党内一有问题，他们总要兴波作浪，从思想上和行为上散布毒素。他们又善于看风转舵，一遇批评就很快缩回头去。有的还标榜：“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并引以为自豪。胜利后，由于党的组织松懈，这种人数虽然不大，但显得非常活跃。西南党的情况是：各级领导机关忙于一般政策和工作的指导，没有足够精力注意到党的内部生活的指导。党的生活很不健康，自由主义空气颇为浓厚。这是各种坏倾向都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少数品质恶劣分子得以兴波作浪的重要原因。

西南党的组织，除军队系统外约有党员八九万人，其中五万左右为随军南下和由军队调到地方工作的干部，也有一部分勤杂人员，数目不大。土改^[4]以前，在农村中不宜发展党员；在城市工人中，一年内也只宜作稳重的发展。这给了我们以整理组织的良好条件。如果我们不利用现在数目较少、易于整理的时期把组织整顿一下，我们很容易重复老区建党的那些错误。而这在西南是应该避免和可以避免的。我们觉得，一个胜利了的党对于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些。我们有一批党员的觉

悟确实太低，这只能逐渐地而且主要从教育中加以提高。但如果我们不在党的组织上采取严肃的态度，就不可能使党员水准即共产主义的水准逐渐地获得提高。对于个别品质恶劣的人，对于若干完全不合乎党员条件的人，对于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谨慎地、个别地清洗出党是必要的。

因此，我们根据中央组织会议的精神，拟在最近西南局组织会议上，专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拟出整理组织的计划。整理组织的重点，仍然放在党的教育上面。需要开办大量的党员训练班，需要有系统地办党校，着重训练党的组织人才。同时对于党员的清洗和吸收，也应作谨慎而周到的规定。军区也准备召开一个组织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军队党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年的时间内，把现有党的组织整理好，那我们就能在较好的基础上，进行西南地区的党的建设工作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西南军政委员会 1950年7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2〕整风 见本书第143页注〔5〕。

〔3〕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4〕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吸收藏族优秀青年参加人民解放军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

西康^[1]区党委并转格平^[2]同志、十八军党委报中央：

申鱼电^[3]悉。

你们所拟藏东区域自治方案除军事制度一点需要继续研究外，余均同意，请即照此进行。在军事上，如果条件具备的话，创造一个由我党干部及先进分子掌握的藏族武装，这个武装属于人民解放军之一部分，吸收藏民中的优秀青年参加，其待遇与解放军同，先成立一两个连，再逐渐扩大为一个团，这个部队一方面是军队，一方面是生产队，一方面又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学校，同时又表示了少数民族有参加国家军队建设的同等的权利。如果这样办，现在藏东的藏族党员和团员主要应放到这个部队中去起骨干和领导作用。天宝^[4]的主要工作也应是建设这个部队。请你们考虑一下，这样做有无条件。至于目前保存军分区的组织，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天宝任分区副司令员是可以的，天宝是否应兼任自治区域人民政府军事处长（这个处有无设立之需要应加研究）亦请你们通盘考虑提出意见再作最后决定。

西南局

九月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2〕格平 即刘格平，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3〕申鱼电 指 1950 年 9 月 6 日中共西康区委致中共中央西南局并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政治委员王其梅的电报。电报拟定的东藏自治区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民族协商筹委会仍作为研究性组织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工作；自治区政府拟设民政、财政、军事、秘书处等；康定军分区仍须存在，如民兵统一于军分区，可以考虑由天宝任副司令员，或民兵仍直接由政府军事部门管理，这个问题尚待研究。

〔4〕天宝 藏族，又名桑吉悦希，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关于农业税率问题^{*}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

你对农业税不超过百分之十三的解释是对的。政务院公布的税法^[1]，是指的不超过全国总的常年应产量的百分之十三，刘主席^[2]在西南区工作任务的报告中也是这样说的。按中央规定的西南一九五〇年度秋征（只是秋征）任务，不致超过西南总的应产量的百分之十三，特别在今年收成较好的情形下，不至于超过。但这决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不超过。事实上会是：有的地方合乎百分之十三，有的富庶地方必须超过百分之十三，有的贫瘠地方必须少于百分之十三。只有在较富庶地方超过百分之十三，才能达到总的应产量的百分之十三，这是很显然的道理。有可能某些县、区、乡会超过百分之十七八，甚至百分之二十。可是这种地方负担百分之二十，还是比贫瘠地方负担百分之十要轻些，这也是很显然的道理。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
刊物《西南工作》第19期刊印

^{*} 这是邓小平给中共川东区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的信的节录。

注 释

〔1〕 政务院公布的税法 指 1950 年 9 月 5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

〔2〕 刘主席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

为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学员题词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走向国家需要你的岗位上去，为建设我们的国家而尽自己一切的努力。

邓小平

根据重庆市博物馆保存的手迹刊印

关于西南党的组织发展和巩固^{*}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首先要明白我们的党是什么党。马列主义规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员不管来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必须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必须合乎共产党员的标准。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这一点是必要的。在我们队伍里有若干党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他们企图把党的水准降低。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假如我们不把党的性质弄清楚，是无法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有这样一些党员，他们不相信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说我们党是农民党。我们党工人成分占百分之四，农民、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所以，外国同志也在怀疑我们党不大像无产阶级政党。这种从形式逻辑看问题是不对的。有些人找出工人的落后性作为根据，从思想上看不起工人。我们有什么理由责备工人阶级？重庆有几百名党员，为什么不在工厂中去建立堡垒，进行启蒙运动呢？不做工人工作，不积极教育工人，这就是非无产阶级观点。

工人落后是事实，这应责备我们自己。世界工人运动不经过布尔什维克教育总是落后的。苏联工人为什么进步？上海工

^{*}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工作会议上报告的第二部分。

人、“二七”京汉铁路罢工^[1]工人、安源工人为什么进步？主要因为党的工作做得多。我们有的军代表对工人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原因主要是思想上看不起工人。干部思想中是不是明确了必须把工人组织起来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还是一个问題。

我党长期在农村中工作，基础也在农村，党员百分之九十六是无产阶级以外的成分，党内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相当浓厚。土改^[2]是无产阶级提出来的，我们的纲领符合农民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积极参军、支前。但今天要把新民主主义带到社会主义，有相当多的党员就跟不上了。土地改革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他们认为革命成功了；过去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大多是纯民族主义观点，看不惯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凶横。今天国民党打垮了，帝国主义赶走了，他们认为革命也就成功了。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只是最低纲领胜利了，离最高纲领的目标还差得远。毛主席说万里长征我们才走完了第一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我们革命的最后目的。土改是不是就解除了农民的愚昧状态？是不是完全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呢？不是的。要通过讲道理向农民宣传，也要靠事实，把拖拉机、先进的科学技术给他们看，启发他们看远点。假如我们的党是农民党，那就会逐渐变为被革命的党。

十年土地革命、八年抗日战争、四年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获得的？回答是肯定的。过去我们党一直是用无产阶级思想、纲领、路线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否则就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彻底。李自成^[3]是农民党，虽然没有采用政党形式。太平天国^[4]有农民纲领，结果能成功吗？农业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反无产阶级思想

的，所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中有一部分是有害的。毛主席叫我们随时洗脸是必要的，并且还要洗心，要脱胎换骨，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过程。我们党以搞工人运动起家，虽然党只有百分之四的工人成分，但都是经过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思想锻炼出来的骨干，所以它能保持一定的抗毒素，经常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作斗争。今天不加大党内的无产阶级成分，不增加抗毒素是危险的，要想从农业国进入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要克服弱点，第一是增加工人党员的比重，在工人中稳步地大量发展，在农村中只能做到谨慎个别地发展；第二是加强无产阶级、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提高党员觉悟。今天我们党领导革命胜利了，担负责任大、人民要求高，我们自己也要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要求都更高些、更严些。“没有功劳有苦劳”，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自满思想。有的同志过去身上打了几个窟窿，现在就贪污、腐化。我们承认你有功，吃十年小灶也可以，但不要作共产党员。有的同志不愿做工会工作，军代表不接近工人阶级，这也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做到名副其实，第一要防止党员自满，第二要防止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不应该降低党员标准。

我们再来看西南党组织的成分，并由此来决定今后的组织工作任务。西南二十多万党员，大部分在军队中，进军西南的外来地方干部、军队中调来的及地下党共计八万多人，其中地下党有五万多人。以后在组织发展上应该坚持城市松、农村紧，把基础打好，稳步地按照马列主义、毛主席的建党原则去做，一发展，二整理，三教育。准备明年较多地发展工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三十的工人成分。工会会员、青年团团员的发展可以放松一些，并在他们中间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

育。前一时期重庆对这项工作注意不够，再不注意就要犯错误了。

建党必须有专门的人来搞。少奇同志多年前就提出建党要靠组织员、组织家。党校现阶段的中心工作就是专门培养这样一批人才，他们工作要专业化，应该懂得什么人能入党，入党后应该怎样过严格的组织生活，经常检查和督促支部的组织生活。党的基础是支部不是小组，以小组代替支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不论在工厂还是在农村中发展党员，都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要个别地审查、吸收，不应该整批地号召入党。农村中应该更谨慎些，真正积极的、觉悟高的可以个别吸收。城市今年应该依靠支部、青年团和工会把党的教育和影响深入到工人中去，明年工厂应有百分之十的工人入党。

要搞好审查或整理党组织工作。要看到有一部分党员不合格，对个别品质极坏的必须清洗。有一个干部在汉口病了，占一幢洋房子，一天大叫中菜西吃，后勤部只得给他八个病号饭，病好了回到重庆还要八个病号饭。这种人最好请他自动退党。又如重庆市朝天门一个税收干部，每月工作时只收税三十几万^[5]，但实际上可以收取一千多万。这种消极怠工的你们说合格不？有的南下干部身上有窟窿，骄傲自满，认为革命成功了。有一位同志要回上海休养，以退党来威胁，这种思想觉悟不高的请他出党，否则按党章开除出党。到西南后我们忙于行政，党的组织松懈，支部工作没人做了，坏思想、坏作风就腐蚀我们党。今天个别的、少量的清洗，以一个典型教育大家很有必要，这会使我们党更健康。

整理和发展党组织都是建立在教育基础上的。清除个别不符合条件的人是必要的，但绝大多数人应该通过教育来加强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有的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不知道

共产党员的责任、任务是什么，不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义。有的乱搞男女关系，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得不管，我们必须把这种人从“防空洞”中拉出来。党内还存在“革命这样多年应该照顾”的思想。把资格作为提拔干部的原则就错了，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文件中只有德、才二字，如果讲资格，就会阻碍我们提拔新干部。一个区级干部搞一个厂比地级干部搞得好，我们就要这个区级干部；一个青年团员比一个十年党龄的党员收税收得好，我们就要这个青年团员。不冲破这一点就不能前进。党是依靠进步力量去做工作的，假如我们要决心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应该做到严比宽好，精比粗好。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二七”京汉铁路罢工 1923年2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组织总工会的自由，举行总罢工。其他许多铁路的工人也纷纷响应。2月7日，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等，残酷地屠杀京汉铁路的工人，造成了二七惨案。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3〕李自成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1628年，陕西北部形成农民起义的潮流。李自成参加高迎祥的起义队伍。1636年在高迎祥死后，被推为闯王。李自成在群众中的主要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同时他不准部下扰害群众，曾经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来约束自己的部队。因此，拥护他的人很多，他的队伍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主流。1644年起义军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4〕太平天国 指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反抗外国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1843年夏，洪秀全在广东创立拜上帝会。1851年1

月，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拜上帝会会众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攻入湖南、湖北。1853年，经江西、安徽，攻克南京，并在南京建都。随后从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军在它占领的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在清朝军队和英、美、法等国侵略军的联合进攻下，太平天国起义于1864年失败。

〔5〕三十几万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开国一年在西南^{*}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紧接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典礼之后，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奉命进军西南，直捣美蒋匪帮在大陆上的最后巢穴，解放西南七千万人民。从十一月初发起战斗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止，前后不过五十七天，就基本上结束了这个战役。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前进了两千里到三千里，消灭了敌军九十万。

此后，我们进行了比之行军作战尤为繁难的工作，九个月（云南是七个月）的努力是有成绩的。

四十余万起义或投诚的原国民党军的改造工作已告完成，除个别部队外，都已按照人民解放军方式进行了整编，所有官兵都作了妥善的处置，绝大部分均留在部队工作或送入学校学习。

从二月尾开始到处蜂起的国民党匪特所组织的“游击战争”，业已遭到我剿匪部队的致命打击，消灭了土匪四十万，所有较富庶的腹心地区和交通要道都已净化，其余窜逃至边沿山地的残余匪特已不难肃清。

城市工作已逐渐走上轨道，社会秩序是巩固的。人民的政治学习运动已获初步成绩。工人、学生、青年、妇女及其他群

^{*} 这是邓小平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周年发表的文章。

众已有初步的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在协助政府各种工作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从克服了旧历年前后的物价大波动之后，物价一直是稳定的。调整工商业已获显著成绩，从七月起市场已趋好转。失业工人的救济工作仍在进行，失业现象亦见减少。农村经济情况，由于免除了国民党政府和封建势力的各种苛捐勒索，加上土匪的肃清和今年有八成年景的收成，农民开始喘过气来，城乡交流也较前舒畅。

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已基本完成。税收只征起一九五零年度全年的百分之五十五，是为各项工作成绩之较差者，但在保障供给、稳定物价等方面，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农村封建势力已受到初步打击，农民协会会员已达五百万人左右，各省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及农民代表会议已普遍召开，人民的团结力量已见增强，这为今冬明春的农村减租运动奠定了基础。七月间西南军政委员会^[2]的成立，更加强了全区工作的领导。

在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宣言^[3]上签名的人数已达九百余万，运动正向农村深入开展中。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亦获得了相当的成绩。

这些成绩的获得，是各界人民团结和各级干部辛勤努力的结果。但必须指出：不少干部在执行任务中，犯有官僚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的错误，有的错误还很严重。为了纠正这些工作中的错误，各地一律进行了整风运动^[4]。在运动中，由于充分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效果良好，干部在思想上和作风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他们能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指出这些成绩，并不是说西南的工作已经步入正轨，只能

说我们初步地取得了工作阵地。事实上，在我们面前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很不好。

我们的财政收支太不平衡，赤字之大恐为全国之冠，特别是税收成绩太差，必须努力解决。这种情况使我们许多应办的事不能办理，常常由于财政上的拮据而致工作陷于被动。这一阶段我们大部分靠中央政府补贴，而我们的眼睛是不应该长远望着中央政府补贴的。

我们在管理工业方面还没有经验，还没有入门。我们有些在工厂工作的干部还不懂得依靠工人、团结职员去进行工作，脱离群众现象是很严重的；有的还固守着管理农村或管理军队的方式去管理工厂，而致弄得一筹莫展。工会工作的问题也很多。这是我们今后必须提到首要地位来加以解决的。

我们在农村的阵地还极不巩固。封建势力虽已受到初步打击，但至今仍然基本是农村的实际统治者。农民的组织 and 觉悟程度都还很差，农民所得的实际利益还很少。如果我们不从领导农民的翻身运动中去把农民群众普遍地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那么封建势力是打不倒的，人民政府是不能在广大农村获得自己的基础的。这个问题尚待我们在即将开始的减租运动和明冬开始的土改^[5]运动中去解决。

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由于采取了谨慎的方针，一般说来，没有出什么较大的乱子，这是好的。但是实际情况的发展，已经要求我们进一步地去解决更多的问题。例如实行区域自治和在民族杂居区域组织联合形式的政府^[6]的问题，采取具体而稳重的步骤去帮助各兄弟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卫生事业的问题，都应列入今后的具体日程之上。

彻底消灭残余土匪武装，严厉镇压特务破坏分子，更是我们应该百倍警惕、不可丝毫忽视的事情。

总之，西南由于解放较迟，干部不足，和其他地区相比，我们的工作效率是较差的。我们九个月来的若干工作成绩，只是获得一个前进的基础，而这也是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如果我们发生错觉，如果我们对于封建势力仍然强大、匪特活动仍然猖獗、基本群众尚未充分组织和发动这些基本情况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因为有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就骄傲疏忽起来，这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10月1日刊印

注 释

〔1〕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2〕 西南军政委员会 1950年7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3〕 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宣言 由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于1950年3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发表。宣言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号召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在这个宣言上签名。随后，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签名运动。

〔4〕 整风运动 见本书第143页注〔5〕。

〔5〕 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6〕 在民族杂居区域组织联合形式的政府 见本书第205页注〔12〕。

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八日）

根据最近的材料，我们政府所确定的每个措施，很容易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搞到手。有许多措施，其中包括中央的和地方的，我们还没有拿出去，敌人已经预先布置，煽动的口号已经出来了。比如物价问题，我们刚布置，煽动口号一下子就出来了。在这一年里，不但是政府、各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保密工作松懈了。无论各党派、政府各部门、群众团体，都有它一定的秘密性。国家各方面的工作都要通过计划去做，消息传播了出去，言者无意，听者就有意，这是非常危险的。有些事我们认为无关紧要，但被敌人知道后就有用，如我们的财经数字，工业建设计划等，被敌人知道了，就可以估计我们的力量，了解我们的重点，从而进行破坏。

在中央各机关和北京市机关里，经常发现有反革命标语，这就说明我们用的人有些不清楚，混进了一些反革命分子，而且不是个别的现象。所以这就联系到一个问题，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一定是人民阵营里面的，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要提请我们各部门注意。现在美国、英国、蒋介石反动派联合的特务机关，正在组织武装暴动，组织暗杀，组织各种破坏。在美国特务指导下、在英国政府保护下开会，把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十次集体办公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香港作为特务机关根据地，派遣特务在我沿海边界地方潜入活动，这一点我们的经验不很多，警觉性不够。

保密问题必须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的法律。过去中央颁布一个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政府各部门、各党派、军民等都要进行教育，各部门首长对于这个问题尤应经常关注。毛主席、周总理说，对于泄漏国家机密的处分，比其他法律要严厉。严格说起来，泄密不管自觉不自觉，都等于叛国行为。因为我们没有保密习惯，要进行教育。过去在解放区，洋人、帝国主义的间谍很不容易进来，结果，有的同志保密习惯很差，所以现在要进行教育。周总理特别说，各部门要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注意，比如每一个消息应该有一个范围，这样消息走漏以后，就要去找这个范围的人，如果没有范围就无法追究。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出一套办法，包括人事问题，各部门对于工作人员要经常审查，哪些人是有保证的，哪些人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我们政府里面不能说没有反动分子，不然就不会发现那些反动标语。

机关保密工作先从军政委员会^{〔1〕}开始，各部门怎样进行，请三位秘书长^{〔2〕}研究一个具体办法。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 军政委员会 这里指西南军政委员会，1950年7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2〕 三位秘书长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和副秘书长高兴亚、熊子俊。

在欢迎英模晚会上的致词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

出席全国英模代表会议^[1]的同志们回来了！我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

同志们这次在北京，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听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周总理和中央各位首长的指示。同时，也还有另外一个“老师”给同志们上了一课。这个“老师”历来就是很“关心”我们的，给我们上了很多的课，这次又给我们上了一次大课。这个“老师”是谁呢？就是美帝国主义。在我们开会当中，美帝国主义张牙舞爪比任何时候都凶，不单是侵略朝鲜，还想侵略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还想侵略正在谋求解放中的亚洲人民。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就说过，我们革命人民，我们共产党，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和革命战士，历来就有两个最大的“老师”，这两个“老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就是国民党蒋介石。这两个“老师”经常给我们打气，当我们斗志松懈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上课，当我们某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想办法。美帝国主义给我们上课，就是明白地告诉我们：我要来侵略你们，你们站立起来了，我要你们倒下去，不要你们站立起来。

毛主席指示我们，我们要站立起来不倒下去，就是要加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一指示是这次两个会议的中心题目。

因此无论战斗英雄会议，还是劳模代表会议，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建设国防，建设经济。有了强大的国防建设，有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任何帝国主义想来侵略我们都是做梦。失败的一定是帝国主义，不是我们。

所以，这次会议同志们的收获很大。帝国主义的行动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我们感谢毛主席给我们正确的指示，同志们回到岗位上去要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努力工作。

我们对于同志们获得这样的荣誉，当然是很高兴的。同志们享受了高度的荣誉。但对这样的荣誉，往往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挑担子”的态度，一种是“背包袱”的态度。“挑担子”的人眼睛向前看，“背包袱”的人眼睛向地下看。在座的诸位久经考验，历来是挑担子的态度，因此，可以保持这种高度的荣誉。“背包袱”的态度，虽然在某一次战斗中他曾造成惊人的事迹，但他的功绩仅仅是昙花一现。这是由于他们脱离了群众就一事无成，结果丧失了以往所有的荣誉。

同志们不要脱离群众，要拿“挑担子”的态度而不是拿“背包袱”的态度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你们历来是“挑担子”的，相信这次仍然会按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和中央各首长对同志们的希望，挑起更重的担子来。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主办的《人民战士》报 1950 年 10 月 25 日刊印

注 释

〔1〕全国英模代表会议 指 1950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 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昌都战役后的工作要点^{*}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张、谭、其梅^[1]并西藏工委^[2]，告成芳、支司^[3]，报中央军委、西北局：

此次昌都战役^[4]（包括十四军作战）获得完满胜利，对于解决整个西藏问题打下了有利的基础。你们当前的工作是抓紧时机，善于运用俘虏或投诚官兵及昌都区地方力量，开展政治攻势，以争取和平解决拉萨问题。同时，周密布置留驻部队的冬季工作，保证他们的供给，并从军事、政治、供给诸方面准备明年开春后进军拉萨。为此，请你们注意下列各点：

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的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注意他们的伙食。所有官兵都须经过七天左右的训练，主要根据我们在布告中所列的各项内容，解释我党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强调毛主席、朱总司令对于西藏同胞的关怀，要求他们提出问题，予以解答。训练之后，一律发给足够路费，分批地释放他们回家，以便将我们的政治影响迅速散布到全藏人民中去。

第二，对于噶伦^[5]及代本^[6]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

* 这是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起草的电报。

问题。

第三，对于俘虏的英印和其他外籍人员，应妥送甘孜，不得释放，亦不得虐待。你们应从他们的口中及从藏军官兵调查中，了解他们的身份及帝国主义侵犯西藏的材料，迅速报告我们。

第四，尽快地筹备召集由各县上层人物组成的昌都区代表会议，成立昌都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委员名单由你们研究提出报来批准。

第五，留驻昌都、甘孜地区的部队数目，必须精确地加以计算，报告我们批准。主要是计算运输条件及供应的可能性，冬季运输的物资不应只是保证留驻部队的食用，还要准备明春继续进军的需要，如果部队留多了，可能影响继续进军的准备，此点请你们精细计算和考虑。

第六，请你们多多反映昌都方面的情况，以便及时地给你们以帮助。王其梅的电台应与此间直接联络。

西南局及军区

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张 指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第十八军军长。谭 指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第十八军政治委员。其梅 即王其梅，当时任第十八军副政治委员。

〔2〕西藏工委 即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1950年1月24日成立。张国华任书记。

〔3〕成芳 即李成芳，当时任第十四军军长。支司 即支援进军西藏司令部。

〔4〕昌都战役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中的一次战役。西藏地方政府为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将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约十个团部署于昌都地区。1950年10月6日，西南军区第十八军一部及其他部队共六个团，向昌都地区开进，至24日结束战役，共歼灭藏军六个团全部、三个团一部，争取一个团起义。

〔5〕噶伦 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行政官职名。

〔6〕代本 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军职衔名。相当于团长。

妥善解决西藏纸币问题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西藏工委^{〔1〕}并报中央财委^{〔2〕}：

二十七日电^{〔3〕}悉。

原则上同意你们对拉萨政府^{〔4〕}处理纸币问题的意见，对西藏一切原有措施一律采取稳重的步骤是正确的。西藏纸币问题将来必须采取妥善办法加以解决^{〔5〕}，请你们继续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并多多征询藏族人士的意见。

西南局

十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 西藏工委 即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1950年1月24日成立。张国华任书记。

〔2〕 中央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3〕 二十七日电 指1950年10月27日中共西藏工委致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电报。电报对在昌都地区流通的拉萨出的纸币，提出处理意见：（一）原则上让其自

由流通，不禁用；（二）军队以银洋为通用货币，对拉萨纸币不支持。

〔4〕拉萨政府 指当时西藏地方政府。

〔5〕西藏和平解放后，藏钞与人民币币制不统一带来的一些问题，妨碍了西藏经济的发展。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工委同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停止印发和逐渐收回藏钞。1955年1月，达赖喇嘛和阿沛·阿旺晋美提出，请中央财政提供四百万银元交西藏地方政府兑换收回藏钞，同时请中央财政每年提供七十万银元补助西藏地方财政，在西藏地区逐渐过渡到单一使用人民币，得到中央人民政府同意。1959年西藏叛乱平息后，藏钞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收兑，完全停止了流通。

关于西康藏区工作的请示^{*}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

中央并西康^{〔1〕}区党委：

二十四日电^{〔2〕}示悉。

（一）西康藏区工作任务已照改，并已转去西康，以便提交七号召集的康定民族协商会议讨论通过。

（二）东藏两字确不妥当，我们考虑改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3〕}，亦已告西康，如中央认为不妥，请于七号以前电告。

西南局

十一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 and 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 这是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起草的电报。

〔2〕二十四日电 指 1950 年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给西南局的电报。电报指出：西康省东藏自治区工作任务草案，由西南局负责研究修改或指示西康区委修改后，报西南局核准并报中央备案。同时要注意，任务的提出应从当地具体情况择其急要而能够实现者，并照顾对整个西藏的影响；西康藏族自治区是否称为东藏自治区，有人反映所谓东藏包括云南中甸、四川松理及青海玉树等地，因此命名为东藏是否会有问题，当地藏族对此意见如何，在加以调查考虑后再报中央决定；少数民族区土改及其他社会改革问题，在土地改革法及共同纲领中已有说明，可不在草案中重行提出等。

〔3〕“西康省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1950 年 11 月 24 日正式成立，1955 年 10 月改名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文件太多的问题应加注意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日)

志远^{〔1〕}同志：

中央所颁《人民法庭组织细则》^{〔2〕}，眉目十分清楚，司法部所拟条例，除个别具体问题外，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另发一条例之必要。

过去川西行署曾写有一条例，我们也已告他们不发，个别具体问题改用“指示”规定。

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注意。

邓
十一、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 志远 即孙志远，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

〔2〕 《人民法庭组织细则》 即《人民法庭组织通则》。1950年7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7月19日公布施行。

谨慎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 进行减租退押和土改^{*}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七日）

对于加速土改^[1]步骤问题，大家认为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今年秋征公粮，各地反映负担不重，都有一些超额。已决定以超额的公粮养活地方武装。四川四个区^[2]十一月中旬即可大体完成秋征任务。云贵两省因秋收时间较四川迟一个月，秋征较迟，估计也不成问题。十二月起，全区将展开激烈的减租^[3]、反霸^[4]、退押^[5]运动，以退押斗争最为尖锐。在四川押重地区，地主应退押数要超过当地公粮总数一倍以上。据各地典型试验结果，因为农民情绪很高，地主知道势在必行，对退押也有一些准备，故多数不难。但有少数应退数过大，而又较顽固者，可能要拖长一些时日才能解决问题。据各地负责同志谈，明年春耕以前，大体可以结束这个运动。我们已商定明年春耕一完，即开始分田的工作。已告各省区在明年二月以前，各拟一个土改实施细则，经西南局研究后发一统一的细则，以便从三月起即开始训练土改干部。

各地提出，在民族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是否减租、退押

^{*} 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情况给中共中央报告的第四、五部分。11月15日，毛泽东阅后批示：11月7日报告阅悉，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按此施行。

及是否土改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藏族和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地区，在云南沿越南、缅甸、印度的国境边界各部落都不存在，在那些地方是肯定不能做的。但是这个问题，在贵州全省及云南八十县腹地是存在的。这里主要是苗彝两族与汉族杂居，经济条件与汉人地区相同，各族农民均有强烈的土地要求，听说我们在少数民族区域不进行土改，都很不高兴。其中又以苗族要求最为迫切。因为苗族地主很少，受汉、彝地主压迫最深，拥护我党我军亦最为积极。不满足苗民的土地要求是错误的。

但彝族的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我们考虑在彝族中是否进行土改时，首先必须着眼于十分重视民族问题，谨慎地决定政策，严防“左”的偏向。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在有彝族的杂居区域实行土改，则不但不能发动彝族农民，而且不能消灭这些地区的土匪和反革命势力，广大地区的社会秩序很难巩固。我们讨论结果，认为原则上应批准上述民族杂居地区实行土改，但必须具备下列两个条件的地区才能实行。即：第一，认真实行了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6]（在县联合政府下，也有区乡的区域自治）。第二，必须是少数民族人民大多数赞成，自己举手通过。在步骤上，应坚持先汉后彝，以促进彝族人民的觉悟。如果少数民族人民不赞成在那一地区，甚至不赞成在那一家实行时，即应坚决不实行。

土改前的减租、退押，我们原则上确定对少数民族地主只减租、不退押。减租是行得通的，现在有些苗族地主已自动实行减租，农民则普遍有此要求。在少数民族中，不提反霸。对于拿起武器反对我们的匪首应予严办，但必须经过省区党委批准，并须在该民族代表会议中通过才能执行。如果条件不成熟，匪首可长期监禁，以待时机成熟时再行处理。此外，对于少数民族，我们还决定了两条。即：一，广泛运用民族代表会

议的形式，去团结教育和争取少数民族，调解民族间的纠纷。二，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专署及县人民政府两级设专署委员会及县人民政府委员会，以便容纳各少数民族、各阶层代表人物到政府中来，并参加政府中的具体工作，这样做才能充实民族联合政府的内容。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刊物《西南工作》第31期刊印

注 释

〔1〕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2〕四川四个区 解放初期，原四川境内划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区，相当于省级。1952年9月1日恢复四川省建制后被撤销。

〔3〕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4〕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5〕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6〕联合政府 见本书第205页注〔12〕。

少数民族地区的减租土改 要具备条件才能进行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任穷^{〔1〕}同志并告贵州省委：

 郢电悉。同意你们各项处置，对公粮征收，中财委^{〔2〕}及政务院正考虑比原派数加征百分之十五，同时增加地方粮比例到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你们布置时间较迟，为避免再来一次起见，请即作恰当的调整。在少数民族杂居区域的减租^{〔3〕}土改^{〔4〕}问题请参照小平同志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5〕}，原则上要在这种地区进行，但须在具备了条件的地方才能进行，我们的责任是认真地去创造那些条件。

西南局

十一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任穷 即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云南军区政治委员。

〔2〕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

立。陈云任主任。

〔3〕减租 见本书第 56 页注〔8〕。

〔4〕土改 见本书第 10 页注〔3〕。

〔5〕指 1950 年 11 月 7 日邓小平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情况给中共中央的综合报告。见本书第 269 页。

各民族共同努力把西南建设好^{*}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这次大家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地方。一切有关中国各民族团结的问题，中央负责同志在北京已经讲过了。现在各位回到西南，几天后就要回到本地去工作，所以我想联系西南情况讲一些问题。但是，我要讲的这些比较粗浅，因为西南有这么多的民族，每个民族的历史特点我们不甚清楚，懂得很少，还得在今后长时期地了解，懂得更多一些，这样，工作才会做得更好些。我今天所讲的是比较原则的一些问题，具体的问题要各位同志回到本地后，在实际工作中同当地政府和共产党负责人商量解决，因为他们比我们了解得多一些。

第一，西南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次代表全国各民族到北京去的有四十几个民族的代表，属于西南的就有十九个民族。从几个大行政区来说，西南是全国民族问题最大的地区，另一个是西北。西南总人数是七千多万，少数民族约有一千多万，就是说有七分之六的汉人，七分之一是各兄弟民族的同胞。我们说西南民族问题大，除数量多、民族多以外，更大的问题是国防问题。西南国防与各个民族间团结是不能分开的，有了民族团

^{*} 这是邓小平在欢迎赴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活动后归来的西南民族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结，就有了国防；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国防。

在我们西南地区，国界从西藏的最西部向东，要经过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这条边界线长达几千公里，几乎全是兄弟民族聚居区域，仅有少数汉人。还有一部分边境地区本来是中国的领土，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未能定界；已经定了界的，因为不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等于没有国界。有的地区很复杂，民族多，民族里面又分各个部落，都是互相分开的。这就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利用这种复杂分散的情况，利用各民族间乃至各部落间的不团结，利用各兄弟民族过去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情绪，来挑拨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如我们要解放西藏，美英帝国主义就说西藏不属于中国，是另一个国家，还想利用联合国来干涉。但西藏人民盼望真正得到解放，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西藏人民过去不赞成国民党，不赞成满清和历代反动王朝，完全合乎情理。因为这些反动政府损害西藏人民的利益，从未顾及到任何民族利益。

今天中国是统一的大家庭，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办好事的政府。今天的政府和过去完全不同，是真正代表各民族人民利益的政府。所以，各民族只有回到这个大家庭中来，才能使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得到发展。但是，帝国主义就害怕我们各民族团结起来，那样，他们就无法进行侵略了。所以，我们为了使西藏人民回到祖国的大家庭，我们去解放西藏人民，帝国主义就反对。如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在我国边界以传教士传教，或以行医、做生意为名，混进来进行破坏，制造谣言，利用细小事情，鼓动各民族各部落间的分裂、冲突。各民族各部落间冲突得越厉害，他们就越有机可乘。所以，如果没有各民族间的相互谅解与团

结，不热爱国家，不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及一切政策，我们就不可能对付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我国这样长的边界上，历来很少有国防。满清时代很少有国防，国民党统治时代也谈不上。我们新中国要不要国防呢？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有！所以说西南民族团结问题比其他地方更重要。

此外，各个地方尚有土匪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所谓游击战争选择的地点也都在云南、贵州、西康^[1]及四川各省区的交界。这些地区既是山地，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现在除少数边界地区外，土匪差不多已被肃清了。我们基本上消灭了土匪反动派，就是因为得到少数民族同胞的帮助。如贵州的苗族，云南与川康交界地区的彝族同胞，都与解放军一块儿行动，大家在一个意志、一个目的下行动，很快就消灭了反动派。这说明我们要巩固社会秩序，巩固国防，如果没有各民族间的团结，也是不可能的。云南方面的同志要注意，土匪正在向国界方向转移，想在那里依靠帝国主义作根据地。另外蒋介石派李弥^[2]、鲁道源^[3]等，想以与越南、缅甸接壤的民族聚居区域为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我们要消灭反动派，巩固国防，就必须依靠各民族的团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没有各民族团结，就谈不上巩固社会秩序，谈不上国防，同样也谈不上国家建设。西南建设是整个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有比较好的工业基础，将来交通发展之后是很有希望的。要把西南建设好，就要依靠各民族的共同努力，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团结。有了团结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团结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在历史上没有团结，也不可能有团结，不管是满清和以前的任何朝代，或是国民党时代，都不可能有团结。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实行大民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来统治各民族，压

迫各民族。大汉族主义者对于本民族人民也剥削压迫，所有工农劳动人民都是受压迫抬不起头来的。这样的反动统治应该打倒！今天呢？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我们各民族在共同纲领^{〔4〕}的基础上，一定能够团结起来。

提到团结就必须反对大民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这是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的。在全国范围来说，汉族是人数最多的民族。但在有些地方如西藏那里，大民族是藏族。又比如现在成立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这个区域里藏族也是大民族。不过，我们主要还是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为什么首先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呢？因为中国汉族人多，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少数民族兄弟是被压迫的。应该指明，汉族中的工人农民没有去压迫各民族，压迫各民族的是蒋介石、满清政府及历代的封建王朝。今天我们弄清了大民族压迫其他民族的真相，就必须首先反对大汉族主义。其次，要达到团结目的还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团结是相互间的事，即使大汉族主义纠正了，但狭隘民族主义不纠正，还是团结不起来。各少数民族过去有狭隘民族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不同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汉族不能欺辱人了，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讲，而是要具体作出样子来看，大家才会相信。过去我们在西康办贸易公司，目的是要把里面的土特产运出来，外面的东西运进去，互助互利，使藏胞们不吃亏。有些藏族同胞开始还有点怀疑，最后看到各种比价合理才相信了。少数民族过去对汉族的怀疑猜忌是很自然的，但是现在如果还有这样的怀疑猜忌就不好了，那会妨碍团结。

因此，一方面要消除大汉族主义，另一方面要消除狭隘民族主义，从两方面共同努力来做工作，就能搞好团结。比如，我是一个汉人，应该努力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是汉族干部的责

任；各少数民族干部，也应该努力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两方面去做工作就能达到团结目的。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是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毛主席是受压迫人民的代表，共产党是受压迫阶级的党。解决了相互间的矛盾，团结起来，建设就容易了。过去统治者的方法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他们不愿意各民族团结，只希望民族之间有冲突，这样就可以从中取利。今天，毛主席领导各民族起来推翻了过去统治者，这是各民族被压迫阶级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团结好，消除各民族间的歧视，互相帮助，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

第二，各少数民族政治方面的问题。

消除民族间隔阂，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周围，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甚至表现在我们的感情上，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办到的。但是，我们的工作要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各位在讨论中，已提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要解决，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民族政策我们要逐步做到。

大家最关切的问题是成立区域自治政府的问题。这个问题党中央、毛主席以及我们西南局都在认真考虑。反对大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就是要实行区域自治及成立联合政府^{〔5〕}。这样做就是错误，就不能增强民族团结。但这件事是否说做就能做到？要准备一下，要有步骤、有准备、有方法，否则，就容易成为一种形式。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一件新鲜事，现在要先在一个地方做出经验后，再运用到其他地方去。比如我们选择金沙江以东地区成立区域自治政府就遇到很多问题。政府叫什么名字？有人提议叫“博巴政府”^{〔6〕}，但博巴包括范围太大；还有人提出叫“东藏自治人民政府”，但东藏又包括了青海松潘及云南德钦一带的藏族。最后才确定叫“西

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个名字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也许会影响到团结。接着是人事问题，自治政府由哪些人来组成，要与各方面交换意见，要在西康地区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政府成立后该做些什么事还没有经验。比如有些少数民族干部当了县长、副县长，感到没有事情做，这一方面是有些同志思想上有问题，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没有经验。

不同民族干部的语言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大家在一起难免有误会，有不满意的地方要具体分析，看他是恶意还是善意，是经验不足、方法不妥还是看不起人，要把问题弄清楚。各民族间不应彼此歧视，不要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有事可坦率地提出意见，有什么话摆在桌上来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民族团结的最好方法。每个人都要检查一下自己思想上有无问题，主要是汉族干部要纠正错误。民族工作一定要慎重，不然好的愿望会变成坏的结果。

各民族都出现了一些英雄模范人物。谁能够真正为本民族人民谋福利，不管是一个土司^[7]、头人^[8]、活佛或者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群众领袖。各位同志回去选代表，一定要到民间去访问，听群众的意见，看看是几个人赞成？几百人赞成？还是几万人赞成？一定要选人民相信的人成为本民族人民的真正代表。各少数民族中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领袖人物，要好好地为人民办事，保持已有的声誉，不然人民群众觉悟起来了，他们会要求自己来当家作主的。干部问题方面，在西康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里面有几个汉人委员，他们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的。其他一些地方汉族干部较多，这是历史形成的，他们在里面工作并无害处，只有好处。当然，有些干部如果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政府一定要把他们撤回来，如果工作方式方法不好，各族人民应该帮助、批评他。至于建立区域自治

和联合政府问题，各民族同胞都很着急，因为大家多年来都想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关键是究竟哪一种形式好，要看各个地区具体情况来加以研究。联合政府之下可以有区域自治，区域自治之下也可以有小的联合政府，民族杂居区可以组织联合政府，民族聚居区便可以成立区域自治政府。

此外，各地区民族工作要做好三件事：（一）各地要召开各族人民代表会议，让代表们来讨论各少数民族人民自己的问题，而且每年要定期开会。（二）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专署及县两级成立政府委员会，凡过去未设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即不再设立；已设立的暂不取消。将来组成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名额，应按各民族人口数比例分配。（三）在西南办三所民族学院来培养干部。一所是在成都，主要招收藏彝两族青年，现已在筹备中。另外在云南大学和贵州大学内各设一个民族学院，现在应该马上筹备。惟一感到最困难的是教员和教材问题，因为有的同志提出用自己本民族语言和文字，这样翻译便成了问题。所以，民族学院的教材，最初只好多用些汉文。此外，各地区要多办一些民族干部训练班。

第三，关于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是各族人民的一个基本问题。如藏族同胞能够把皮毛药材输出、布匹输入，苗族和彝族同胞能够吃到廉价的盐，都算经济问题。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长远努力的方向，我们要不断创造条件。共产党、毛主席为什么要领导革命？就是要使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生活一天一天获得改善。现在我们政治上已经得到解放，帝国主义要想奴役我们已经办不到了，就是他们有原子弹也不能解决问题。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起来力量是极大的，谁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政治上得到解放，而经济问题刚刚开始解决，正如毛主席

说的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我们要做到将来全国农村都用上拖拉机，一个人可耕种百把亩田地，这是我们的远景。干部要能够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就必须使各族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所谓对人民有利的事，就是这些事，如过去盐一元一斤，现在只要九角九分；过去只能吃一斤盐，现在能吃一斤一两；以前过年过节没有肉吃，现在可以买肉吃，这些哪怕是极小的经济问题，都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使人民对政府和干部更加拥护。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为什么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一年来的经济建设搞得好，今天虽然还不够好，但人民已经看到新中国的远景了。

在汉族地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9]。土改只限于汉族地区，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条件还不具备。少数民族地区的所有改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改革事宜，一定要在少数民族人民自己要求的基础上与各少数民族人民商量解决，急了就要脱离群众。必须区别是少数人的要求还是多数人的要求。带队的人必须紧靠着队伍，一方面带着群众向前走，一方面又不脱离群众，如果你走了两百里，队伍才走一百里，那就一定是脱离群众。

除土改减租^[10]以外，其他经济改革也要根据当地人民的愿望来做。当初拟在西康成立贸易公司，有些人不赞成，我们就不急着干。现在各地要求成立贸易公司的很多，如西康的彝族，云南的傣族，以及贵州各少数民族都已提出来了，这是好事。办贸易公司的目的不为赚钱，主要是服务于生产，服务于物资交流。但贸易公司办多了，政府也有困难，主要是干部不够用，因为大多数同志都参加剿匪^[11]减租等工作去了。不过政府一定要办好这件事，希望大家都来支持。诸位回到工作岗

位后，还可根据群众的意见，开展物资交流工作。过去国民党的贸易组织是通过不等价交换剥削人民，今天则不同了，是等价交换，是为了发展国计民生。有人认为等价交换是对的，但也有人提出要更便宜的交换，那就不一定好了，因为贸易公司的业务是有计划的，如果过于便宜就会蚀本太多。贸易公司是谁的呢？是国家的。国家又是谁的呢？是大家的。如国家亏本也就是人民受损失，并且亏本的不等价交易不能维持多久。目前，全国私人商业比国家商业大得多，国家经济只是居于领导地位，为鼓励私人资本到少数民族地区做生意，也必须实行等价交换，使大家都不吃亏才行。

税收方面，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应该少于汉族，因为少数民族居住区要贫瘠些。但将来经济发展以后，经济条件一致时，各民族的负担就应该一样了。去年为了照顾贵州苗族同胞的困难，不向他们征粮，他们问：“为什么不收我们的？”认为瞧不起他们。其实各民族在剿匪、征粮中都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关于卫生文化问题。

各位要求办学校、设医院都是很对的。目前医务人员不够用，所以，将来必须多培养少数民族医务干部，同时可以针对各地区特殊疾病训练专门的医务人员。文字问题比医药卫生更困难。有的民族有文字，有的民族的文字不够用，有的民族没有文字，这就造成了教学上的困难。要解决这一困难，开始要先学点汉文，经过它作桥梁，来弥补各民族文字之不足。至于如何形成各民族文字的问题，将来一定要解决，也一定能够解决，这只是时间问题。

最后再讲一下进步分子的责任。

各位到过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指示，你们知道的比在家里的人要多一些。希望你们回去以后注意三点：（一）做好团

结工作。不但要做好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工作，也要做好本民族的团结工作。过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总是使各民族间互相打架，他们在旁边哈哈大笑。现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府是希望各民族团结的，各位回去以后，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多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历史上的疙瘩一定要解开才能团结得好。各民族中间也有坏分子，我们要团结起来对付敌人。毛主席说，对敌人要斗争，对自己要团结。进步分子首先要自己团结起来。（二）进步分子所考虑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人民利益。个人有要求人民也有要求时，就应该先把个人利益放下来，服从人民的要求。不然，人民不会赞成你是进步分子。（三）起带头作用联系群众。艰苦事情首先要自己办，共产党、毛主席就是“吃苦在先，享乐在后”，所以就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有了这样的认识，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好，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建设不知道要快多少年。

根据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保存
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2〕李弥 原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第八军军长。

〔3〕鲁道源 原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

〔4〕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 34 页注〔2〕。

〔5〕联合政府 见本书第 205 页注〔12〕。

〔6〕“博巴”，又译为“波巴”，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博巴政府”即藏族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西康时，当地藏族人民曾建立“波巴政府”。

〔7〕土司 民主改革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分多种等级。

〔8〕头人 民主改革前某些少数民族中部分首领人物的称呼。

〔9〕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10〕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11〕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为《重庆工商》创刊题词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重庆工商创刊纪念

邓小平敬题

根据重庆市博物馆保存的手迹照
片刊印

为新华书店西南区分支店会议题词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加强政治文化粮食的出版发行工作，消灭落后和愚昧状态，乃是我们长期而严重的政治任务。

邓小平敬题

根据重庆市博物馆保存的手迹照片刊印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 报告提纲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这次西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其目的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在今后以更多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同时着重解决城市工作最中心的而又是今天最薄弱的工厂管理、工会工作和在工人阶级中建党这些重大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段君毅、蔡树藩、张霖之、于江震^[1]四同志分别作了报告，我完全同意这些报告的内容。

我要讲一下城市工作中的一般性的问题。

一、城市工作的情况。

西南一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按照新区发展的规律，在工作步骤上，随着城市的接管，我们工作的注意力以农村为重点，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与党的二中全会^[2]“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的方针是不相违背的。在明年，紧接着减租^[3]退押^[4]运动，我们将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5]。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还要将指导重点放在农村，但同时必须以较多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

由于领导上集中力量于农村，过去一年城市工作的成绩不如农村那样显著，但也有了不少的收获。

初期的城市接收工作是做得比较顺利比较好的。在建立革命秩序，完成税收任务，稳定金融物价，恢复或维持工业生产，救济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改造旧人员，开展时事学习运动，恢复或维持学校教育，组织工人、学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6]和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在城市工作的同志是努力的。

但是，在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还只有一些零碎的经验，还没有系统的经验。从中央局起，我们还没有系统地研究城市工作的经验，并加以普及和提高，特别是工厂管理和学校教育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我们的经验更差。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西南城市和较大镇子的人口近一千万，同时农村在经过减租退押和土改之后，更加要求城市的领导。如果我们不加强城市工作，“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7]，如果城市前进的速度落后于农村，就有城乡脱节的危险，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二、城市工作做什么？依靠谁？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示说：“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

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8〕“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9〕

这个指示规定了城市工作同志的任务是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用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而我们城市工作今天最薄弱的环节，则正是最中心的生产管理问题。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努力。因为不搞好生产事业，特别是不搞好工厂管理，就不可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

城市工作大体归纳为下列五个方面：

第一，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对于工厂、矿山、交通、市政等近代工业的管理。

第二，组织、教育青年学生和团结文化教育界，管好学校教育work，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城市是文化教育的集中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城市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经济战线上，从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加强市场管理，完成税收任务，稳定金融物价和舒畅城乡交流。

第四，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同时要加强清除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影响的思想斗争，及配合农村的反封建斗争。

第五，加强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城市中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在这一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用代表会议

的方法去组织、团结和教育市民，参加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工

作。

所有这些方面都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0〕

依靠谁来做好这些工作呢？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如何依靠呢？

第一，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依靠工人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党员和干部中那些轻视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那些认为“工人对革命没有贡献”、“工人生活太好”、“工人落后”、“工人不好管”等等错误的观点。

第二，必须把工人的最大多数组织到工会中去，并依靠工会去教育工人，启发其阶级觉悟，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忽视工会工作，就谈不上依靠工人阶级。

第三，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要反对有些同志那种利用工人的错误观点，他们在困难时依靠，顺利时就不依靠；需要时依靠，不需要时就不依靠；口头上依靠，思想上并不依靠。他们要求工人的多，给工人的少。甚至有个别地方还在虐待工人，因而有的工人说：“国民党时候我们是牛和马，现在是马和牛。”这些错误必须坚决纠正。

第四，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到各部门中去。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工会和工厂的事情。我们的青

年团、妇联、合作社、文化团体等等都必须把工人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

三、工厂管理问题。

关于国营厂矿管理，此问题段君毅同志的报告都说到了。

我们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口号，这是管好工厂的关键。我们不少的军事代表、工作组乃至工会干部，至今还不懂得这个口号。他们不去启发工人和职员的积极性，甚至对工人职员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有些同志还喜欢对于自己不懂的技术问题或管理问题，使用“最后决定权”。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经过整风之后虽然好了一些，但至今仍然是干部中的最大的毛病。不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我们就不可能做到依靠工人团结职员去搞好生产。

经验证明：不依靠工人，就不可能团结职员；一般职员总是在工人起来之后，才逐渐向我靠拢的，而且要工人在生产方面有了一些成绩的时候，才会开始心悦诚服地积极起来。

中央指示我们：要管好厂矿，必须实行“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业化”。所谓管理民主化，必须具体体现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之中，尤其是具体体现到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这三种组织形式中，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就没有民主的内容。现在许多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形式的。工会或者不起作用，或者被工人称为“军事代表的尾巴”。职工代表会一般只在困难时开，很少环绕生产任务和职工福利这些问题去开，尤其很少定期召开，即使开了这些会议的，也多半是由军事代表等训话一番。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所谓经营企业化，也只有在管理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工业部确定从合理化建议及订立集体合同两件事情做起是正确的。经过了这些步骤，启发了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才有

可能计算成本。当着一个工厂连成本都无法计算的时候，就谈不上上了轨道，也谈不上经营企业化。

组织生产竞赛是必要的，但必须在具备了有生产计划、有原料、有销路、群众有了一些发动这些条件的部门才去实行。从西南情况来说，条件多不具备，故暂时尚不宜普遍地实行。

为了管好现有的厂矿，还必须：第一，尽可能地从机关中抽出一些得力干部放在厂矿中去。第二，领导上注意选择几个点，进行典型试验，积累经验，指导其他。西南较重要的公私厂矿只有一百九十二个，用这个方法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来。第三，在地委、县委集中力量于农村斗争，而且能力不够的情况下，较重要的厂矿不能委托他们去管理，而应由省委、区党委、市委直接管理。因此，各省、区、市党委应设工业部或指定一负责同志专管工业。同时在厂矿区设立企业党委及工会办事处（如綦江江津区），有三个干部就够了。有了专人负责，事情就办通了。

除了做好国营企业的工作外，各省、区、市对于地方工业的指导必须加强。目前由于国家财力的限制，办很多大工厂不可能，但小型工业的发展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各地可根据本区（一定从本区内着眼）的条件（原料、销路等），或由地方拨款，或组织私人资本，或组织机关生产，举办一些可办的小型工业，好好地经营这些事业。至于原有的某些小厂，既无原料，又无销路，则应转变生产方针或考虑停业。

我们有些厂，现在还是处于维持状态，必须想办法打开出路，将生产力用之于有用的方向。

对于私营企业，过去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仍应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基础上，用劳资协商方式，推动其

进一步的改革。

四、工会工作。

蔡树藩同志的报告都说到了。

西南工人，包括一部分手工业工人在内，据估计有一百六十万。现在组织到工会中的约三十万，仅占百分之十九到二十。各产业系统较好，约组织了工人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可是起作用的、真正联系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是不多的。

在工会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关门主义的根源是不相信工人。形式主义则表现在工会生活不民主，不面向生产，不重视工人的福利，因而得不到工人的信任。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但为数很少。

当前工会的工作：第一，必须进一步地组织工人到工会中来。首先应集中力量在工厂、矿山、交通、市政和商店中去发展工会会员。

第二，必须坚决地吸引本地本厂的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各级领导机关中来，以加强工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改变工会脱离群众的现状。有些工会领导机关，职员比重过大的情况也应改变。

第三，建立工会的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工会一经初步整理，就应开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选举工会领导机关。工会必须充分听取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并作认真而妥善的处理。

第四，必须加强工人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就长远来说，工人教育应以文化技术为主；就目前情况来说，仍应着重政治教育，同时注意文化技术教育。

第五，必须重视工人的劳保和福利。今后仍应防止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纠正一些同志忽视工人福利的思想。同时要纠正福利工作中的恩赐（即不经过工会和工人的讨论）

观点。

五、城市建党问题。

现在各地的普遍倾向，是忽略了城市的建党工作，把谨慎发展党的组织，变成了不注意发展党的组织。

城市发展党员主要在工人中，而我们党内有不少人是看不起工人的（这与他们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有关）。重庆前一时期请求入党的工人百余，经过两三个月的审查，只批准了六个，以后由市委组织部直接进行，才发展了一部分工人党员。

于江震同志报告中提出的计划是恰当的，在今后半年内，在重要厂矿的三十万工人中，吸收百分之七即约两万工人入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除厂矿外，在学校、机关及其他系统中，也应作个别的吸收，条件则应更严格些。

西南一律实行公开建党的方针，凡未公开的党的组织应即公开。建党的步骤是先慢后快，慎重地个别吸收，既要反对关门倾向，又要反对拉夫主义。一开始就要把根子扎正，就要严肃党的组织和生活。

必须重视发展团的组织，现在要纠正的偏向也是关门主义。

六、关于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在现阶段，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在西南解

放初期，确有此种“左”的倾向。但在五月开始调整工商业后，又产生了一种不敢对资产阶级作必要的斗争的右的倾向。

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主要在税收、劳资和公私等三方面。同时，农村减租退押分土地也关连着他们。一般资产阶级对劳资总是讲一利，对公私也不讲兼顾的，对税收总是叫重的。而我们则必须认真地实行“两利”、“兼顾”的政策，税不应多收但也不能少收的政策。

在四五月间，私营企业确实困难，我们实行了坚决调整的方针。如果那时不那样做，就会形成大批的关厂停业，于工人阶级、于国计民生都极不利。所以这个方针（中央确定的方针）是正确的，认为这个方针错误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今后仍应继续实行这个方针。在税收方面，坚持不多收也不少收的政策。凡属不合理者，应主动调整；凡属合理者，必须坚决征收，并与逃漏现象作斗争，以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在公私问题上，坚持兼顾的政策，必须在加工订货、市场价格等方面，促使资方进一步地改革其腐朽的机构。同时在西南还应适当加强国营工商业，以增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在劳资问题上，过去我们说服工人适当减低工资，以渡过难关，这是完全必要的。七月以后，工商情况开始好转，即不应再去降低工人生活，而应从改革私营企业腐朽机构、努力发展生产中去达到工厂的收支平衡。在资方尚无利可图的厂矿，仍应说服工人不作过高的要求；但在资方有利可图的厂矿，就应该适当地恢复一些工资或一些福利。

除在各方面掌握住正确的政策之外，我们必须多向资产阶级做些工作。经验证明：多做一分工作就多一分效果。不愿去接触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毛病，应加纠正。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应该加强。

对工商界的退押，应作审慎的考虑。一般可采取在半年以内的时间分期退还的原则。

七、加强公安工作。

目前社会秩序是稳定的，但敌人还没有完全摧垮，还经常出现新花样，给我们以措手不及，使我们遭受很大的危害。南岸某仓库一包炸药，就使我们损失了大量的资财，所以不能丝毫松懈和麻痹。

城市公安工作，应将重点放在经济保卫方面，特别是重要厂矿、重要车间、重要仓库的保卫，看守重要部门的武装必须是可靠的。

我们在城市镇压反革命^{〔11〕}的毛病，也是“宽大无边”，很长时间，我们对工厂、学校的反革命分子不敢动手，捉来的不办，又放回去了。这大大打击了群众反特斗争的积极性。重庆解放初期，工人还敢于检举特务分子，后来看我们不办，就再不报告了。最近我们一次逮捕反革命分子百余人，工人积极性又高起来了，这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就要脱离群众。

要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斗争，要加强反特的教育，及时公布特务的罪行，揭露其谣言，提高群众的警觉性，这是反特斗争的基础。

八、其他工作。

城市工作很多，不能一一谈到。

学校教育工作必须加强，我们的宣传部门要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中加以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不是短期所能解决，但必须开始去解决这个问题。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应好好贯彻。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联系群众、解决问题、巩固统一战线的最好的形式。各地应总结经验，使之开得更好些，发挥的作用更大些。

九、统一领导问题。

城市问题复杂，多有时间性，而且往往一个问题牵涉许多部门，所以要求城市工作具有很大的集中性，要统一到市委的领导下去进行。我们有些部门是实行两重乃至三重领导的，这样的部门，除某些特殊问题外，一般的问题均应通过市委去进行。否则头绪很多，没有主要负责的机关，也没有指定主要负责的人，往往一件事情很长时间不能解决。这种官僚主义，就是由于没有统一领导，没有专人负责而来的。以后凡是涉及几个部门的事情，必须召集在一块，商定方针步骤，一致执行；重大一点的问题必须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或委员会，指定主要负责的人员，以专责守。经验证明，这种方法是好的。

集中力量，创造典型，积累经验，然后普及的领导方法，用之于城市各项工作中，都是灵验的。我们同志在新的工作中往往忘记了这个工作方法，以致走了许多弯路，应引起注意。

十、干部问题。

眼睛不要望着上面派来或别区调来干部，要坚决地从群众中放手提拔。我们已有一年的工作时间，已经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从他们中间选拔一批干部是可能的。也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地联系群众，使工作生根。我们的干部特别要注意从工人中去选拔。如果我们把工会工作做好了，干部来源的困难就容易解决些了。

十一、报告制度。

为了研究城市工作，并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规定在一九五一年内，各省（区）辖市委及重要的企业党委，应将两月一次的综合报告，同时送西南局一份。

注 释

〔1〕段君毅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蔡树藩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部长、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主任。张霖之 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副主任。于江震 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

〔2〕党的二中全会 见本书第29页注〔1〕。

〔3〕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4〕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5〕分配土地的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6〕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7〕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8〕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

〔9〕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10〕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11〕镇压反革命 指1950至1953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在西南区第二次 财经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一九五〇年快过去了，大体上估计一下，原定的各项工作任务 and 计划都完成了，各方面都有成绩，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发动了群众，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过去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因此，对城市工作还不能很好地兼顾。但经验证明，凡是城市工作做得好的，都是由于发动了群众。每个部门也是这样，凡是发动了群众，工作就能搞好。例如，教会学校问题，过去没有发动群众，坏分子猖狂得很。又如某校青年团员，一个班二十多个学生中青年团员占了七个，也不算少，但由于脱离群众了反而处于孤立，后来经过纠正，团员改变作风深入群众，情形就改变了，许多学生都起来控诉坏分子的罪行。在农村工作中，发动群众工作做得比较好，虽然命令主义依然存在但是成绩很大。例如，在剿匪^[1]中，发动群众对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减租退押^[2]，由于认真地发动了群众，农民理直气壮，地主知道非退不行，许多带有封建尾巴的工商业者也说：“税可拖，而押不可拖。”这都证明我们在农村发动群众是有成绩的。今年的工作成绩主要在军事上，表现在一是剿匪，二是改造九十万国民党军队。就以土匪比较少的川北而论，一年剿匪就在八九万

左右，全区一年内捕获的匪首，总数在一千以上。改造九十万军队的工作做得很好，令人满意，一点尾巴也没有留。接管城市和稳定物价，一年内物价曾有过几次波动，但是，都随着全国各区共同的努力给平抑下来了。

税收工作我们最费心，但目前看完成中央规定的十七亿五千万斤任务没有问题，而且还会超过些。税收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依靠：1. 明确的方针。2. 发动群众。重庆的经验是依靠店员，店员在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所谓明确方针，还包括一个“要做工作”，对资本家“既要团结，又要斗争”，没有团结要想取得成绩是不可能的。由于一些同志缺乏政策思想，工作中曾经发生打击靠近我们的工商业者的问题。明确方针就是说，“拉要拉得坚决，打也要打得坚决”。例如，今年征收的一九四九年公粮，前后拖了五六个月，如果当时我们再拖就完不成了，我们之所以要坚决收齐，不但是从财政上着眼，不仅是为了多征几万斤粮食，主要是打击封建势力，让他们明了共产党、人民政府说的话是要做到的。由于这样做完成了任务，财政问题自然就得到解决，但更大收获是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的气焰，西南民众现在就和过去的北京民众一样，认为共产党的事情不提则已，一提出来就是要做的。

拿重庆的税收来说，地主叫得凶，工商界也拿重庆和汉口比（当然他们是不会和天津相比的，天津七亿任务完成了十六亿），财委会^[3]为此事开会研究过许多次，我们对此事始终感到有把握。理由是：1. 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我们真正做了，重庆工商业没有遭受到什么损害。2. 由于国家帮助，工商业发展了，即开业多于歇业，开业资金总额也多于歇业的资金总额。3. 税率不重。这一点连工商界如胡子昂^[4]等人也都这样认为。但个别不合理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采取坚决

收税，同时也坚决调整的方针。据重庆工商联反映，第三季度工商业税评重了的有二三百户，而我们调整的已有二百三十五户，共计四亿多税款。同时我们要告诉工商界，税不要拖，拖是拖不掉的，所谓“挤在一起”受不了，政府不能负责任。同时不要比，因为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我们只问在这里是不是合理。重庆的资产阶级比起上海、汉口的要软弱些，但我们决不能轻视他们在西南各大城市中所起的作用。资产阶级对待税收是有意识拖的，特别是后来他们不叫不吭气了，这是个比较厉害的手段。但是，只要我们掌握材料，理直气壮地揭露他们，他们再厉害的手段也要失败。在西南各大城市来说，只有成都的税收比较好，其他如昆明等地方的工作都比较困难。

今年的公粮、税收、盐税等方面的工作都完成了任务，表明在财经各方面都有成绩，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并不是没有缺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依然存在。为什么我们能完成这些任务呢？基本原因是方针明确，依靠群众和上下一致。

一九五一年工作有了更好的基础。1. 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2. 干部已经有了一些工作经验。当然困难仍旧有，主要是由于美帝侵略，我们要抗美援朝^[5]，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更多的钱投到国防军事上去，而将经济建设投资减低至最少的限度。

今年物价在困难条件下总算平稳了，但明年的条件必将更困难。首先，因为军事需要，市场投放费用增多，西南即需一万亿元^[6]；其次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部分物资将因不能进口而感缺乏；再次，明年西南部分地区将提前实行土改^[7]，农民购买力将大大提高，而且以减租退押而增加的农民购买力而言，全区谨慎的估计约有五十亿斤粮食。一方面，农民在获得这些果实后要买工业品，而我们工业品有限，无法满足农民

需要；另一方面，农民的大量粮食和农副产品要求出售，而政府无钱收购，出口也因封锁而发生困难。这样，工农产品剪刀差^{〔8〕}额必将扩大，这是今后全党全国所必须注意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央对于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非常明确，即：1. 国防。2. 市场。3. 经济建设。西南的主要问题是：1. 粮食。2. 土产。根据历史材料，西南粮食问题必须在内部解决，今后应当多和农民商量，想办法找出路。

二、在今年工作基础上，根据目前形势，我们今后的工作是：

（一）保障税收。估计农业税没有问题。今年秋征已过，但对明年夏征，特别是秋征应即着手研究。今年农业税之所以超额多，其原因之一是地主多。明年实行土改，土地将更加分散，农民负担会有所增加，这是一个新问题，必须很好研究。对于城市税收工作，我们还缺乏系统经验，对资本家总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对地主可以看作敌人，但对待资产阶级就不能这样，必须做到人情入理。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过去是一脚踢开的多，调整以后则有右的偏向，明年希望大家很好研究这个问题。重庆今年依率计征提得过早形成被动，目前的税收主要仍旧是民主评议与定期定额。上海依率计征目前只限于六千户，等于总户数的千分之五，汉口也是千分之五，重庆解放比较迟，可是已经达到千分之十了，太多不好。但没有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是给资产阶级一个前途，有利于正当的工商业者发展。

（二）搞好贸易。贸易工作是明年的一条重要战线，各级贸易机构就是作战部。明年贸易工作的本钱很少而任务加重，这是一个矛盾。经营贸易目前没有助手，合作社一时搞不起来，国家商店又有限，因此如何做好生意就更加重要了。要做

好贸易工作首先就要注意调整剪刀差额，因此必须注意农村，研究农村经济，这项工作搞得好对农村经济就有帮助，搞不好就要破坏农村经济。四川出口最大宗的桐油、猪鬃、五倍子、青麻等目前都在落价，必须根据新情况加以研究，并作重新布置。工商业下乡问题今后仍应该加以注意，指导方针应当明确，下乡总比不下乡好，下乡虽有困难，但不下乡更困难些。川南泸州经验是好的，各地也应继续创造经验。明年贸易工作有两个原则：

（1）加大国营贸易力量。专业公司的分支机构要加大，自己带头下乡。重庆现在有二千亿减租退押的票子，下乡后如何办？资本家的着眼点是如何从农民身上收回来，但我们却必须注意如何活跃农村经济。

（2）大量组织私商下乡。有意识地组织和指导私商下乡，让他们获得适当的利润和发展，我们不要害怕这样会发展了私人资本主义。目前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发展对人民还是有利的，而且我们可以从税收、价格上加以限制。在城市为了稳定物价，增设零售店仍然必要。我们估计，明年在西南投放一万亿票子，市场不会有问题，但必须搞好贸易工作。现在令人担心的是机构与资金两个问题。资金方面，华北征购、代销等办法不能全部适合于西南，原因是我们没有合作社这样的机构，主要大宗土产又不是西南内部流通的物资，但这些办法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应当根据西南的实际情况，研究有利可行的办法。

（三）努力发展适合于本区需要的各种生产。今年的经验证明，由于我们对情况了解不够而遭受了损失。例如今年的菜籽问题，由于估计不足，先感觉过多，后来实际不够，引起成都油价上涨，今后应当引为教训。中央要求我们明年完成五十九万担棉花生产任务，川北是一个重点，请川北同志加以注

意。西康^[9]地区雨少沙多，气候也宜植棉，可加以研究如何种植，我们必须争取棉花自给。为了鼓励农民植棉，必须按照华北办法采取“包植”。应以最大决心，不惜赔钱来发展棉花生产，采取中棉、美棉同时发展的方针。我们不但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植棉利益，而且要从政治上加以鼓励。贸易部门也须从价格上保持对植棉者有利的合理粮棉比价，以刺激棉花生产。烟叶生产全国已感到不够，以西南目前情况看，按每人每日消耗近半根香烟计算也感到不够。河南许昌烟叶一直喊过剩，目前也不够了。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烤烟生产，贵州尤须注意。棉花和烤烟的生产任务已经分配了，各地要力求超过，糖也可以发展。目前盐的销路也比以前大大发展了，各场已无存盐，估计明年经过减租退押土改，农民生活改善，盐的销量还要增加。

（四）发展小型工业和手工业。目前我们大工业只有这么多，而且这些大工业生产是用于全国或用于国防的，大多和农民无关。要解决农民问题，满足农民需要，必须加强对地方工业指导，这主要是各省区的工作。地方工业的经营方针，首先是要研究能在本区内解决原料与销路，然后由近及远；其次是必须有利可图、吹糠见米，至于那些虽然有前途但目前无利润的工业，只能等过些时再办。各地应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小型工业，地主的资金也可以引导到这方面去。各省工商局主要指导地方工业，如川东土布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据说现在外面已到西南来买土布了。地方工业必须首先着眼在本区本省，以省为单位，省与省之间订立合同交易。应当加强对私营工业指导，如川东土布销川南，这方面商会力量很小。除指导私营工业以外，各省还要自己办一些小型工厂，花几十万斤粮食办一个工厂，在地方粮食中周转一下就可以做到了，这样不但解决了一

部分地方的需要，而且可以解决一些差额问题。

（五）解决交通问题。明年仍不可能发展航运，现在政府只有招商局三条船，川江航运主要依靠民生公司^{〔10〕}。除成渝铁路^{〔11〕}外，明年西南准备修建綦江铁路的三（江）赶（水）线^{〔12〕}，这也是吹糠见米的做法，各地可以仿此办理。发展内河木船及地方公路花钱少而收效大，一条载重一百三十吨的木船修建费仅十二万斤米。沿江各地可以研究，将地方粮食周转一下造几条木船，这样，既解决了交通困难，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地方需要。运输工作应当研究如何经济实用，减低成本，降低运价。汽车要坚决改用酒精、木炭，以酒精为主，节省汽油，并从改善管理上降低运输成本。

（六）研究农村经济。从各方面摸索农村经济的特点，应成为一九五一年各部门的工作任务之一。华北经验不能完全适用于西南，由于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农民因减租退押及分得土地以后要购买耕牛，因农民大量购买耕牛而引起牧畜繁殖、农具生产等，这些问题更具有地域性，各地应该多多加以研究。合作社在土改以后必然大大发展，目前就要开始研究合作社在农村发展的办法。

除上面所说的以外，最后还有两点要在这里谈一谈：

第一，集中统一。集中统一是集中统一于中央，执行中央政策，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中央对我们照顾也很多，我们对中央也不能打埋伏。今年全国如果不实行财经统一，我们西南的困难可能更大。个别地区部分同志过于强调地方重要性，总希望在自己这里多开办些工厂，在我这里多开采些矿产。当然这些工厂、矿产对当地来说可能重要，开办开采以后也的确是好事情，但必须从全国观点来看，目前国家财政还很困难，只能举办一些吹糠见米的事业，地方有价值的并不是不办，只是

过一些时候再说。例如，建筑线拆轨问题，不拆当然好，但目前钢轨缺乏或远不济急，留着那一段也不起作用，那就只有拆。这样说是不是这些意见提错了呢？不是的，有意见提出来并不错，今后仍要提。问题是我们不要提出来就一定要做到，没有答应不要灰心，不要丧气，思想要通。提意见可以使上面了解情况，也许上面会考虑而答应你的要求的。例如贵州铅矿问题，我们也仍旧向中央反映了，即使中央不批准，也可以帮助中央了解下面的情况和要求。

第二，干部培训问题。各地干部缺得很多，明年准备大量招收一批。后年的情况会好些，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工作可以交给本地干部，外来干部逐渐转到财经工作上去。对干部要大胆提拔。一年搞一次整风，整风的目的不仅是批评坏的，而且要发展好的。干部教育工作应当抓紧。最近《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训练干部业务知识的重要性，各地应当抓紧时机在明年四五六三个月，利用税收淡季，加强干部训练，增加干部的业务知识，才能正确地掌握政策，揭穿资产阶级的阴谋，完成各项任务。在城市干部集中地区，各部门对干部的教育应多采取上大课的方式，由各部门负责同志作报告，一次报告比几次讨论会要强得多。干部管理工作应当由各级党委负责，各专业系统要尊重当地党委的意见，不依靠当地党委许多问题解决不了。干部来源除了吸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以外，要多从工人中提拔。如果搞木船，再没有比码头工人更适合的了。搞税收工作，店员比较适宜。当然，目前我们还不能从工人中解决一切干部来源问题，但是我们要逐步地朝此方向努力。今后干部任用必须经过当地党委或政府人事部门负责审查推荐。

注 释

〔1〕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2〕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3〕财委会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年8月正式成立。邓小平兼任主任。

〔4〕胡子昂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

〔5〕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侵入朝鲜，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9月15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抵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军连遭失败，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6〕一万亿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7〕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8〕剪刀差 在工农业产品交换的比价中，工业品价格越来越偏高，农产品价格越来越偏低，两者好像剪刀张开形状，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状价格差距，简称剪刀差。

〔9〕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 and 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10〕民生公司 即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25年在四川合川（今属重庆）成立，创办人卢作孚。主营长江航运，后来发展海运、江海联运等。

〔11〕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6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12〕綦江铁路的三（江）赶（水）线 位于川黔铁路北段的铁路支线。1952年12月开工兴建，1953年7月通车。

新年题词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

一九五一年，我们应在清除美国毒素^{〔1〕}的思想战线上，在土地改革^{〔2〕}的斗争中，在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在肃清匪特、特别是在反对隐蔽敌人的斗争中，进一步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爱国分子，做出更多的成绩。

邓小平敬题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1年1月1日发表的手迹刊印

注 释

〔1〕美国毒素 指当时美国政府所散布的对我国人民思想意识有害的东西，如恐美、崇美、亲美等思想。

〔2〕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

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关键在于强化党的领导。这次军区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只谈一个严与宽的问题。

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对于干部，特别是对老干部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更加严格，对党的组织要更严，对干部的要求要更高。为什么要更严而不是更宽呢？从组织上说，我们过去一直是在进行武装斗争，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是在战争熔炉中经受锻炼。每个人进到革命阵营来，都要受到战争考验，思想觉悟和斗争精神都要过硬，因而每个人的历史面貌也比较容易看清楚，大家生活战斗在一起，投机分子不容易钻进来。但是，今天情况就不同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人们觉悟高低一时难于看出来。各地招收的大批学生绝大部分是好的，但其中也有的面目不清。进军西南中补充的大量俘虏，还有数目不小的投降起义军官，对他们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与改造。总之，虽然还有部队在剿匪，但在战斗中经受锻炼的机会少了，死人的危险少了，考验就不如过去那样过硬。根据这个情况，要求在组织上比过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去更加严格，稍一松懈与麻痹，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规定党员数量要占部队的百分之三十，能保持这个比率当然更好。现在部队党员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连队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但是，我们不能看到数量不足而机械地去凑足百分之三十。发展党员必须慎重，不能突击。所谓组织严格，首先表现在成分纯洁上。发展党员不是从时间上拿渡江前后或者是进军西南前后来作标准，也不能单独拿作战勇敢来作标准，主要的是要拿政治条件来作标准。应该按照党章规定，做到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如果不够这个条件，就不要勉强去发展，不够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十也行。青年团的发展可以宽一些，而发展党员必须严格。要使青年团真正成为党的预备学校和后备军，有些优秀同志可以先经过团组织来培养和锻炼，然后再吸收到党内来。

对现有的共产党员，凡不合乎起码条件的要作适当清洗，不能拿党龄长短来作标准。一般不够条件的党员，凡能教育改造的都应加强党的教育与组织生活，使他逐渐合乎条件，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完全不合乎条件的党员，我们就要劝他退党，如果他不愿出党就开除他的党籍。把这种人洗刷了，党就会更健康、更纯洁，就会获得更大的胜利。

对新同志教育要严格，要使他知道加入共产党不容易，共产党员不好当，一开始就让他树立党员权利义务的明确概念，这样进到党内来就会进步。有些老同志不求进步，开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摆老资格，总想要党照顾一下。因此，对老同志要求要更严格。对于党员干部的标准，毛主席从来都是提德才兼备，没有提“资”，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解决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这个具体问题，才提到了“德、才、资”，后来大家就把这三个字并列地提出来，甚至

有些党组织在考虑干部问题的时候，把“资”摆在头一位。今天提出不要强调“资”这个条件，这个精神我们应该贯彻。贯彻了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好处；不贯彻对党没有好处，也阻碍了某些老同志进步。现在我们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我们这样做对这些同志是爱护还是打击呢？我说是爱护。有人说革命胜利了，不要他们了。我说党是要他们的，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渐渐落伍，对革命没有好处，对老同志个人也没有尽到帮助的责任。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德”就是政治品德，“才”就是从事革命事业的才能。这种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如果你革命多年还不进步，德、才两方面都很差，党没有理由给你以重大信任和让你负责重要工作。我们党的负责人都经过长期革命锻炼，他们的德、才就是从这种锻炼中培植出来的。所以，单纯地强调这个“资”，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很大的害处。

如果从党的建设、从革命事业发展来看，任何新生的事业都是在前进中发展的。我们的事业也要我们的后代来继续完成。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这是可靠的力量，我们的老同志应当培养而不是忌妒他们。我们有些同志爱讲辈数，这辈不完那辈就不能出来，因为强调了“资”，新干部就提拔不出来。当然，如果两个干部德、才相等，但资格是一个工作十年、一个是工作六年，我们可以先提拔十年的；如果那个有十年资格的干部，德、才都不如六年的，那我们就应该提拔六年的。为了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定要把事业放在前进的、有朝气的基础上，不能迁就落后。如果我们把资格摆在第一位，阻碍和排斥了年轻的和前进的事物发展，那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持续下去，甚至要失

败。这样做不仅对革命无好处，对老同志也是有害的。正因为爱护这些老同志，使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所以我们要坚决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

为了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严密，应该以团为单位作一次检查，根据检查所了解的情况，订出党组织的教育计划，加强对党员教育，使某些不合乎条件的党员经过教育后得以提高，合乎党员的条件。对于极个别的坏分子应加以清洗，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组织力量更加坚强，使同志们更加进步，我们的任务才能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事业才能大踏步地前进！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
刊物《西南工作》第50期刊印

为重庆人民广播电台 开播一周年题词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

人民的广播事业，是传播政策、教育人民和同敌人斗争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一年来，在这一方面工作的同志们是尽到责任的，尚望继续努力，为更高度的发挥它的作用而努力！

邓小平敬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迹刊印

关于减租退押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

西南各区于迅速完成征粮工作后，均在十一月份内先后转入减租退押^[1]运动。从两个月的情况看来，运动的发展一般尚属正常。因为方针明确，并在七月西南军政委员会^[2]第一次会议以来，即在干部中和各阶层人民中宣传贯彻这一方针。因为群众声势浩大，使得地主阶级不敢公然抵抗，不敢说不退押。重庆的地主兼商人也说：“税还可以拖，押是不能拖的。”但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群众运动，我们的干部多为青年学生，骨干很少，故在运动中也出了不少的乱子。例如干部打人的虽然很少，但群众打人、吊人或施行其他变相肉刑的不少，有些则是干部允许或授意的；有些地方干部急于求成，想尽早完成退押（减租实际早已实现）后转到土改^[3]，因而又犯急性病，滋长了命令主义；有些地方反映，底子厚的大地主损伤并不大，而小地主则底子薄，打得较厉害。据了解，川东、川南、川西三区一些地主由于恐惧而自杀，绝大多数为恶霸地主。此虽属不可避免，但其中很可能有方式上和策略上的毛病，这些问题各省区党委业已提起注意。我们觉得目前主要还是防止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以免煮“夹生饭”、吃“回头草”。等退押浪潮过去，大部分

^{*} 这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节录。

退了的时候，要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对于确有困难的中小地主多在“缓”、“少”、“不”^{〔4〕}三字上做文章；对于顽固的则交法庭处理，以求早点结束这一步，转到分配土地或生产的下一步。因为历来运动多在尾巴上出乱子，所以这样做也可减少一些偏差。

这次退押，大地主拿出东西太少，中农得利很多，有退得一两千万^{〔5〕}者。因此，有些地区提议把对地主的政策放宽一些，即允许找些题目使大地主拿出更多的东西。又有些地区提议在中农自愿的条件下把富裕中农得到的果实分一部分给贫雇农。西南局业已发出指示，批驳这两种意见。对守法的大地主（对犯法地主又当别论）不宜节外生枝，因为这样会使是非不明，政策模糊，容易在政治上引起混乱，而在经济上所得也不会多。至于把富裕中农应得押金分一部分给贫雇农的办法，更属原则错误，这还是想一次就解决贫雇农困难或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思想在作怪。其结果将是在政治上破坏农民的团结，经济上大大地破坏农民生产积极性，而贫雇农的困难也并不会因此而获得多大的解决。

从运动发展的情况看，押重一些的地区要延长一两个月，即在四月以前才能结束；押轻的地区（如川北）一、二月间即可大体结束。我们已告诉各地同志，这一步工作要做得很踏实，千万不要勉强地转入土改。事实上这一步做好了，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下一步就容易些了。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
刊物《西南工作》第38期刊印

注 释

〔1〕减租 见本书第 56 页注〔8〕。退押 见本书第 192 页注〔5〕。

〔2〕西南军政委员会 1950 年 7 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3〕土改 见本书第 10 页注〔3〕。

〔4〕“缓”、“少”、“不” 见本书第 212 页注〔11〕。

〔5〕一两千万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对西康省一九五一年 工作任务的两点意见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

志高^{〔1〕}同志：

送来西康^{〔2〕}省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务报告草案阅悉。我同意这个报告，只有两点意见：（一）第三条应标明西康汉人区域必须于一九五一年内基本上完成分配土地的改革，而且我认为这是西康今年的中心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可能的，这点请你们加以考虑。（二）第七条经济工作中请强调种棉花一点，据不少人说西康地区为西南最好的植棉区，而解决原棉又是西南今后数年内必须解决的任务。

邓小平

一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 释

〔1〕 志高 即廖志高，当时任中共西康区委书记、西康省政府主席。

〔2〕 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宣传工作^{*}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八日）

这次会议开了好几天，解决了不少问题。大家一定要我讲话，意思是要各级党委重视宣传工作，首先要我这个西南局第一书记重视一下。因此，我在这里就讲几个问题。

一、关于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党从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就重视宣传工作。我们认为自己宣传得还不够，而全世界的反动派却都说我们的宣传工作厉害。这说明马列主义是真理，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武器。而我们自己说不够也是对的，因为尽管有真理，可是讲不出来，不会讲甚至不愿讲。中央一再指示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人民日报》说，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不开展宣传。当然还有一条就是不组织。这就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两个方面，对群众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不开展宣传。

人们常说，人要吃饭是个特点。我说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双耳朵，有对眼睛，要接受东西。人的脑筋如果没打通，任何事情也办不通。如果农民还有怕变天的思想，减租^[1]、土改^[2]是不可能发动的。但要改变脑筋，就要有可接受的东西，经过眼睛看、耳朵听才行。假若有双耳朵，有对眼睛，却没有东西接受，那么对于方针政策就无法了解。要改变一个人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区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的脑筋就要做宣传工作。宣传会议上大家说：“我们辛辛苦苦地做了许多工作，敌人一个谣言就给搞垮了。”是的，我们不宣传敌人就要宣传。我们常常不能及时揭露反革命活动和敌人的许多新花样。如重庆二十一厂^[3]，我们做了八、九个月的工作，天天在搞人民民主专政，也抓特务，但就不宣传一贯道^[4]是反革命组织，结果有六百多工人参加一贯道。后来抓了一贯道的头子，才揭穿了一贯道的阴谋。工人责怪我们“为什么不早讲？讲了我们就不参加了。我们参加一贯道是为了拜菩萨”。这就是没有宣传的缘故。公安部门的同志认为，只要秘密侦察、逮捕、破案就完结了，不懂得及时揭露敌人的阴谋和花样，特别是新花样。又如在重庆的学校，特务三个两个的搞秘密组织，公安部门知道，青年团知道，大家一句话都不讲。为什么不把这些活动揭露出来呢？无论如何要告诉群众这个道理：凡是在人民政府下面搞秘密组织都是反动的。这样使群众听觉、视觉、嗅觉都灵敏起来，群众的眼睛不就亮了吗？可是不及时揭露，就给了敌人活动余地，以后破获了，群众还是会埋怨我们。不论在城市和农村都是如此。我们党从起根发芽时就是从宣传工作做起，而现在许多党员却不重视宣传工作了。

古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革命工作没有宣传是不行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宣传，减租退押^[5]中第一件事就是要将政策与干部群众见面，见面就要靠宣传工作，不宣传怎么见得了面？不但要向群众宣传，对党委干部也要宣传，党委内部思想认识一致了才好工作。我们剿匪部队几十万，每连有个宣传组，一年来做了许多宣传工作。抗美援朝^[6]运动中，好多人也在做宣传，但很多同志没有自觉地、有意识地把宣传工作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来重

视。所以，我们不能说没有做，而是做得不够。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宣传工作不如敌人，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工作常被敌人的宣传搞垮，在许多角落里我们是被动的。

今年西南大部分地区要实行土改，根据以前在老区的经验，土改完成以后便是：（1）战斗；（2）生产；（3）教育。现在战争基本结束了，明年以后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生产和教育，别的工作均应服从这两大工作，或用这两大工作去推动其他工作。到那时空洞的组织工作就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了，必须由宣传教育工作去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今年要努力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为以后长期的教育运动打下基础。像联共^{〔7〕}那样的做法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如联共宣传部机构最大，我们不能比，但要把他们的精神接受过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靠教育工作把人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使之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又反转过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我们常说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很重视宣传工作，新华社有些重要电讯就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我们还不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要好好地学习。

从目前西南情况看，西南的干部比其他地区都少，因此集中力量搞好主要工作这是对的，如果不这样就要犯错误。去年一年西南工作之所以有令人满意的成绩，就是因为集中力量做主要工作的缘故。有人说我们工作中单打一，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西南的环境不容许我们单打一，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工作经常是好几件，没有一件工作可以放得下。例如解放初期的接管、剿匪、征粮、改造国民党九十万军队，没有一件不是主要的。又如目前清匪、反霸^{〔8〕}、减租退押，也是一件不能少的，这是西南工作的特点之一。因此单打一的情况只可能在个别地方存在。集中力量放在主要工作上

是对的。但集中力量做好主要工作并不是别的就不要了。目前第一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第二是城市生产管理，这次宣传会议开了又有个第三，就是宣传工作。集中力量于主要工作又同时照顾部门工作就要好些。川北宣传部门工作有成绩，不是川北干部比别的地区多，而是川北对宣传部门的工作照顾得好，这一点要推广。

二、关于建立宣传部。我们的宣传部有的不健全，有的甚至没有。为了迎接今后艰巨的宣传教育任务，必须建立宣传部，并逐步健全。全西南区现有宣传干部一千二百三十一人，最高缺额一万余人，最低缺额近六千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迎接今后繁重的宣传教育任务。许多老同志由于长期工作在农村，一般来说政治水平比文化水平高，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则限制了政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是我们的弱点。因此要补充宣传工作干部，主要靠带徒弟，带上几年就可解决问题。带徒弟要慢慢来，从日常工作中锻炼培养，不能希望一下就带得多么好。我们要培养大批的宣传工作“者”而不是“家”。川南、贵州现在绝大多数的县委没有宣传部长。有的同志说有干部就先配组织部长，这也未尝不可，有了组织部长，他就可以去找宣传干部了。没有宣传部长就先设秘书、干事，部长由其他人兼，慢慢地可以做起来。但也不要勉强凑数，勉强凑数就很危险。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很多宣传干部下乡去了就不顾宣传工作。互相兼顾行不行呢？行，下乡时把宣传工作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绝对可以。是不是离开机关就没有材料了呢？不是，相反的下乡材料会更多，更具体，更清楚。根据实际情况发出指示来推动宣传工作，会更实际，更及时，更生动，这就是工作方法。方法好人少也可以解决问题，方法不好干部多，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当然，现在宣传业务扩大了，但若方

法好、结合得好，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说党委工作不要单打一，同样宣传工作也不能单打一。

说到带徒弟就出现了编制问题。西南区三十余万干部，政府、财经、公安占得多，党务系统不到四分之一。譬如重庆一万二千干部，公安即占去八千，因此编制问题也需要切合实际。如有名额，我很赞成配备宣传干部，在干部包干名额中去调剂。我们应当把政府文教部、工、青、农、妇等宣传人员都组织起来。干部虽然少若能很好地组织，就能发挥很大作用。此外，同志们反映各地宣传干部出去多，进来少，这当然也不对，宣传干部一定要保留骨干。

三、关于建立宣传网。重庆搞了几次临时性的宣传网起了不少作用。这是宣传的组织工作，要好好地做。西南宣传情况是“兵”容易找，问题是“指挥官”不好找，兵带得好不好是宣传网的关键。譬如宣传员的思想情况，宣传部要随时了解。宣传网刚建立时可能坏人会混进来，抬着你的招牌干坏事更容易，因此队伍的选择是重要的，要慎重但也不能关门。选人要放手一点，政治面目清楚就可以。要很好研究这些人如何训练，尤其是解决经常教育、领导及宣传材料的供给等问题。基本宣传材料由西南局各省区党委供给，反映具体问题由县一级负责。有些同志尤其是老同志，每写文章就一定要面面俱到，结果很多东西平列，弄得很长。其实一个宣传鼓动材料，好的必然是短小精悍的，这样才能切中要害。大家认为建立宣传网比较容易，我认为开始容易以后难。这是一个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组织教育工作，范围如此宽，数量如此大，教育程度不同，思想复杂变化多，一定比干部教育还困难。我们不能设想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教育组织会比干部教育容易搞，希望大家估计得难一些。宣传网必须防止开始时轰轰烈烈，而后烟消云

散，因此，不妨慢一点。将来宣传网建立了，反映的情况很多很复杂，选择什么重点出击，如何才能打中要害，这就是宣传部要掌握和研究的，因此“指挥官”就更重要了。

四、关于干部学习。我们过去有教育工作，但不系统，坚持得不好。譬如学社会发展史，学了几次还未学完。这次开会同志们学习积极性高。一般地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总是要求进步的，只是以往没有很好地将他们组织起来，方法也不对。许多老干部参加革命一二十年，文化水平没怎么提高，领导要负一半责任。

今天讲的学习是基本理论的学习，必须使所有干部了解这一点。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基础知识差，很多简单明了的道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很早就讲了，而我们还搞不懂。比如不少人爱说“没有功劳有苦劳”。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人不会说这句话，可有人却说了又说，而且说的人很多。我们干部装了满脑子的策略思想，什么“打击面要小”呀，“群众情况”呀等等，但就是没有从理论上搞明白。如与资本家加工订货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家就是要赚钱，而且赚得越多越好，而我们不与资本家讲价钱当然吃亏，可见这里就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如工厂生产问题，要解决原料、市场、发动工人、降低成本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道理马列主义也说过，而我们有的同志却不考虑原料、市场等，就要搞工业化。遇到任何问题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有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就容易打通思想、解决问题。宣传马列主义要造成一种空气，提倡引经据典，但要引得对，马列主义反对你乱引。要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就要学习理论，宣传马列主义，克服经验主义。现在规定高级干部要写论文，这个方法很好，不学理论就写不出论文来。写论文正如写综合报告一样，写综合报告可以使一段时间

的工作在脑子里转一个圈。写论文、编班、考试，这些方法都很好。一定要按文化政治水平编组，在工作上文化不高的师长可指挥文化高于他的参谋，但在学习文化上却应该向参谋领教，少奇同志说这叫做合理。但这一条不容易做到，要打通思想。

五、关于学校教育。这一工作搞得好不好关系重大。中央局^[9]研究认为，我们各种工作都有显著的成绩，但工厂管理和学校教育工作是最弱的两个环节。城市工作会议解决了工厂管理问题，依靠工人阶级要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次宣传会议，就要解决学校教育问题。会上发现的许多问题比我们估计的还要严重。例如停办大量小学，客观原因是匪乱，但主要还是干部不闻不问，如果管一下就不会这样。这个问题不好好解决，人家会说共产党只讲“武”化，不讲文化，这个舆论不好。宣传部一定要有管学校教育的领导，即使有一个干事也好，可以去了解情况。

全西南区小学经费要六亿斤米。小学生充其量有五百万人，初级复式小学^[10]一所一年的费用不超过四千斤米，每三千人担负一所小学，每人出一斤米至多一斤半米，农民办得起。我们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可以开农民代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土改中原则上不留学田^[11]，但要拿出相应办法来。六亿斤米看起来总数很大，但分摊到各乡去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建立宣传网要容易。学校教育的困难在于教育改革，不在于经费。最大的问题是方针，而方针在于能不能团结教育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目前这个问题在重庆也没有解决。现在的情况是进步分子被孤立，这是我们帮助积极分子不够的缘故。如重大张洪沅^[12]的评薪问题，他在全国也是一二流的化学教授，按中央标准应评给他一千二百斤粮，他主动提出只要一

斤，本来应该再提高些，但最后却只给他评了九百斤。我们工作要避免单纯地抓住少数积极分子，却丢掉了多数人，脱离了广大中间群众。进步分子在学校里不多，而我们依靠的又往往是在群众中威信不高、本事不大的人，那些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却丢掉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教授有威信，解放以后很需要有本事能为国家建设做事的人，仅有民主教授就不够了。今后为国家建设服务要靠学本事，因此要解决学校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团结大量有学问有能力的教授，这是检查工作的标准。团结了中间分子，坏分子就被孤立打击，特务就不能推波助澜。学校与其他部门不同，不能过多采取公安部门调查抓人的做法，这样会产生反感。有些人是必须抓的，但必须建立在学生、教职员觉悟和拥护的基础上。学校本来就是教育部门，在学校里是宣传教育第一，要善于引导在学校里的任何工作，包括党、团、行政都必须注意这一点。如果有技术有学问的人，抱着为吃饭不得已而教书的情绪，是不能进行教育改革的。必须团结好中间群众，才可以进行改革。总之，学校教育要改革，要闻要问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解决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团结中间群众。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3〕重庆二十一厂 指重庆第二十一兵工厂。1951年更名为国营456厂，1957年改称国营长安机器厂。

〔4〕一贯道 是反动封建迷信组织。抗日战争时期，为日本特务机关所利用。

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并改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解放以后，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1949年起，各地人民政府先后明令加以取缔。

〔5〕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6〕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7〕联共 苏联共产党的简称。

〔8〕清匪、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9〕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10〕初级复式小学 指农村某些地区由于师资不足、校舍缺乏，采取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在同一教室分班次同时上课的办学方式。

〔11〕学田 是中国旧时属于学校的田地，一般为乡绅所把持。学校以学田的收入作为教师的薪俸和学生的补助等费用。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定废除学校的土地所有权。1950年1月13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又明确规定学田应一律收归国有，对依靠学田收入维持的学校，应拟具妥善的办法，解决其经费问题。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12〕张洪沅 曾任重庆大学校长，当时任重庆大学教授、化工系主任。

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务^{*}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后的半年里，我们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遵循会议决定的施政方针、工作任务和各种决议进行工作，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进军西藏部队，在西南广大人民特别是藏族同胞的热情支援与积极协助下，排除交通、气候等困难，顺利地向西藏进军，两月前一举解放昌都地区，尽歼守敌，藏军第九代本^[1]起义。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也由于入藏部队坚决地执行这些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关怀当地人民的疾苦，人民解放军受到广大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和衷心爱戴。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过程中，得到了沿途藏胞的积极支援，格达^[2]委员则为奔走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遇害于昌都，这些都表现了藏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来的伟大团结精神，帝国主义侵略者任何挑拨分裂的阴谋，阻挡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意志。

剿匪^[3]肃特工作已获得进一步的成就，革命秩序更加巩固。半年以来，我们采取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发动群众的剿匪方针，贯彻宽大与镇压结合的政策，军队不顾疲劳，猛追猛剿，土匪纷纷就歼。目前，除边沿地区还有少数公开的残余股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的报告。

匪尚待肃清外，全区已基本净化，广大城乡地区交通业已全部恢复，物资交流畅通无阻。对于隐蔽活动的特务反革命，也纠正了宽大无边及麻痹疏忽的偏向，加强了工作，对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给予了及时的应得的镇压。这些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大大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并使许多被匪特所胁迫、利用、欺骗的分子，纷纷悔过自新，有的并积极立功自赎。此外，反动会门^[4]的取缔，亦收到初步的成绩。

农村的清匪、反霸^[5]、减租^[6]、退押^[7]运动，于十一月开始向全面发展，已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绝大部分地区都能够抓住发动群众的环节，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斗争中并掌握对地主讲理讲法律的原则，一般说运动的发展是正常的。农民组织经过必要的整理、清洗和教育，在纯洁成分改善作风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在估计全区男女农协会员约在千万以上。农民武装也随着运动的开展日渐壮大，他们从教育和斗争的经验中提高了政治觉悟，积极地要求武装，以保卫自己和人民的胜利果实。现在估计全区人民武装自卫队超过百万，基本上改变了农村的形势。在群众运动面前，一般地主大都能守法减租退押，开明士绅带头退押，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还有一部分地主采取软拖死赖、收买干部、分化农民、杀害干部和积极分子等等方式来破坏运动。而我们有些干部则迷惑于运动初期的轰轰烈烈，忽略了运动的艰苦性，不懂得一件事情的难关，往往不在事情的开始，而在事情的末尾，一个运动的偏差，也往往不在开始而在末尾，所以在有些地方前紧后松，有些地方开始出现僵持局面。凡属这种地方，又无例外的是由于群众发动不充分，干部和部分群众积极分子包办代替所致，命令主义仍是运动中的主要弱点。其次，在运动中仍有乱捕乱打或变相体罚现象，个别地方也有侵犯中农利益现象，所

有这些必须加以纠正。

公粮税收业已完成任务，物价是稳定的。由于中央农业税条例的公平合理，为各阶层广大人民所拥护；由于各地农民觉悟已有提高，普遍地开展了查黑田、评产量的运动，中央核定的公粮任务，截至十一月底已经顺利完成。原来我们最担心的是城市工商税收，由于工商界爱国人士的努力，也由于调整税收、简化手续及税收人员的努力，全区税收任务，亦已按原定计划超额完成。公粮税收的完成，使国家财政收支正常，加上其他方面的努力，有力地保证了物价的稳定。

工商业也开始走向正常发展的道路。半年以来，工商业在逐步恢复的基础上渡过了困难，解放初期的盲目混乱情况基本上结束了。工矿管理方面有了进步，开始懂得如何依靠工人，团结职员，管好生产。工人阶级在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方面起了伟大的作用。铁路的修筑，带动了很多公私企业；重要产业部门开始有了生产计划；公私关系进一步得到合理调整；加以由于农村改革运动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的增加，城乡交流日渐频繁，使工商业随着全国财经情况的好转而有了显著的好转，开始步入了正常的发展。

抗美援朝^{〔8〕}保家卫国运动，在城市中已成为广泛的运动。广大工人、学生、妇女及工商界人士，各民主党派和宗教团体都参加了这一运动，鄙美仇美的情绪大大提高，恐美崇美的错误思想得到了清算，特别是朝鲜战争^{〔9〕}获得决定性胜利，使抗美援朝运动得以迅速深入和扩大。最近个别地方，运动开始由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由城市转向乡村，由突击式的宣传转向系统的教育，使运动向普遍深入的方向发展。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在爱国主义的热情鼓舞下踊跃参军，进入光荣的国防岗位，尤属值得赞扬。

文教工作也有若干进步。全区高等学校经第一次西南区高等教育会议后，已逐步地调整和改进，中小学学生人数已比上期增加，许多停办的小学开始恢复并有增加。创办了工农学校、职工业余学校、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并努力使之正规化。此外，一般机关干部也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整风学习，在提高思想、改善作风、改进工作、增强团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少数民族工作取得了成绩。我们根据共同纲领^[10]的规定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的原则，采取谨慎稳重的方针，半年来的实际工作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西康^[11]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中央访问团^[12]的直接指导帮助下，于十一月中旬正式成立。这给西南在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工作方面作了良好的开端。解放不久的昌都地区业已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云南丽江专区则于十月中旬举行了所属十三县二十五个民族的各族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检讨了各民族间与民族内部的不团结现象，表示今后永远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亲密团结像一家人一样。贵州、西昌及其他地区也进行了积极工作，并从少数民族中涌现出了不少干部。半年来，中央访问团分别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宣传中央的民族政策，并作调查访问，帮助当地干部研究情况，确定原则。所到之处受到少数民族同胞的热烈欢迎，也使当地干部学习了经验，熟悉了工作。经过这些努力，可以肯定西南少数民族工作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此外，改造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工作早告完成，机关部队的整编复员工作，已经顺利地结束了。救灾措施保证顺利地渡过了灾荒。大批失业工人得到救济、安置或就业。禁烟问题从坚决禁种开始，已经逐渐深入。这些都是半年工作中的成绩。这些成绩的获得，是和我们团结得好、上下一致分不开

的。没有各民族、各民主党派、民主阶层和各级干部的团结一致，没有我们共同的努力，成绩的获得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应该承认，上述成绩还仅仅是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前进的基础。必须充分认识到，在西南还没有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封建基础还未摧毁；匪特仍在阴谋活动；群众发动还不充分；由于我们财力有限，经济上许多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工厂管理、学校教育等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干部命令主义还须继续克服，大批新干部尚待锻炼与提高。因此，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以往的成就，而应该发扬过去一年的工作精神，兢兢业业地克服现存弱点，把工作做得更好些。

依据西南当前的实际情况，在一九五一年，我们除了继续贯彻刘主席在第一次会议报告中提出的十二条任务^{〔13〕}外，应着重做好下列几件工作：

一、深入发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必须进一步把运动从有组织的群众推向无组织的群众，从大城市推向中小城市，从城市推向广大的乡村，从一般人民推向受美帝影响较深的部分中去，使反帝爱国运动深入到每个角落。分别通过集会、游行或控诉会议等形式，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检讨错误思想，加深认识，并确立自己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具体斗争目标。在运动展开以后，应适时地领导人民将高涨的抗美援朝情绪，转入加紧生产、加紧学习和经常的业务中去，使之成为推动实际工作的力量。突击式的宣传之外，更应大力进行系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思想上巩固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二、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巩固西南国防。西藏必须解放，美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驱逐出去，使西藏人民回到祖国的大家庭来。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后的一切政策和原则，第

一次委员会议已本着共同纲领精神有了明确规定。入藏部队正从各方面努力，促使拉萨当局毅然摆脱帝国主义控制，打消疑虑，以期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同时也正加紧继续进军准备，动员广大人民特别是藏族同胞的力量，来进行支援进军的工作。与解放西藏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是加强云南边疆的国防问题。残余的国民党特务正在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并在邻国反动派支持之下，乘隙骚扰破坏，并企图在国界上建立其所谓游击根据地。因此，必须对帝国主义及反动残余的阴谋引起高度的警惕，用最大努力加强国防建设，特别是注意边界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工作，以巩固西南国防。

三、加强分配土地的改革。凡属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告一段落的地区，就应及时转到分配土地的改革，以期于一九五一年内，在群众业已发动的地区，基本上完成分配土地的改革任务。目前，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群众的觉悟程度及组织程度业已提高，并普遍地要求提早分配土地；各地干部对于当地情况已进一步熟悉了解；一年的群众运动里面，也涌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和本地干部，我们已经具备了实行土地改革^[14]的条件。土地改革一经实行，将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开展新的大生产确立稳固的基础，这是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应成为一九五一年全年全力贯彻的中心。分配土地的改革，只能在减租退押反霸运动的基础上，即在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业已提高的基础上去进行，故要防止因急于转到土改，发生对当前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抱疏忽草率态度的偏向。要知道减租退押反霸为农村改革不可超越的步骤，做好这一步就是在群众条件和干部条件等等方面，为土地改革做了最实际的准备。同时也不要以为经过减租退押反霸的运动，土地改革便轻而易举了。必须充分估计新区土地改革对于多数干

部和群众都还是新的问题，特别是它将最后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因而必然是一场剧烈的斗争，因而也就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才能使运动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并防止可能产生的混乱。为此，各级政府都应组织有力的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主持这一工作，并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由省、行署拟定实施细则或补充指示，使干部在执行中有所遵循。在减租运动告一段落之后，应有计划地将干部普遍训练一次，一面总结减租运动，一面学习土改政策和实施办法。在分配土地的运动开始之后，仍应运用典型试验然后推广的方法。尤其要教育干部懂得，土改和减租退押反霸一样，任何时候都要依靠群众组织力量，依靠贫农雇农，坚固地团结中农，并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去完成任务，随时警惕和防止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必须使每一地区的每一步骤都做得非常踏实，严防单纯完成任务、简单粗糙、急于求成等偏向，以利达到提高群众觉悟与发展生产的目的。由于土改是要贯穿全年的任务，故每一步骤都应很好地注意和生产的联系，在土改进行期间，要明白宣布谁种谁收、只向新分得土地的所有人按减租后的标准缴交一定租额的政策，以免贻误农事，懈怠耕作，影响生产。同时要在运动中，时时刻刻注意发动与教育农民，加强农协组织、农村政权的民主改革和建立人民武装，加强农民内部团结，防止发生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以确立群众优势，巩固运动的成果。另一方面，必须随时警惕地主和反动分子的破坏，并应加强人民法庭工作。对于守法地主，则应帮助其在劳动中改造，使之变为有用的新人。

在民族杂居地区，对少数民族人民已经提出同样实行减租退押和分配土地的要求，不考虑是不对的，但完全与汉族区域一样实行也是不妥当的。在这些地区，如果已经实行了区域自

治或联合政府，如果少数民族人民绝大多数真正赞成，是可以实行的。但在实行当中应该允许例外，即少数民族自己不赞成在那一地区实行，甚至不赞成对那一家实行时，就不应在那一地区或那一家实行。总之，有关各少数民族的改革事宜，必须通过各族人民代表会议，依据少数民族自己绝大多数的意愿并经过他们的同意才能进行。

四、继续稳定物价，发展工商业和农业。稳定物价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建设强大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的重要条件。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市场的组织和领导，加强国家经济的领导力量，防止由于工作发生错误或因投机捣乱而可能引起的物价波动；另一方面要保证完成国家税收任务，一切税收人员应与爱国工商业者合作，做到按期缴纳税款，使国家收支正常，这乃是稳定物价的可靠基础。由于物价稳定，铁路交通的修建与恢复，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已经出现了在国家指导下有计划发展工商业的条件，中央已公布了私营企业条例^[15]，鼓励私人资本大批地投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尤须继续贯彻一年来已具成效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公营企业要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的基础上管得更好，进一步地发动与组织工人，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农业方面的工作也要加强，群众运动的每一步都必须与贯穿全年的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保证不误农时。而农村改革的具体政策都必须符合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个基本要求，而不致使这种积极性有所损害。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至少应保持一九五〇年的水平并力求略有提高。对于棉花、烟叶、甘蔗等特种农作物生产，尤应按已定计划保证完成。为了适应由于农村改革而出现的极端有利于发展城乡经济的新情况，必须鼓励公私企业部门，面向农

村收购农村土产和使工业品下乡，并有重点地试办合作事业，把城乡交流畅通起来。

五、继续镇压反革命^{〔16〕}，保守国家机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在公开破坏活动失败以后，必然而且已经在加强隐蔽的活动，必然采取更多的花样进行阴谋破坏。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治安工作，加强检察及法院工作，与特务间谍分子作坚强的斗争。在工矿仓库及一切经济部门，必须认真防范反革命的破坏，因为这是当前特务匪徒进行破坏的主要方面之一。必须坚决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纠正宽大无边的错误做法。一切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都应认真进行保守国家机密与军事秘密的教育，建立严密制度，抓紧检查，丝毫不容疏忽大意。

六、加强文教工作，组织学习运动。学校教育应在现有成就上更进一步，继续谨慎而及时地进行必要改革，树立教员、学生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使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及国家建设相结合。工厂、农村、部队和学校都迫切地需要精神食粮，应逐步地向着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努力，动员团结一切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爱国知识分子进行这一工作。要结合抗美援朝运动，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继续开展人民的政治学习运动。西南人民的政治学习，解放以来已获得良好的成绩，但仍需加强。组织干部学习运动，并建立经常、系统的学习制度，以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加强工作效率。

七、进一步巩固团结，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半年来我们的团结是很好的，正是有了这种良好的团结和一致，我们才获得了不少的重大成就。今后工作任务更为繁重，完成这些任务，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民族人民必须更好地团结起来，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据共同纲领的原

则，分清敌我，向着共同目标一致努力。各级人民政府与协商委员会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必须加强，并使之巩固起来，以发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作用。要加强西南人民内部团结，尤其应该着重于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更认真地建立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民族联合形式的人民政府，更认真地从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去帮助各少数民族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有了这种爱国的民主的大团结，就使我们可以很好地完成任务，建设西南，并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我们的国家，也就使我们能够和全世界以苏联为首的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一致，打败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的帝国主义，胜利地保卫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和平。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1年1月31日刊印

注 释

〔1〕代本 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军职衔名。相当于团长。

〔2〕格达 即格达·呼图克图，藏族，西康省甘孜县（今属四川）白利寺活佛，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7月为劝说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前往西藏，经过昌都时，于8月被西藏反动分子毒死。

〔3〕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4〕会门 参见本书第55页注〔6〕。

〔5〕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6〕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7〕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8〕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9〕朝鲜战争 参见本书第307页注〔5〕。

〔10〕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1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12〕中央访问团 这里指中央人民政府于 1950 年 7 月至 1951 年 3 月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

〔13〕刘主席在第一次会议报告中提出的十二条任务 1950 年 7 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西南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西南区的十二条主要工作任务，即：第一，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第二，继续肃清土匪特务，巩固革命秩序；第三，实行反恶霸、减租、退押和准备实行土地改革；第四，恢复和发展经济，继续调整工商业；第五，争取平衡收支，继续稳定物价；第六，进行整编复员工作，节减财政开支；第七，克服灾荒与救济失业工人；第八，禁种鸦片，严办烟贩，禁绝烟毒；第九，文化教育工作；第十，少数民族工作；第十一，加强干部学习，改进干部作风；第十二，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巩固人民大团结的统一战线。

〔14〕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 10 页注〔3〕。

〔15〕私营企业条例 指《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50 年 12 月 29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后，由政务院公布施行。

〔16〕镇压反革命 见本书第 298 页注〔11〕。

对党外人士应该多做工作

（一九五一年二月六日）

中央：

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从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历时五天，会议开得很好，党外人士对西南半年来的工作，多表示赞扬，对提前土改^[2]一致赞成，在发言中多人说到抗美援朝^[3]，对我国国际地位之提高，甚感兴奋。这次党外人士在大会上发言的较上次会议多一倍，且较有内容，其原因是：（一）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胜利，伍修权^[4]在联合国发言理直气壮。（二）物价一直是稳定的，工业建设已开始见到成绩，不少老头子去参观二十九厂^[5]坐上成渝路^[6]的火车，看到自己造出来的钢轨，非常高兴。（三）西南各地的清匪反霸^[7]减租^[8]退押^[9]运动，发展是正常的，有好几位委员如陈筑山、周太玄等人，都亲自到过农村，听到农民诉苦，得知恶霸罪恶之多，实在是闻所未闻，也看到我们干部和农民群众在处理问题时人情入理，不但无隙可乘，而且受到了感动。尤其是看到农民已经起来，大势所趋不可抗拒。陈筑山在前次会议上的态度是很不好的，这次则列举所见事实证明工作做得很好，并反省过去见解不对。所以从这次会议得出经验，应该对这批人多做工作，特别是吸引他们到农村去参加土改运动，这不但可以教育他们，而且能够减少运动的阻力。

西南局

二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指 1951 年 1 月 25 日至 29 日在重庆举行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南区在 1951 年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工作的计划；确定西南区 1951 年的工作任务是：（一）扩大与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二）进军西藏，巩固国防；（三）加速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四）继续稳定物价，发展工商业和农业；（五）继续镇压反革命活动，保守国家机密；（六）加强文教工作，组织学习运动；（七）进一步巩固团结，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2〕土改 见本书第 10 页注〔3〕。

〔3〕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 307 页注〔5〕。

〔4〕伍修权 1950 年 11 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同年 12 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5〕二十九厂 今重庆钢铁公司。

〔6〕成渝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 年 6 月 15 日开始动工，1952 年 7 月 1 日全线通车。

〔7〕清匪反霸 见本书第 30 页注〔3〕。

〔8〕减租 见本书第 56 页注〔8〕。

〔9〕退押 见本书第 192 页注〔5〕。

一九五〇年主要工作情况^{*}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

西南比其他区域解放得迟一点，所以工作要落后一点。去年上半年主要是剿匪和接管工作。去年七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确定的任务主要是八个字，即清匪、反霸^[1]、减租^[2]、退押^[3]。朝鲜战争^[4]爆发以后，又加上一个抗美援朝^[5]。这半年以来就做了这两项工作。不久以前，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6]上把这两项工作总结了一下，认为这两项工作都做得有些成绩。

一、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估计。

总的情况是，凡是开展了这个运动的地方，就会明显地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讲了这句话，当时还有些人不相信，或者是不完全相信。但是经过这次抗美援朝运动，凡是卷入到这个运动里面的人都相信了，无论老年、青年，男的、女的都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朝鲜战争打了胜仗，这个问题就更明确了。再就是伍修权^[7]代表在联合国讲了一次话，大家更感觉到中国人民确实是站起来了。这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推进。这个运动对于思想改造有帮助，但是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在重庆市和一些留美学生举行了座谈会，大家讲了很多。说美国的刺

*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关于西南区工作报告的节录。

头铺子不让中国人进去，美国没有民主。这种认识对思想改造有没有帮助呢？有帮助。但不够的是并没有一个人说到自己过去有恐美、崇美思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运动还不够深入，说明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几个月的抗美援朝运动，要想把思想完全转变过来，不是那样容易的。所以，我们在第二次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把抗美援朝运动提到了今后工作的第一位，要继续进行这个工作，继续深入这个运动，由城市到农村，由先进地方到落后地方，普及到所有地方，普及到每一个人。这个运动虽然不深入，但对我们工作却起了很好的效果。如工商业纳税，原来大家预料去年的税不可能在除夕以前完成，结果超过了。这也可以说明这个运动的效果。在这个运动中，工人、学生、工商业界、宗教界都有很好的改造。这个工作我们仅仅才开始，今后还要继续下去。

二、关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

西南军政委员会于二月份检查了这个运动，认为发展是正常的。我们原来很担心西南解放比较迟，干部比较少，所以很怕这个运动出乱子。因此，我们一开始就采取了典型试验的方法。现在检查结果一般是正常的，群众发动起来了。

清匪方面，今天可以说西南土匪基本肃清了，剩下的一些主要在广西边界，更主要的在靠近东南亚越南、缅甸的边界。历史上西南地区土匪没有少过三万，现在经过我们清剿已经不到三万了。因为我们剿匪是政治和军事并行，而且着重于政治，所以，凡是肃清土匪的地方，群众就发动起来了。大家知道，四川有的地方是土匪窝子，过去一个人不敢背着包袱走路，现在一个人可以背着黄金走路都没有人抢了。以前把那些地方的老百姓叫“匪民”，现在那里的人民起来剿匪了。据统计，全西南还有不到一百个土匪头子没有捉到。至于捉到的土

匪头子那就是几千、几万了。我们在西南报纸上公布得少，实际上已经消灭八十七万土匪。成都以北岷江地区以前是土匪猖獗的地方，由于我们剿匪，这些地区现在成为发动群众比较好的地方，而土匪最凶又没有经过剿匪的地方，往往是群众发动比较差的地方。在剿匪阶段也要杀一点人，这样会使群众发动得更好。至于残余土匪，很快在国防线上就可以肃清。

由于清匪清得好，剿匪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并且由于发动了群众，所以很有助于我们反霸、减租、退押工作，因为有些霸本身就是匪。贵州地主阶级中百分之四十是恶霸，这些恶霸中只有个别的没有当土匪。所以，剿匪实际上要牵涉到反霸。但也不是说清匪就能把恶霸通通反掉了。我们在农村的经验证明，不反霸就不可能减租、退押，也不可能实行土地改革^{〔8〕}。所以，反霸是减租、退押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的第一步，是不可少的一步。哪个地方违反了 this 规律，即便分配了土地，结果农民还是不会真正发动起来。要把农民发动起来，就要看他们最怕的那些人捉了没捉，关了没关，杀了没杀，当然不一定都杀。只要办了捉、关、杀这几件事情，把恶霸都处理了，农民就发动起来了，农民就敢讲话、敢斗争了。不办这几件事情，农民就永远不敢动。我们西南在清匪、反霸方面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农民感觉可以抬起头了，所以说群众发动来得比较广泛。西南有七千万人口，现在农民会员就有一千三四百万，大约占西南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西南还有一个特点，在减租、退押运动诉苦说理时，妇女往往站在最前面。四川妇女农民会员占三分之一以上。四川妇女勇敢、会说话，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妇女乡长和区长。因为运动是群众性的，地主阶级才肯低头，地主阶级低了头，运动才可能正常开展。地主阶级不低头，运动就很难开展。哪个地方打的人多，就是

哪个地方的地主抵抗多，哪个地方打的人少，就是哪个地方的地主抵抗少一点。四川有一句话叫依理服法，如果哪个地方是依理服法，哪个地方杀人就会少一点，打人就会少一点，这是开展运动普遍的规律。

我们说这个运动一般是正常的，有没有打人的呢？有，但是政府干部打人的，我们还没有听到。是不是有个别干部打了人呢？有的，不过有也是个别的。农民打人的事是不是有呢？有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地方在诉苦运动当中，一个农民上台去向恶霸地主诉苦，五分钟讲不出话来，最后打了那个恶霸两个耳光，把气出了才讲出话来。这样的事情相当普遍。所以，当一个运动成了群众运动的时候，你说按着政策一个人不打，那是办不到的。我们是不是提倡这个东西呢？不是的。例如：有个农民知道一个地主的底细，农民们在斗那个地主的时候问：“你家里有什么金、银？”结果一整天地主就是不讲。大家说：“明天再来吧！”第二天，那个农民把地主那些金、银拿来交给了干部。当时我们的干部很奇怪：“昨天我们斗争了一天他都说没有，你为什么拿来了？”那个农民笑着说：“嘿嘿！我犯了一点错误，给了他两下。”农民也知道打人不对，是犯错误，但东西却拿出来了。就是这样，我们也还是批评了他。打人是要不得的，东西拿出来了也不合法。在这样一个大的运动里面，如果发生打人的事情，是不是这个运动不正常了呢？回答还是正常的。农民运动当中有一句话叫做说理斗法。军政委员会开会时就有人提出：“斗法”和我们的“法宝”有冲突，后来我们就叫做“讲理讲法”。

在西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这八个字的运动，大体上正常，现在可以说是基本结束了。原计划今冬明春才开始土地改革工作，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经过研究，认为

这个工作可以加速进行，并且做出了决议。我们已经开始典型试验，效果不错。今年春耕以前准备在一千多万人口地区完成土地改革，主要在四川地区完成二十几个县的土地改革。准备到年底，在凡是发动了群众的地方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从典型试验看，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地方，分配土地比较容易，但也不是没有问题。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然后转到典型试验的地方，往往是群众发动比较好的地方。分配土地时地主用各种花样来进行抵抗。比如在川北一个典型试验乡，地主杀了一条狗丢在村干部家门前，还把刀钉在门上叫“杀狗钉刀”，来吓唬村干部；也有的宣传“美国快来了”，“打到重庆了”，“打到上海了”，“打到贵阳了”；还有的要把自己闺女嫁给农民干部，请村干部吃酒等等。总之，过去地主所要的那些花样都出现了，可见斗争非常激烈，具体表现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中。去年，反革命杀了我们一万多农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这恐怕是其他地区都少有的现象，你说这个运动激不激烈！我们把地主也动了一下。他服不服呢？根据我们典型试验的材料看，还是没有完全服。

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转到土地改革，是有组织的激烈斗争。如果说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再来搞土地改革就会和平进行，那是太理想化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只要农民起来，就可以按着我们原定计划去完成土地改革，而且也一定会像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一样正常。有许多朋友担心群众起来了会不会乱？我们的回答是：如果干部包办代替就会乱，因为过去往往是乱在干部包办代替。我们这后半年的运动证明，群众真正起来了就不会乱。哪一个罪大、罪小，该怎么办，农民很清楚。西南的群众运动，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到土地改革的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三、关于镇压反革命^[9]。

西南反革命受到打击，也杀了一些。我们经过研究认为，所有被杀的人还没有一个杀错。我们说农民运动能够发动起来，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正确，包括我们杀了那些反革命那些恶霸，不杀他们农民发动不起来。西南恶霸不当土匪、不搞武装斗争的很少。所以，如果不把这些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搬掉，农民是不会发动起来的。但是不是镇压了一些反革命，他们就活动得不厉害了呢？不是的。根据西南现在的情况看，运动越深入，阶级斗争也就越尖锐。对公开武装反对的敌人我们不怕，但是对付秘密的敌人我们的本领还不很大。西南在历史上土匪不断，所以特务、恶霸、反革命就寄希望于土匪，他们现在又由公开转到隐蔽斗争了。由于农村群众起来了，他们不敢在农村活动，便由农村转到城市，转到隐蔽一点的地方去。比如在重庆，他们就转到学校、工厂等隐蔽地方进行破坏，这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很大。现在我们注意了这方面，但是办法不很多。所以，我们肃清了土匪也还高兴不得。不能因为今天群众发动起来了就放松警惕，忽略反革命的活动，我们还必须提高警惕。

总起来说，西南这一年我们在以上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收到了一些成绩，但缺点还很多，今后还需要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地去搞。

除以上几个主要方面外，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向前发展的。

工商业方面，各大中城市开工厂、开商店的要比关门的不仅多得多，而且生意是赚钱的。因为农民起来以后得到了一些利益，所以农村购买力大大增加了。今年过旧历年，重庆百货商店、酒馆饭店的东西都不够卖，他们说，这是过去没有碰到的事，从来没有把东西卖光过。什么原因呢？他们说农民一

口袋一口袋地来买。城市购买力增加，农村购买力也增加，这就给工商业开辟了一条发展道路。物价各地区一样是稳定的，过年时也没有高涨。购买力增加了，东西又不涨价，所以人民非常高兴。

成渝铁路^[10]已经修了一百多公里，到了江津。李应泉老先生路都走不动了，他还高兴地到火车上去坐一下。

民族团结方面，有两件事情对西南各民族人民影响很好。一件事情是在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和毛主席握了手，这个影响大极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中央访问团^[11]到西南做了深入的工作。西南有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群众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召开的会议和座谈会。这两件事情，再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很好地落实民族政策，不仅使各民族加强了团结，而且对中央更加相信，各民族都承认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是他们的政府。这是过去国民党政府和满清政府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却解决了。

以上这些事情说明，我们各方面工作欣欣向荣，逐步向上。但是我们各方面的问题还很多，在发动群众方面有很多包办代替、命令主义的缺点；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土产多了，他们想把东西卖出去却有困难；农民购买力强了，已经感到工业品不够了；城市工作、工厂管理、学校教育要加强；反革命还很活跃。这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或者有的地方还没有开始解决，需要我們继续努力。我相信，依据去年群众运动的基础，这些问题会一步一步地在今后一年两年内解决的。经过这一段时期，过了今年这一关，我们就聚精会神地搞生产、教育这两件大事。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方面工作也就容易推动了。

注 释

〔1〕清匪、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2〕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3〕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4〕朝鲜战争 参见本书第307页注〔5〕。

〔5〕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6〕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见本书第339页注〔1〕。

〔7〕伍修权 1950年11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同年12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8〕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9〕镇压反革命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10〕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6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11〕中央访问团 这里指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

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统一战线工作，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多次提出、明确指示要加强的。我们革命的胜利是和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没有统一战线，仗不会打得那样好，即使打胜了，工作也不会做得那样好。但是我们的干部并不是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又重新提出来，中央专门发了指示^[1]。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开了这次统战工作会议。中央的指示规定得很具体，有些问题我就不说了，今天主要谈谈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我们说，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加强，为什么要加强？首先就要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弄清楚。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打仗也是这样，先要解决为什么打的问题以及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目前重视统战工作的同志还是少数，多数同志没有真正认识它的重要性和原则性。我们西南的许多干部做了统战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不少同志做统战工作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被动的。去年二三月后，到处闹土匪，物价波动，我们的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到处找开明士绅、工商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要求人家支持剿匪、征粮，这也是做了统战工作。土匪一肃清，公粮一征

*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

完，这种工作就不去做了，或者做得不多了。为什么要团结更多的人一块来剿匪、来征粮呢？这里反映了一个事实，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他们一起来做工作，说明这些人是不可少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朋友，孤立了敌人。

我们有的部队同志把胜利只看作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不全面的。从历史来看，党中央、毛主席对统战工作一直很重视，做得很精心。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长征^[2]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只有六千人，加上陕北红军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一共只有一万几千人，被十多万敌人包围，非常困难。党把一些最好的干部派去做统战工作，加上其他方面的工作，在“双十二”事变^[3]后形成了抗日救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部队到达华北、华中后，人人感到需要有统战工作，因为我们有了朋友就可以站住脚跟。那时甚至对一个碉堡的伪军，都拼命地去做统战工作。在解放战争中，我们聚精会神地从政策等各个方面去做工作，争取了各民主党派。蒋介石也争取他们，但我们胜利了。我们由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支持，理直气壮，士气很高，才打胜了。抗美援朝^[4]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包括一些民主人士、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有疑虑。后来由于加强了工作，各界都赞成、拥护，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5]，资产阶级也出来游行，这样就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意义，以为照例是官样文章，但是各阶层的人民很重视。这个宣言表明了抗美援朝是举国一致的。如果不要统一战线，内部不团结，能够抗美援朝吗？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6]之一。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

情都是办不好的。

在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思想，认为做事情只要抓住工农就行了。这种想法总的来说是不对的，具体来说只有一半对。工农确实是我们依靠的基本群众，但是，只做工农群众的工作解决不了全部问题。例如，处理公私关系不做私方的工作，处理劳资关系不做资方的工作，行吗？再如，在减租退押^[7]中，我们动员一些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下乡（如去川北、川西等），往往僵局容易打破，任务容易完成。而不这样做的地方，运动的进展就比较慢，发生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假如没有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人回城写文章介绍农村的情况，城里的人一定以为农村“漆黑一团”、“无法无天”，那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有些同志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认识不够，不懂得各民主党派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够味。这些同志不是从整个社会存在着各个不同的阶层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来看问题，因此，往往忽视了统一战线。这种单纯依靠工农，不注意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的思想，是关门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

有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只是两年的事，土改^[8]一完成统战工作就勾消了。毛主席说要在统战工作方面培养专家，而我们有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只有两年，没有出路。实际上，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是要贯彻到底的。这不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是真的。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统一战线加强对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教育，团结他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资产阶级没有了，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阶层存在，这里面绝大部分是我们的朋友，还有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只要有敌人，有朋友，就得

团结朋友，孤立和打击敌人，就还得有统战工作。因此，统战工作一直要做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

还有的同志觉得，统一战线的作用只是分化敌人。这也是不对的。固然，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就是要广泛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人民。凡是可以团结、可以争取使其中立的，都要加以团结、加以争取，这也就是孤立了敌人。有些同志不重视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就在于他们误认为统战工作只是分化敌对营垒，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有两面，一面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这是主要的；另一面才是分化敌人，使敌人营垒中一部分人转到人民方面来。这些同志没有看到统战工作的这两面，所以不重视团结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阶层人民，没有远大的眼光。

还有的同志虽然赞成统一战线工作，但以为这是统战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不能主动地经常地注意做好统战工作。例如，重庆镇压反革命时，有些民主人士恐慌起来，这是由于党内的同志没有事先做好他们的工作，使得我们被动了一下。现在，把统战工作看成吃喝应付的人是少了，但是还有嫌麻烦的思想，对党外人士的工作做得不够精细。

以上情况说明，中央提出要多做宣传统一战线的工作，使重视统战工作的党内同志由少数变成多数，确实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加强统一战线是我党长期的工作，并涉及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各个部门都有统战工作。例如，工业部门的工程师、职员不都是共产党员，政权机关中也有党外干部，还有大量的非党文化人士、教师、医师、技术人员等等，对他们都要很好地团结、教育，同他们一道走到社会主

义。统战工作是全党各部门的工作，如果不使每个干部、每个党员都懂得这一点，这项工作是做不好的。

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中央专门发了指示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当时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扩大、发展和深入的形势，号召全党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更加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提出了1951年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批评了部分党员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采取的不够积极的态度。

〔2〕长征 见本书第204页注〔6〕。

〔3〕“双十二”事变 即西安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1936年12月12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一道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4〕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5〕联合宣言 指《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于1950年11月4日联合发表的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言。《宣言》谴责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揭露美帝国主义企图侵略中国的阴谋；呼吁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用积极行动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重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从朝鲜撤军的主张；郑重声明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

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6〕三大因素 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通常被称为三大法宝。

〔7〕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8〕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为重庆市总工会成立题词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肃清特务匪徒，实现生产计划，把工人阶级的劳动热忱和政治警觉性结合起来！

邓小平敬题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1年3月27日发表的手迹刊印

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的经验必须加以重视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各地并中央：

兹将康定地委工作情况报告^{〔1〕}转发你们，这个报告说明了在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杂居地区建立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的重要性，康定区因为建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不但团结了藏族，而且各种工作都进行得比较顺利，这个经验在有少数民族的地区必须加以重视。

西南局

三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康定地委工作情况报告 指1951年3月18日中共西康区委报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康定地委三个月来工作综合报告》。《报告》简要介绍了三个月来康定地区的政权建设、民族工作、参军工作及泸定汉人区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等各项工作情况，提出了在今后半年内普遍健全县区两级政权，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坚决镇压反革命和普遍开展贸易工作等任务。

在重庆市第一届工会会员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各位代表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西南局向重庆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西南解放了一年又三个月，重庆已有一年四个月了。在这一年四个月中，西南各界人民首先是重庆工人阶级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如果我们的党和政府不把我们的基础放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民主阶层上，如果我们不诚心诚意地依靠工农，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分子，我们就不可能设想在这一年四个月时间中把局面稳定下来。

重庆刚解放前夕，工人同志保护了工厂，有一些积极分子、工程师为了保护工厂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这是值得全西南人民纪念的。解放后，由于工人阶级弟兄们的努力，我们的接管人员才有可能把这个复杂的、庞大的生产机构很好地接管过来。我们接管以后很困难，没有原料，没有销路，很多工厂开不起工；民主改革很需要，但是一时来不及搞。我们站在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的立场，曾经要求工人兄弟忍受一些暂时困难，要求大家降低工资，这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当我们把道理讲明以后，工人同志们勇敢地接受了这个号召。许多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曾经怀疑工人阶级是不是能成为领导阶级，他

们总是觉得农民阶级可爱，他们似乎觉得工人阶级没有农民阶级贡献大。但事实教育了这些人，事实证明，工人阶级只要明了这一政策符合国家利益及工人阶级长远利益，他们就勇敢地站起来接受，完成这个号召。我们看到，正是工人阶级以伟大的气魄接受这个号召，而且发挥高度的劳动热忱，才能够获得今天许多巨大的成绩，所以我们要感谢工人阶级。

在这一年多，我们有很多成绩。工会一天天健全起来了，生产逐步地恢复，有些工厂开始有了成本计算。有很多工厂企业由于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不但进行了改革，增加了生产，节约了许多原料，降低了成本，渡过了困难，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了生活。这说明一个问题，工人阶级的生活福利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而好起来了。由于原料节约，成本降低，生产发展，国家在生产发展中积累了资本，更进一步发展了工业。发展生产，积累资本，不是单单为了改善工人生活。虽然一个国家在开始必须依靠农业来积累资本，但这是有限的。大量的资本必须从工业中来积累。为了工人阶级长远利益，必须搞好生产，积累资本，再来发展工业，这样才能使我们国家如同毛主席所指示的那样由农业国进步到工业国。当然随着生产发展，资本积累，其中有一部分也必须用来改善工人生活，正如我们所提出的“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从全局来说的。当然，哪一个工厂，哪一个企业搞得很好，也是应该奖励的。

在这一年中，我们在工厂企业中清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这是一件大事。敌人在工厂中布置了一批特务，如果不肃清，我们就不可能有计划地来搞建设。这一年多来的成绩是工厂、企业中所有的工人、职员、技术人员和派去的军事代表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在一年四个月努力的基础上，在工会会

员代表大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在一九五一年能获得更大的成绩。

同志们，大家知道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工人阶级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来体现。这个体现是名副其实的，首先从政治上来说是共产党领导。中国在近百年来自从出现了工人阶级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1]以后，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出现了共产党。我国经济有了百分之十的工业，这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结果，而不是资本家创造的。但我们还是农业国，要变成工业国，就是要用我们的劳动积累资本，用我们的劳动创造工业，工业比重不仅是百分之十，而是到二十、三十、五十、七十，使我国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农民要翻身，要斗倒地主，但光是平分土地还不是翻身。当农民还用落后工具，而不是用机器成为集体农场生产者的时候，还不是真正翻身。机器是由工人阶级创造的，工人阶级要支援农民阶级翻身，要支援土改^[2]。从长远利益出发，这两个阶级联合起来，我们国家就可能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指出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首先我们推翻了国民党统治，成立了新的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有了保障。但不是说在政治上有保障条件就够了，不是的！还要努力创造许多条件来准备建设国家，要经过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使我们国家一天天成为工业国。我们要向着毛主席所指示的道路前进，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由落后到先进，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如苏联所走过的一样。我们要从四方面来努力：第一，深入开展抗美援朝^[3]运动，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不是很容易的事；第二，支援农民土地改革；第三，肃清反革命^[4]分子；第四，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把我们的机器效

力很好地组织起来，发挥出来，并且为有计划地建设工业、农业准备干部。这四方面缺一不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好国家。

抗美援朝运动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很多方面，包括我们的生产以及人民的思想。我们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土改后再过几年，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就要消灭（封建残余及其影响不是一时能消灭掉的，是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官僚资本主义的资本财产被没收了、消灭了，剩下就是帝国主义。虽然帝国主义打跑了，但不等于解决了问题，他们在华盛顿、伦敦天天想侵略我国。美帝侵略朝鲜，想从台湾、越南等地造成对我国的包围。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就是保卫自己国家。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我们就不能轻视它。帝国主义不但直接侵略朝鲜，还组织大批特务来中国进行破坏，挑拨离间、造谣。例如，上次大逮捕就发现有美帝指使的间谍打进了机关、工厂，但我们发现还太少。所以，要随时注意帝国主义的挑衅。这是敌情方面。从内部来讲，人民往往容易疏忽，认为土匪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还有人有自卑感，总觉得扁鼻子不如高鼻子，总觉得勤劳的中国人不如外国人，总觉得有五千年古老文化的聪明的中国人不如帝国主义者。这是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有的人把自尊心磨灭了，看不到我们民族的智慧和聪明，看不起自己。我们要克服这种自卑心，树立自尊心与爱国心，发挥创造性和自觉性，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明了敌情，我们就能更努力地发展生产。帝国主义并不比我们强，帝国主义欺侮我们只有百分之十的工业，如果我们把国家经济中的工业变成百分之二十、三十、五十，到那时，帝国主义就不敢轻视我们。所以，抗美援朝运动必须结合我们的生产，这是件大事情。我们

要警觉敌人的侵略，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

现在全国加速进行土地改革，中南、东南已完成一万万人口的土改，西南在春耕前已完成一千万人口的土改，在今年秋天要完成四五千万人口土改。土改后农村出现了崭新局面，农民购买力提高了，大大刺激了城市工业发展。所以不消灭封建主义，就不可能发展工业，我们要坚决拥护农民土改。有少数工人、职员也有土地，应该有伟大的气魄去支援农民，不要为了一些利益做地主阶级的尾巴。明年完成土改，这是几千年来没有完成的事。土改后工业发展就有基础了，如东北土改后，农民对布的购买增加了十倍，西南经土改后，农民购买布也比以前增加了一倍。

比土地改革还要困难的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进行土地改革，我们的敌人是公开的地主阶级。而反革命分子则有两种，一种是公开的，一种是隐蔽的。同时，我们对敌情不了解，尤其是隐蔽的敌人，破坏手段最毒辣，危害最大。在这次镇压反革命分子中，我们镇压了一批，有一些该杀的杀了，该抓的抓了，该管的管了，但还是没有肃清，要随时提高警惕性。现在农村中的敌情比较清楚，而工厂却混进了许多旧军官、地主、恶霸、特务，对此我们注意得不够。刚解放时反革命分子公开打游击，由于解放军是打游击的老手，结果他们失败了，在绝大多数地区的土匪被我们肃清了。于是，反革命分子就有计划地散布到我们的经济部门中进行破坏活动，重庆市南岸一个仓库被烧掉，二十九厂^{〔5〕}遭到特务连续破坏，造成很大损失。如果我们不注意，特务的破坏就会更多、更重大。特别是在最主要部门，一旦被破坏，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如电厂就可以影响到其他部门，而这种部门刚巧又是敌人要来破坏的重点。尽管志愿军将美帝打败了，国防巩固了，土匪肃清了，土地改革

了，但如果反革命分子还隐藏在我们企业中，甚至可以大胆地进行破坏，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国家。如二十九厂去年十二月超额完成任务，今年二月便只能完成百分之六十，并不是工人不努力，而是特务的破坏，所以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创造一部机器要许多人，要花费好多气力，但破坏一部机器只要一个人，南岸仓库也只一个人一包炸药就烧掉了。但是我们也不要怕，反革命分子总是少数，只要我们大家经常注意，就是最隐蔽的也可以发现，可以把这些反革命分子捉出来。同时，我们又要要把反革命分子和有一般政治问题的人区别开来，如过去参加国民党、三青团^[6]、一贯道^[7]等，要防止在肃清反革命分子过程中，这些有一般政治问题的人发生恐慌情绪。如发生这种情形是危险的。今天对于参加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8]的人进行登记，是为了弄清楚情况。只要登记讲清楚了，就是放下了包袱。特务造谣说：“现在农村杀大恶霸大地主，进一步就是杀小地主，再进一步就是杀富农”，“城市现在杀特务，下一步就是杀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我们杀特务、反革命分子，是因为他们破坏国家建设，破坏我们工厂，我们杀的就是这些该杀的，我们管的也仅是这些该管的。工厂、企业中的党、团、行政部门，要团结有一般政治问题的人来反对反革命分子，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做好了。我们要团结广大群众，告诉工人弟兄应该加入自己的工会，退出迷信落后的反动组织。

我们还要在国营、私营企业中继续进行改革。我们不要认为改革光是私营企业的事，国营企业过去长期在反动派统治下，更要加紧改革。一年来，我们改革有了成绩，有的国营企业改革得较好，更多的是不太好。我们要继续改革，为将来的大生产准备条件。同时还要准备许多技术人员，根据东北的经验，生产发展了，就感到各方面的技术人员都缺乏。总之，我

们领导同志要想到未来的生产发展，进行必要的准备，尤其是要从工人中培养一批技术人才。要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组织学习政治，既发动劳动竞赛，又发动学习竞赛，造成很好的学习风气。将来建设国家要在工人中大批提拔干部，工人同志不应固步自封，要提倡尊重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同时技术人员也要好好改造自己，向工人学习，尊重老工人。技术好的同志，要把技术教给新同志，这样就能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我们的口号是依靠工人阶级，具体内容就是依靠工人团结职员。工会就是实现依靠工人团结职员的组织。工人是经过工会来管理工厂，在私营工厂中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协商，所以必须加强工会工作。我们在工厂的党和行政领导必须了解这一点，依靠工人阶级不是空洞的，而是实际的。一年来工会工作做得很不够，这次大会要好好讨论，如何努力克服官僚主义，如何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如何教育工人，如何把工人组织起来。所以，我们说在工厂中党委要领导工人，主要是依靠工会。工会要实现领导就必须教育工人，让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如果工会忽略工人的目前利益，忽略了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对的。当然，有时工人提的一些要求不能立刻办到，我们也要向工人讲清楚。工会应该特别注意到应该办而又能办到的任何一件事，哪怕是一件小事，党、团组织也应该注意。我们要经常关心涉及每个工人利益的每一件事，包括如何进行技术学习，如何注意卫生，关心工人政治、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关心工人的身体健康。工会不是官僚主义机关，工会干部、代表要始终在工人群众中，明了他们的思想、要求，才能不脱离群众。还要培养更多的积极分子，这样才能使现有的劳模或积极分子不会脱离群众。现在有些劳模感到很累，觉得积极分子不好当，或者成了开会干部，往往一当积极

分子就脱离了群众。十件事由一个积极分子去做当然吃不消，假如由十个积极分子去做就容易了。现在积极分子脱离群众，领导方面要负一部分责任，同时自己也要负责，不能因当了模范而骄傲。工人群众选举我们当劳模是由于我们工作做得好，所以劳模不是永久的，今天是劳模，可能明天就不是劳模。因此，我们要更多地培养积极分子，才能使积极分子不脱离群众。

今天是重庆市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我希望今后要多开这种会议，但不要经常这样隆重，经常这样就变成负担了。第一次大会应该隆重些，今后开会要简单朴素，而且还要扩大些。领导不一定都要作大报告，只要每次能解决一个问题也好，这样才不会脱离群众，真正把领导的意图贯彻到工人群众中去，才能体现工人经过工会来监督国家大事。这种会议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各位代表把这次大会决议很快变成工人群众的行动。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五四运动 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6月3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与

“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3〕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4〕肃清反革命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5〕二十九厂 今重庆钢铁公司。

〔6〕三青团 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一个专事欺骗和控制青年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反动组织。

〔7〕一贯道 见本书第325页注〔4〕。

〔8〕反动会道门 见本书第55页注〔6〕。